

回忆文丛

季羨林

荆棘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汉 ■ 邓九平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思忆文丛

荆棘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 牛 汉 ■ 邓九平 /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棘路/牛汉,邓九平主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9

(思忆文丛)

ISBN 7-80127-498-9

I. 荆… II. ①牛… ②邓… III. 反右派斗争—1957—
史料 IV. D6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799 号

责任编辑:文 非

封面设计:康笑宇

荆 棘 路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 汉 邓九平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 印张 34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27-498-9/G·219

定价:23.00 元

前 言


我们祖国是古文明国家,历史悠久。有幸历史学源远流长;尤其奠定我国两大传统文化基石的思想家,老子出身于“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更著有《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忍受残酷阴狠的宫刑,苟全性命,只为“述往事,思来者”写完《史记》。那“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多么强烈,多么令人神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入于《正气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鉴败莫如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格言,比比皆是。这倒的确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血脉。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思忆文丛》,献给曾经亲历和未亲历的读者,也是一片“以往鉴来”的心意。

对于收集的 1957 年的文章,作为“实录”,为了存真,我们基本不作文字修改(除错别字外),也不以我们的观点来取舍。我们期待的,是从这有骨有肉有血的思想资料,孕育出一大批更富创造性和智慧的俊才;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新发展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1998.8

思忆文丛

季羨林 

《思忆文丛》顾问：

钟敬文	季羨林	张岱年	冯亦代	贾植芳
卞之琳	严文井	陈原	黄苗子	郁风
李锐	吴祖光	丁聪	刘衡	郭预衡

《思忆文丛》编委：

牛汉	林斤澜	姜德明	乐黛云	邵燕祥
李国文	刘乃元	戴煌	刘梦溪	谢冕
钱理群	王得后	王富仁	舒乙	母国政
从维熙	蓝翎	谭天荣	王书瑶	杨路
朱正	柳萌	林贤治	谢泳	邓九平

《思忆文丛》主编：

牛汉 邓九平

目 录

前 言

- 艾 青 / 散文诗四首 1
- 程光炜 / 艾青在 1956 年前后 7
- 顾学颀 / 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18
- 冯亦代 / 记刘尊棋 27
- 冯亦代 / 记前纱络胡同 31
- 荒 芜 / 伐木日记 34
- 荒 芜 / 刽子手——伐木日记 39
- 荒 芜 / “和稀泥”——伐木日记 44
- 荒 芜 / 小客——伐木日记 48
- 舒 芜 / 让伐木者醒来 53
- 黄苗子 / 床虱 63
- 黄苗子 / 遗嘱 66
- 黄苗子 / 长歌行·读舒芜《让伐木者醒来》 68
- 魏荒弩 / 牧丁和我 70
- 吴祖光 / 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75
- 吴祖光 /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77
- 吴祖光 / 欠帐 79
- 吴祖光 / 从“1957”年说起 82
- 新风霞 / 祖光是个男子汉 94

- 郁 风 / 最可怀恋的地方 97
- 萧 乾 / 放心, 容忍, 人事工作 101
- 徐懋庸 / 不要怕民主 109
- 徐懋庸 / 不要怕不民主 111
- 李慎之 / 大民主和小民主 114
- 黄秋耘 / 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124
- 黄秋耘 /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136
- 汪曾祺 / 随遇而安 140
- 刘 衡 / 只因我对党说了实话 148
- 乐黛云 / 我的理解 我的怀念 193
- 乐黛云 / 透过历史的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197
- 孙 钿 /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201
- 公 刘 / 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211
- 丁 耶 /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 220
- 秦兆阳 / 追求 229
- 秦兆阳 / 忆肖也牧 235
- 邵燕祥 / 1957: 中国的梦魇 241
- 徐铸成 / “阳谋”——1957 265
- 冯英子 / 遍插茱萸少一人——敬悼徐铸成先生 282
- 刘乃元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298
- 戴 煌 / 我听话成了“右派” 317
- 刘绍棠 / 往事不堪回首(节录) 324
- 从维熙 / 薄柳雨凄凄 335
- 朱 正 / 丁酉年纪事 344
- 柳 萌 / 那条小胡同 362
- 柳 萌 / 雨天 364
- 柳 萌 / 无言的等待 367

- 林 希 / “少写”六记(节录) 373
钟惦棐 / 电影的锣鼓 388
姚芳藻 / “电影锣鼓”大风波 394
钱辛波 / 交心成“右派” 401
唐 瑜 / 反右记 405
黎 白 / 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 409
饮 可 / 散文三篇 422
牧 惠 / “漏网” 448
刘发清 / 作贼记 455
刘发清 / 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460

艾 青

画鸟的猎人

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鸟。”

于是打猎的人检查了那个徒弟的枪，枪是一枝好枪，徒弟也是一个有决心的徒弟，就告诉他各种鸟的性格，和有关瞄准与射击的一些知识，并且嘱咐他必须寻找各种鸟去练习。

那个人听了猎人的话，以为只要知道如何打猎就已经能打猎了，于是他持枪到树林。但当他一进入树林，走到那里，还没有举起枪，鸟就飞走了。

于是他又来寻找猎人，他说：“鸟是机灵的，我没有看见它们，它们先看见我，等我一举起枪，鸟早已飞走了。”

猎人说：“你是想打那不会飞的鸟么？”

他说：“说实在的，在我想打鸟的时候，要是鸟能不飞该多好啊！”

猎人说：“你回去，找一张硬纸，在上面画一只鸟，把硬纸挂在树上，朝那鸟打——你一定会成功。”

那个人回家，照猎人所说的做了，试验着打了几枪，却没有一枪能打中。他只好再去找猎人。他说：“我照你说的做了，但我还是打不中画中的鸟。”猎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可能是鸟画得

太小,也可能是距离太远。”

那猎人沉思了一阵向他说:“对你的决心,我很感动,你回去,把一张大一些的纸挂在树上,朝那纸打——这一次你一定会成功。”

那人很担忧地问:“还是那个距离么?”

猎人说:“由你自己去决定。”

那人又问:“那纸上还是画着鸟么?”

猎人说:“不。”

那人苦笑了,说:“那不是打纸么?”

猎人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先朝着纸只管打,打完了,就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了几个孔,就画几只鸟——这对你来说,是最有把握的了。”

偶像的话

在那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

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

“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末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养花人的梦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

接着说话的是睡莲,她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

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

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

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

兰花说:“我看重友谊。”

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

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1956年7月6日

(原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蝉的歌

在一棵大树上,住着一只八哥。她每天都在那儿用非常圆润的歌喉,唱着悦耳的曲子。

初夏的早晨,当八哥正要唱歌的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叫声,她仔细一看,在那最高的树枝上,贴着一只蝉,它一秒钟也不停地发出“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声,好像喊救命似的。八哥跳到它的旁边,问它:“喂,你一早起来在喊什么呀?”蝉停止了叫喊,看见是八哥,就笑着说:“原来是同行啊,我正在唱歌呀。”八哥问它:“你歌唱什么呢?叫人听起来挺悲哀的,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么?”蝉回答说:“你的表现力,比你的理解力要强,我唱的是关于早晨的歌,那一片美丽的朝霞,使我看了不禁兴奋得要歌唱起来。”八哥点点头,看见蝉又在抖动起翅膀,发出了声音,态度很严肃,她知道要劝它停止,是没有希望的,就飞到另外的树上唱歌去了。

中午的时候,八哥回到那棵大树上,她听见那只蝉仍旧在那儿歌唱,那“知了——知了——知了——”的喊声,比早晨更响,八哥还是笑着问它:“现在朝霞早已不见了,你在唱什么了呀?”蝉回答说:“太阳晒得我心里发闷,我是在唱热呀。”八哥说:“这倒还差不多,人们只要一听到你的歌,就会觉得更热。”蝉以为这是对它的赞美,就越发起劲地唱起来。八哥只好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傍晚了，八哥又回来了，那只蝉还是在唱！

八哥说：“现在热气已经没有了。”

蝉说：“我看见了太阳下山时的奇景，兴奋极了，所以唱着歌，欢送太阳。”一说完，它又继续着唱，好像怕太阳一走到山的那边，就会听不见它的歌声似的。

八哥说：“你真勤勉。”

蝉说：“我总好像没有唱够似的，我的同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唱一支夜曲——当月亮上升的时候。”

八哥说：“你不觉得辛苦么？”

蝉说：“我是爱歌唱的，只有歌唱着，我才觉得快乐。”

八哥说：“你整天都不停，究竟唱些什么呀？”

蝉说：“我唱了许多歌，天气变化了，唱的歌也就不同了。”

八哥说：“但是，我在早上、中午、傍晚，听你唱的是同一的歌。”

蝉说：“我的心情是不同的，我的歌也是不同的。”

八哥说：“你可能是缺乏表达情绪的必要的训练。”

蝉说：“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表达不同的情绪。”

八哥说：“也可能是缺乏天赋的东西，艺术没有天赋是不行的。”

蝉说：“我生来就具备了最好的嗓子，我可以一口气唱很久也不会变调。”

八哥说：“我说句老实话，我一听见你的歌，就觉得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蝉说：“那真是太好了。”说完了，它又“知了——知了——知了——”地唱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也上升了……

1956年8月4日

（选自《野百合花》花城出版社）

程光炜

艾青在 1956 年前后

就在 1956 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这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前一年的 7 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凭他对《人民日报》动向的注意，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令他惊愕的是，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的 5 月 18 日，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 月，《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

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 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压制李希

凡、蓝翎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国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丁、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了丁玲与艾青的关系。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丁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青对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嘲笑，曾模仿丁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丁、陈“打抱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法，后者是暗指周扬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协支部开会批判丁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丁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

正是艾青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种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猎。”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

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你们假如要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流不出一滴血的。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是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养花人的梦》是应和“双百”方针所做,文字风格上多少有些鲁迅散文诗《野草》影响的痕迹,只是有点晦涩,却没有太多的沉痛罢了。末尾倒不乏尖刺,诸如:“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力。”又如,“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等等。另一篇《蝉的歌》,语多涉及人格的异化,“蝉”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无察觉。写到这里,艾青不由为自己一段时间缺乏风格的写作大发感慨了,但他又不禁借蝉之口为自己辩护:“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发表不同的情绪。”然而,痛苦毕竟是痛苦的,它甚至于无从说起,艾青的“牢骚”除了可以得一时之快,大约是改变不了任何现状的。

事情发展之快,却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间,因离婚而在东总部胡同22号楼上“蜗居”的艾青,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是作协人事科干部的高瑛。他不久获知,高瑛系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龙口,9岁时,随父母闯关东迁居佳木斯,15岁考入松江鲁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5月,随丈夫谭谊调入中国作协,谭被安排在组联办公室任科长,高瑛则去了人事科。据高瑛说,她认识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风后,有很多文件要及时递送,作协就抽了几个人负责为艾青及其他作协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几个人之一。当时,已是初夏,天气挺热,有时忙,她索性就与其他人住在作协,于是,和艾青从此就熟悉了。高瑛还说,我和艾青产生感情,与我无爱的婚姻有关。凭良心说,谭谊是个老实人,也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组织观念强,为人比较朴实,

但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我和他虽然已有两个孩子，作为妻子，却很少感受到他的体贴，更不要说爱情了。对此，我是很痛苦的。……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先是高瑛把实情告诉了谭谊，当时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知道后，让谭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着高瑛被隔离审查，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组织找艾青谈话，表示事情比较严重，让他做好受处分的心理准备。据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当时的事态是比较严重的，作协负责同志在商量处分意见时，不少人力主开除艾青的党籍。因我是机关总支书记，需要我拿意见，我主张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双方有争论，没办法，只好报请上级最后决定。就在等上面“决定”的日子里，艾青非常紧张，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饭，艾青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愕然，但并不意外，让他坐下，他嗫嗫嚅嚅了半晌才坐下来，一边不停地说，我在延安时的情况你了解，看人要看长远！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我劝了他半天，他才回去。当时在东总部胡同 22 号，他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张天翼还悄悄问过艾青的情况，口气里虽有关心之意，却不敢明说。

上级按作协机关总支的意见，给了艾青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法院那边却不那么“领情”，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监外执行。这边刘白羽还不放手，勒令艾青从二楼搬到院里的平房去住。过了一段，艾青用 5000 元买下北京火车站对面丰收胡同 21 号一处有正房、南房、东西厢房的四合院，与婚后的高瑛搬了过去。为此，艾青不无苦涩地揶揄说：“刘白羽想把我扫地出门，未想还成全了我，送给我一个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阴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 年，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授帮助中共整风，说话比较过激。在高楼深院的中国科学院，也传出诸多尖锐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社科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墙，领导接触少”，傅

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思想”，童弟周感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如陶孟和发表意见说，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云云；竺可桢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特别对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文，以及共产党会多等提出了批评。据说，对教授、学生们的“牢骚”，毛泽东起初是大度的。范瑞君的文章《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收到二百余封指责信，罪名是有“小资风味”，毛泽东闻讯幽默地对人说，不能让每篇文章都讲上甘岭嘛。

上述种种对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想“帮助”艾青的人，无疑是一种鼓励。在一次讨论艾青创作的会议上，臧××发言说：“对艾青的诗我有一些意见。我对他的诗一向是估价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后写的许多诗，我觉得主题的积极性 and 时代精神相去较远。我知道艾青写诗很慎重，不轻易拿出来发表，但也应该拿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迅速反映时代的变化。”《藏枪记》、《黑鳗》和《双尖山》之所以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恨、对光明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严×认为，《双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陈旧的”。吕×则以为是他“政治热情不饱满”所造成的。刚刚冒尖的青年诗人邵××说话就不讲客气了，他说：“在艾青近年的诗作中，仍然使人听到他过去诗作中的旧的腔调。”曾为艾青学生、后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郭××，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不留余地”，但还是指出，“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多半是艾青写作的一个局限。在五十年代，认为你和旧时代“藕断丝连”、“思想感情陈旧”，无异于一种政治性的“判决”。这次会议对艾青的打击，尤其是对他心灵的挫伤，是可以料知的。1956年整整一年，艾青写作不辍，应该算是

多产,但作品明显分成了两类:表现时代显然也力不从心的诗作不时见于报端,如《马头琴》、《女司机》、《官厅水库》等,另外是一些借景咏怀之作,折射出他不寻常的心情。一朵路旁的小蓝花,给了他异常的触动:“小小的蓝花/比秋天的晴空还蓝/比蓝宝石还蓝/小小的蓝花/是山野的微笑/寂寞而又深情。”在诸多诗学文章里,艾青坚持认为,诗歌的色调实际是诗人生命的色调,一种无形的“流露”。不妨说,诗作里这令人无法忍受的蓝色,透出的实在是作者内心深刻的寂寞,一种难有“知音”的伤悲。短诗《长城》,直接透露出夹带着辛酸的沧桑感来:“原是古代的边墙/经受了千年风霜/听不见塞北的笳笛/却记得往日的战场。”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针对自己解放后想象力的减退,不无苦涩地表示:“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点满露水,现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

不过,艾青绝对没有料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转眼到了1957年春。1月18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农村问题 and 经济问题,一为思想动向问题。一些地方虽已有“闹事”情况,但因为“思想动向”是作为其中一个问题提出的,故未强调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毛泽东在会上讲,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党内少数人动摇,但绝大多数干部是正常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国大乱子闹不起来。他说,对于大民主,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加以分析。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毛泽东不排除阶级斗争的分析,但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仍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形势”并没有按他预料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人过激地提出“共产党下台,让国民党回来”的口号,对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里愤怒地写道：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情况不同。文章最后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等于正式发出了警告。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更为明确地发出了反右的指令。7月17日到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6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为这场斗争“定了性”，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样，形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在50年代，作为中国政治最敏感部门之一的中国作协，几乎在青岛会议刚刚落下帷幕之际，就在作协内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斗争运动。8月6日，作协在四次有作协分会负责人和省、市委宣传部长共二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的基础上，举行第十二次会议，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目标转向冯雪峰。第二天，显然是事先已准备好了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赫然醒目的“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为正副标题，公开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罗烽、李又然和白朗的名，除冯雪峰一人外，实际把延安的文抗一锅端了。艾青的主要罪名是“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员”，他曾在家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文艺界有“两个底”，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另一个是江丰，斗他们无非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对艾青来说，在党报上被公开“点名”令他措手不及，更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然而，更叫他惊骇不已的是，原先的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公

然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一次，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开艾青的批斗大会，臧××、冯×、徐×先后发言，声色俱厉地痛斥他生活腐败，甚至大讲某些“细节”，令艾青无地自容。情形之卑劣，超过了延安整风。艾青欲起身解释，立即有一些人大喊：“艾青，你老实点！”两年前，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正当主席宣布决定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走上台要求发言，艾青认出他是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只见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区分开。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毫无畏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这一幕情形给了艾青极深的印象。胡风罹难，尚有不怕死的诤友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鄙人落难，众朋友却做了“墙倒众人推”的角色。艾青不由不感到满腔的悲愤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批斗还在升级。一次开批斗会，有人对他算起历史旧账，说他反党由来已久，从延安起就是富有经验的老手，但又特别善于伪装。解放后，在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窜来窜去，上窜下跳，他的这种身份，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国时那个游说列国的苏秦。另有一位名作家揭老底道：去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了艾青，艾青不服，乘中间休息，周扬同志对他讲：“我是对你提出希望。”没想他却反唇相讥道：“我知道你的份量。”态度极其恶劣。还有一位作家愤慨地站起来说，艾青这个人太狂妄，他多次散布说，目前某些人写不出作品，就弄理论，理论弄不成，就搞行政。结果是行政管理论，理论管创作，一个婆婆压一个媳妇，创作还有什么希望？艾青请示主持会议的刘白羽，问能否为自己说几句，他冷淡地挥挥手，拒绝了。

然而，最令艾青难受的还是那些连篇累牍、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对方操着各式武器，而被批判者只能赤手空拳，被人拳打脚踢，却毫无自卫的权利。艾青越是怕看报，每天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份份报刊，急促地搜索上面的文章。在《诗刊》1957年第九期

上,该刊副主编徐×发表《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在文章里,徐×疾言厉色地问:“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前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他与徐×四十年代初就已认识,关系应算不坏,见他如此下手,心里不免伤心。紧接着,又读到沙×发于《诗刊》第十期的《艾青近作批判》。他记得,仅仅就在今年《诗刊》第四期上,沙×曾撰文对自己的诗大加颂扬,未想他见风使舵竟如此之快。更未曾料到,沙×的措辞会如此恶俗,如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足见人格之阴暗。读及此处,艾青眼睛紧闭,半晌才回过神来。他接着翻阅9月8日的《文艺报》,一篇文章称李又然是“丁、陈反党集团的爪牙”,又翻出“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而肃反以后这一年期间,一课也没有上过”的琐屑小事;再看有关自己的,无非仍是帮助丁、陈和江丰、吴祖光等“向党进攻”之类。他不由感到厌烦,索性只浏览题目,不再看内容,往下计有:《诗刊》第九期,田×的《艾青,回过头吧》,《人民日报》9月6日,白×的《有这样的诗人》,《文艺月报》第十期,姚×的《“大诗人”》,《文艺学习》第十期,臧××的《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什么》,《诗刊》第十二期,晓×的《艾青的昨天和今天》,《文艺报》第23期,李×、阮××的《诗人乎?蛀虫乎?——评艾青》等等,等等……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朋友,以时代的非常情形计,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说的话也言不由衷,倒也不是不能体谅。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而且有“欲加之罪”之心,不惜抛却读书人的儒雅、检点,满口恶言秽语,这就令他大为震骇了。更叫艾青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停地写检查,而且似乎永远都通不过。据高瑛回忆,当时已是初秋,北京早有凉意了,然而,经常见艾青大汗淋漓地坐在桌旁,伏案写所谓“交待”。有时,着实无话可写,他又不愿违背良心说假话,

写检查骂自己,只有在桌前枯坐,久久无话,待见窗外夜深,才长叹一声,也不洗漱,裹衣而睡,情状十分凄惨。这年秋,出访捷克回国途径北京的阳太阳,到丰收胡同 21 号探访这位老右,对他形容的枯槁、无言的沉默惊讶万分。

《天涯》编者致作者

来稿提供了一件政治与精神的历史个案,相信能引起读者沉痛的反思。考虑到目前浮躁的阅读风气,未经你的同意在多处用××代替某些当事人的名字,是为了将思考引向理性而避免个人情绪化的指责和起哄。施害于艾青先生的恶行,哪些是出于造神运动之下的虔诚盲从?哪些是出于政治恐怖之下的无奈自保?哪些是出于满足利欲名欲的心狠手辣?……历史和心理世界都是复杂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作出严正无私的探寻与清理。

最近清理历史悲剧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黄河》杂志上林贤治谈胡风案一文以及本刊摩罗的文章,都触及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隐痛。而由我们这一代人来遥测上一代某些人(包括许多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失敬重的文学先辈)的错失,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有幸身处“安全地带”的后人有何道德优越。与大作同期发表的有徐晓《幸存者的不幸》一文,建议你不妨一读。该文剖示出即使是一个英勇抗恶的时代新人,内心也无法避免精神上的自我拷问。看看九十年代社会上依然普遍存在着的见义不为、明哲保身、媚权跟风,甚至以恶为乐之类的败相,相信你也能同意:有关政治压迫、文化积弊以及人性普遍弱点的话题,将来也会成为后人评价今天的视点。我们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前提是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历史。

(原载《天涯》,1998 年第 2 期)

顾学颀

记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寿,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O·V、吕克玉,浙江义乌县人。和他熟悉的人们无论当面或背后,都亲昵而尊敬地叫他“雪峰同志”或“雪峰”。这个极普通而平凡的称呼,实际上超过了寻常字面的意义和感情,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寓言作家;领导过“左联”的各种活动;与鲁迅有不寻常的关系;并且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家。他的理论、著作和生平重要事迹,都为当代文艺界所熟知,用不着我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我与他个人交往、同事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岁月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作为对这位年尊望重的长者的纪念。

他去世快20年了,经常想写一点什么纪念他;仅在他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写过一篇四言体的挽诗,诗很短,为他的不幸遭际感到不平,未及其他。我想,这是不够的。但每次提笔,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一直拖到现在——我准备写的《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纪念性的文章),二十来位师友,差不多都写完,并多已在台湾和大陆发表过,可能编印成一本册子的时候,惟独多次想写而未写出的敬爱的雪峰同志,尚未在白纸上变成黑字,真有点对不起他,说不过去!于是,在每天多次服各种药物的情况下,勉强执笔

写下几行很不显眼、不值一提的小事，聊抒对他的怀念之情。

说来很惭愧，因为我一向搞中国古典文学，钻故纸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各高校教书，对于当今新文学界的人物很生疏，除了读过几位大文豪如鲁迅、茅盾等人的名作以外，其余的许多作家、作品和新文坛的许多活动，都很隔阂、模糊、不甚了了。同样，对冯雪峰同志的大名，也是在解放前后才渐渐清楚的。大约在一九五二年冬，我在《文艺报》上看到雪峰写的讨论《水浒》的文章，知道他是该报的主编，但不知他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对那篇文章谈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意见，并附带谈了我对整理中国文学名著如《水浒》、《三国》之类作品的看法，作为一个读者，把意见寄到该报。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他的亲笔回信。除了简单谈到《水浒》一文外，并着重地询问我的工作、写作等情况，还嘱咐要我回信。回信告诉他，我一向在大学教书，目前正写完一本关于元曲研究的小册子。因为图书馆还未完全开放，许多书不借出阅览，许多材料没有看到，只能草草完工，等以后条件好了再深入研究、完成。很快，又得到他的来信，要我把那本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转给他，并转交该社古典部负责同志看。并说，该社古典部正准备编选一部有关元曲的书，很希望我也能参加这项工作。于是，我送去稿子，准备和他见面。当时，他不常到社，由一位女青年同志（秘书）代收（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一位女翻译家谢素台同志，她是我在出版社认识的第一个同事，后来还同在编译所共事几年）。

不久，就接到文化部通过教育部转到我的工作单位的调令。那时，我在刚从老区迁京的中央财政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因为正逢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的几所大学的财经各系都合并到该校，改名中央财经学院。设备、书籍、人事、课程等等都需要安排，第一学期并未开学，但有许多创建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所以学校虽接到调令、同意我调走，但必须把未完的工作大致就绪以后才能走。因而拖延到次年二月底，我才到文学出版社报到，三

月初正式上班。可是上班好多天，并未见到他和古典部的负责人。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次古典部的会议上，才初次和冯雪峰同志见面。他的那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带有很浓厚的农民淳朴气息和老革命家的气概，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感觉。他除了一般寒暄之外，详细问了我的工作安排、日常生活和到社后的感受等等。有一次，开完会我去看他，顺便问他对我的那本稿子的意见，请他指教。他很谦虚地说：对于元曲，仅仅浏览过一些，没有研究；虽看过那本稿子，但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的印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都是对的，但比较粗糙，还不够深入，资料不够充实，还得继续钻研，希望多加努力（后来，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已由作家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台湾先后出版。并另外编注了一本《元人杂剧选》出版，被国内外一些大学中文系采用为教材）。当时我听了觉得非常中肯，不失为一位专家和长者的教导。

他是社长兼总编辑、并兼鲁迅编辑室主任。鲁编室和社本部不在一处，他常在鲁编室工作，到社本部的时候较少，因此，除了一两次春节时我到他家拜年之外，平时我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60年代我们调到编译所以后，每天就可遇见。

出版社初建立时，全社除出版部、行政部门之外，共有六个编辑室和后建立的一个编译所，出版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还有八个期刊，颇具一个国家专业出版社的规模。初建时，人员很少，冯雪峰同志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罗致人才、充实编辑力量上面，从各个渠道调来一些专门人员。从他平时的谈话和实际的作法上，当然他也有所偏重。他和编辑室的负责人积极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调集编辑力量，充实队伍，以便打好出版社的基础，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对古典编辑室，也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和聂绀弩一道，先后调来许多曾在大学任教的人员到社工作。我到古编室之前，这里仅有黄肃秋、文怀沙等三位同志。之后，陆续又调

来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迺冬、周汝昌、严敦易和钱南扬、王庆菽、童第德、冯都良等人，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一次开室务会，冯也参加了，谈了许多本社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又谈到本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在和社外专家作比较时，他非常得意，认为我们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不会弱于大学或研究机构。他说：有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故事来作比譬，有一个人胆小怕鬼，一天晚上，看见窗户外面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晃动，向窗里窥视，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向前闯入室内。屋里的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注视外面，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久，不料这人突然打个喷嚏，外面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才知道里面的不是鬼，就拔腿而逃。里面的人也才知道外面的也是人、不是鬼。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对待社外专家、和他们打交道、审稿件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有什么意见该说的尽管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我们出版物的水平。听了这个故事，大家大笑，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和他在一起开会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寓言式的发言，得到一些启发。

过了不久，他主编的《文艺报》，受到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批驳，引导了全国文艺界对“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批判运动；他的检讨，也未获得通过，主编的职务，当然被取消。紧接着，一场名义上是文艺界的而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大风暴降临的前奏曲开始了。这是由胡风“该死的”“三十万言”引起的，搞得文艺界人心惶惶，与胡风本人或与所谓“胡风集团”有关的人，都免不了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例如文学出版社的聂绀弩和冯雪峰，前者和胡的私人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冯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和鲁迅、胡风等人搞文艺活动甚久（如领导“左联”、办刊物等），关系也不算浅，所以批判、审查“胡风集团”时，冯也免不了要检查、受批判。聂、冯经审查后，幸亏都不在该“集团”之内，然而仍不免沾了一些腥膻。接着，又发生了“丁陈集团”一案，又是一次不大不小令人心惊肉跳的风

波。冯和丁玲、陈企霞都是文艺界的老朋友，尤其和前者关系更深。批判丁、陈，自然又与冯有关系。虽然也不是他(她)们集团里的人，但接二连三的审查、批判，精神上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刺激和实际影响的。这时，《文艺报》主编的头衔早已没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桂冠，也在摇摇晃晃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平常，他不大过问出版社的日常事务，也不常到社办公，由一位早已来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也是冯的朋友)代替他执行任务。他和这位胸怀雄才大略的副社长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也乐得清闲不管。这位副社长下车伊始，就想对出版社大力“整顿”一番。这时，古编室在聂绀弩不很循规蹈矩的领导下，被社里许多权力人士议论纷纷，说是“闲谈乱走”，“一团和气”，“打伙求财”，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偏偏聂和这位副社长在职权上(聂也是副总编辑)和某些具体作法上意见很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不巧，又遇上与胡风私人关系密切被审查的不利条件，于是，古编室便成了被“整顿”的对象。接着“丁陈”案件、“胡风集团”案件接踵而来的是十二级强烈台风的“反右运动”的来到。很自然，由那位副社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古编室就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从正、副主任起，所有业务骨干如小说、戏曲、散文、诗歌(沾边)几个组的组长和几个年轻的助编、编辑，几乎一网打尽，大多成了“右派”；并有正式的封号，叫做“右派小集团”、“独立王国”。运动的开始阶段，冯还在领导地位上，很快就被卷入“右派”大网罗之中了。听说他的问题主要在社外，当然，社里有些问题，总不免会牵连到他头上。于是，他也和我们这批“右派”一样，受到“批判”、降级等等待遇。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一件他也没料到的意外事。那是1957年6月初，社里已开过几次高知座谈会，他是主持人，叫大家大胆提意见，不要有顾虑，说得很激动，有句过头的话，叫大家“有冤的报冤”，当时人们很欣赏这句话。那几次会我都没参加，因为我早想

离开这里,已有两个单位分别和出版社谈过,要调我去,所以我不想参加社里的座谈会。可是冯见我几次都没去,他就屈尊亲自到宿舍我家动员我参加明天最后的一次会,无论如何,务必参加并发言,有意见尽量提出来。我碍于情面,答应一定去。社党委书记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受冯的嘱咐,也到我家劝我参加明天的会。这样,我就被两位好心人无意地推到了卤水池的边缘上,只要我的脚一动,就会轻易地掉进深渊。当然,我从不埋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蒙蔽不知底细的人。第二天,我果然参加了座谈会,并放了本不应该放的大炮,一下变成了被猎取的对象,成了出版社的“头等”煊赫人物。只怪我不机灵,这次会已换了主持人,不是雪峰,而是那位副社长,这里面大有文章,冯可能已被通知不再当主持人了。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阳谋”也好,阴谋也好,反正有几十万、百万(难以统计)人,一夜之间,都被“错划”成“右派”了。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以及毫不相干的人被株连,受连累,人数就更难估计了。这么多的人,忽然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准阶级敌人”,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谋者难道不应该冷静一下头脑,深刻地反省一下吗?事情就这么突然,也异乎寻常地简单,昨日的座上宾,忽然成了今日的阶下囚。这件事的深远后果,不仅相当长的时间刻印在国内人的头脑里,也同时给好心的或别有用心心的外国人用作评论或攻击我们的口实。有人安慰并表示遗憾,说:如果不去参加那次会,不就免掉了那场大祸?我不认为是那样,虽然也包含着某些偶然性的可能。然而,“命里注定”,“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的难逃”。你既然被列入“知识分子”、尤其“高知”之列,你就必然成为被猎取的目标,“漏网之鱼”是很偶然的。我在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写的四言体的挽诗,最后两句:“哀彼冥鸿,毕张弋送!”弓箭网罗都摆好了,你还跑得了吗?

之后,雪峰的几顶桂冠都被摘下,降级,仅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在社里工作。我,更不在话下,降五级之后,“蒙恩”仍留在岗位上

工作,但不定期的劳动时,成了麻将牌里的“听用”、劳动“常委”。记得约在五八年夏秋的时候,我正在昌平区居庸关下文化部劳动站劳动,每天走过大河沟上山挖鱼鳞坑、树坑。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劳动队伍几十人也来了,帮着挑水上山浇灌新栽种的树苗。忽然看见雪峰同志也在挑水队伍当中,从水沟里挑着一担水,往几十米、百多米的高坡上挑,往树坑里灌水。那时,他已五十多快六十岁了,曾经动过手术,割掉半个胃,身体不太好。我看见了,真为他难过。收工、吃饭后,我去看他,问他身体怎样?挑水上山,太累了,受得了么?他笑了笑:这不算什么,从小生长在农村锻炼出来了。并问我在这里劳动,身体怎样?从谈话中看不出他有什么难受和委屈的表情。表现了一位经过几十年革命洗礼、锻炼的老革命家的风度,使我十分钦佩和尊敬。

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饿饭时期,政治气氛不得不放松一点,让人们喘口气、缓过来。出版社也作了一些调整。雪峰和我都分别由编辑部调到成立不久的编译所工作。开始没有正式房间办公,只好把我们新调过去的人放在一间东西晒的杂屋里,几张办公桌一摆,几乎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雪峰的桌子正好在西边窗户下,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但还是一本正经坐在那儿看稿子,不说一句闲话,更没有一点怨气,体现了他的涵养和胸襟开朗。不久,就搬到东楼上编译所较宽阔的办公室了。我们分别在几间屋里办公,每天上下午工间操时,都可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兼游艺室里见面。这里,有搞俄、英、法、德、日等语翻译的,有搞古典文学的,有搞新文学史资料的,雪峰还是搞他的鲁迅著作编注工作。人才济济,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我欢喜打乒乓球,在这里还数得上名次。我们打球,其余的人坐在沙发上观看、议论或谈别的什么。这一段时间,过得还比较轻松愉快。看上去,雪峰总是面带微笑,和大家交谈,看不出有什么沮丧的神气。当然,大家对他仍然十分亲切和尊敬,把他当作一位善良淳朴的长者。他当权和下台的时候

候,对人的态度都前后一致,没有两样:在台上,没有颐指气使的那副高人一等的气派;到台下,也没有怨气冲天或自卑的可怜相。他还是依然故我,不亢不卑,谦和谨慎。有人说他颇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傲上而谦下。听说他开始当社长时,一次在文化部开会,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他反对某位副部长(实际上的部长身份)的意见,辩论激烈,后来拂袖而去,根本不把那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他和那位上司,在“左联”时期就因为众所周知的两个口号问题意见不合,闹过别扭。解放后,冤家路窄,又碰到一起,并作了领导和部下,两人心里多少总有些芥蒂、隔阂。平心而论,以雪峰的革命经历,对新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在文艺界的声望,让他当一个区区的出版社社长,似乎确实有点屈才,虽然他自己不计较职位高下,但旁人总多少有这种看法。

在编译所共事几年里,从来没看到他对人疾颜厉色,总是和和气气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紧张,连纸烟也是按级别等级发票购买的。我被降了五级,没有资格买高级香烟,一个月最多也只买几盒“恒大”、“光荣”烟,其余更差的烟,我也不要。烟瘾虽不大,但几盒还是不够抽的。雪峰知道这种情况,常常问我烟够不够抽?我说:烟瘾不大,足够抽的,还想率性戒掉哩。他虽然也降了级,但还够买高级香烟的资格,每逢发了烟票,买到熊猫、中华等高档烟时,遇见我总要递一支给我,当我吸燃后,他又抽出一支给我,说:留着明天再抽。我不好意思再接,又无法谢绝他的好意,我说:您也不够呀!他说:我够,还有朋友送。没关系,抽吧!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对同事、朋友的关心与爱护之情。

“文革”中,文化部大部分人马都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围湖造田。雪峰同志那时已六十多岁了,“右派”帽子已摘掉,但仍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淖地里整地、插秧、割麦,他总是一丝不苟认真干,比年轻人还卖力。记得一次在冬天刨冰块地,他抡着丁字稿往半尺厚的冰地上挖,满头大汗,大家劝他休

息,他不肯,说:不累。从这些小地方看,他办事认真负责、一点也不肯马虎的实干苦干精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的。

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我们早都从干校回来了。一天,我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新桥原先幼儿园的一间不很大的房间里,屋里阴暗潮湿,温度极低,好像没生火,屋里只有他和卧病的夫人,没有别人照顾他们。我们只简单地谈了谈彼此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他面带忧容,精神不佳,可能是因为他夫人的病情比较严重。我见状,不便多打扰,就告辞走了,这算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出现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朋友们谈起他来,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悼念他,为他高唱赞美歌,也为他不平凡的、坎坷的一生而惋惜。

敬爱的雪峰同志,安息吧!

1994年9月18日于团结湖北里,时年八十晋二

冯亦代

记刘尊棋

去年一个寥落的秋晨,我得到何老师请人打来的电话,说她挚爱的尊棋,经过长期病魔折磨之后,已经安然地走了,使我顿时全身木然,说不出半句话来,一直到话筒里传来滴滴的表轨声,才使我发现对方已挂了电话。他的去世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想不到这样快。他在久病的时候,我没有去探问他,因为我不忍见一位顶天立地的血性汉子,陡然变为痴呆认不得人;他那微弱的眼风里,似乎还是知道你是谁,就是说不出声音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惨状。人生在世,总要临到这一天,但我希望他能溘然而逝,不再留恋那曾经折磨他45年不得安生的这个无情的尘世。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但是我的感情不让我这样做。每当我铺开稿纸拿起笔来的时候,他那双充满柔情的眼光,便显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这个自以为泪水已经流尽的老人,禁不住潸然一片,无法落笔,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收起笔来,无言久坐在窗前。

我认识尊棋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我一直对国际问题有兴趣,又在香港遇到了乔冠华,在读他诗样的政论文章中,我学到了些应该知道的知识。当时在重庆读到尊棋的文章,众多的材料与精辟的分析,使我折服。我曾经多次在美国新闻处的酒会上遇到他,总要找空隙谈几句,我发现他是个感情十分细致的人。惺惺

相惜,从此结下了快半个世纪的友情。

194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天他找我到他家吃晚饭,席间他告诉我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胡乔木希望我参加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在北上开会之前,曾经得到乔冠华的口信,要我等他同我见了面,再决定我的行止。我当时便把这个意思和尊棋讲了。他答应再去和胡乔木说,同时希望我也不要拒绝。后来廖承志叫我去谈筹备国际宣传机构,这一次谈得比较具体了,他说乔冠华将来主持这一工作,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闻总署所属国际新闻局由乔冠华、刘尊棋主持,我则在他们下面做行政工作。我觉得这一时期,是我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时期。从新闻总署到国际新闻局都是在解放前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人,而且当时党与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泾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三反运动后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撤销,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组织虽变,人事大致照原样,除了社长改由师哲担任外,新闻处划归新华社,其他变化不大。那时领导上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我是非党员,做行政领导工作不合适,私心里则想回到写作的老本行。尊棋同志和我作了次长谈,要说服我,但我总觉担任行政领导,既非我的初衷,而在“三反”运动中看到那些过火的行动,我也有些寒心。但是为了做到听党的话,我答应代理一时,等有了党员来接替,我就回我的业务工作。后来调来了党员做主任,我就专职做出版工作了。

过了些日子,我看到尊棋似乎有心事,社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副社长也增加了人。

逐渐我才在风言风语里,知道组织上正在审查尊棋的历史,说他是叛徒。我就十分纳闷,因为关于尊棋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事,我曾经和他谈过。我也曾经读过《鲁迅全集》中的文章,知道胡适曾经代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调查过当时北平政治犯监狱,他当

时曾和一个政治犯用英语对话；那个讲英语的政治犯就是尊棋。陪胡适去监狱的有王卓然，他当时正在为张学良收罗各方精英，视察回去之后，便要了张学良的一张手令把尊棋带出了监狱。至于监狱囚徒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决议开除尊棋的事，那完全是在仓促和不知详情中造成的误会；因为尊棋释放的经过，狱内党支部并不清楚。关于登报脱党的启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防止共产党员重新为党工作的阴谋诡计，在白区工作过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一定不出叛徒。

尊棋的事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病榻上遗书，详述尊棋出狱的经过，否则时过景迁，主要的当事人王卓然又去了世，尊棋也将冤沉海底，永无翻身的日子了。他被审查之后，我们虽比邻而居，但是我非党员，所以对他们的事也不敢多问。等我再见他时，已在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了，那天宣布最后结论，我记得他和我都大哭了一场。他当然是满腹冤枉，我却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谁让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呢。

我再见到尊棋已在1959年冬天。有人告诉我他已从北大荒回到外文出版社，组织上决定他下放湖南，他希望和我见一面。但等到我去找他时，他已于前一日启程了，真是失之交臂。那时我们都是待罪之身，不敢自由行动，无处不有监视，尤其我所在的《中国文学》编辑部。我的一举一动那位女领导人都可随时得到小报告，向我盘问，加以批评。我未见尊棋，心里十分懊丧，因为我认为像他这样精于外文业务的人，中国又有几个？放到山野之地，不免浪费人才。果然他在乡间打了几年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受过“驯服工具”的教育，决不会多说话。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有次在一个会上遇见了胡乔木，他询问我关于尊棋的情况，当时他听了似乎没有表示什么，只微露惋惜之意。我感到有机可乘，当晚就写信告诉尊棋，要他写信与胡乔木联系。我说眼前正需人才之际，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不久之

后,他终于回到北京。

为了弄清他的问题,他经历了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时间是久了一点,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的病榻遗书,否则人证俱无,要搞清楚他的问题,就成为一件难事了。但是我想初审者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工作搞得更为客观,更耐心,不要一下子就扯到敌我问题,也何至于要拖 45 年之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他 1931 年 1 月入党的决定。然而毕竟尊棋还是幸运的,在他生前就平反改正了,因此还留有若干年的风光,也多做了不少工作,使他能贡献所长,心理上得到平衡。否则死后昭雪,事情虽好,但为时过晚了。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们的长谈。记得那是个漫天大雪的冬日,我和他从外交部参加一个会回国际新闻局,时已中午,便在过北海时上了白塔。我们二人在白塔旁边的餐馆里吃午饭。纷纷扬扬的大雪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们两人要了几两酒和几个菜坐了下来。在喝过几巡之后便各诉起心曲来。那是他首次告诉我他的历史,草岚子胡同的监狱生活就是那次谈的。当然他也谈了以后为党做的工作以及在延安访问毛主席,我也讲了自己的历史和走过的路。自从那次畅谈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他年纪比我大,我自此目他为老大哥;在我生活与思想有什么问题,便向他请教帮助解决。三反运动中,我对于有些做法颇有意见,特别对于大胆怀疑不考虑实际情况,对于有错误嫌疑的人一概视之为死不悔改,有我的看法,他那时也已见到国际新闻局的运动走了弯路,对过火的行动如逼供信扩大化等,也有所觉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认为群众运动中难免有偏差,最后党总会搞清楚的。我当时也相信他的话,不过现在看来,这过份的自以为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实在太可怕了。

我不知尊棋在这样长达 45 年的坎坷中得到了什么教训,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轻信某一些人的话,而不

相信甚至拒绝非党人士的证明呢,还是其他? 45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代价是惨重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削弱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还有那个宁“左”毋右的思想,尊棋的例子只是一个不幸中之万幸,所以我说他是幸运的。可惜我没有在尊棋生前和他谈过,然而只要办理一切案件的人能够抱着客观的对党负责的态度,许多的45年便会积聚成为一种力量,这正是今日提出要祥和气氛所求的。如果我们对一些事看得更深一些,事情也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但要求每个人的头脑完全站在一个水平上,究竟也是个过份的要求。

也许我的看法完全错了,但每次想到尊棋,我总会想到这45年对他的伤害。如果以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我希望另外有处理的办法。尊棋的遭遇使我想得很多,在他坎坷生活前途不明的时候,我也没少思索过,我希望现在我的想法不是白想的。

尊棋已经撒手西去了,他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人,但愿今后每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干他应干的工作。

1994年2月16日

记前纱络胡同

北京以胡同出了名,我居然在上国衣冠之地,卜居了四十多年,走过了许多胡同,但自己并不住在胡同里。刚来北京时暂住叶浅予家,那个地方叫大佛寺,一出大门便是热闹的大街。我读过一些谈北京胡同的文章,那种古老宁静的气氛,始终在我心里萦绕。

后来几迁新居，都系临街，与胡同无缘。

1957年“祸从口出”，原来住的美轮美奂的房子，终有一天被“勒令”搬家。对于那几间坐北朝南的屋子，我虽不无恋栈，却也只能自叹运蹇。新搬的屋子在前纱络胡同，这是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那时我正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安娜带信给我，回家时不要走错了门。

我原来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容得我历年收罗的书籍，我想新搬的家肯定不会有原来的气派，但至少我的那些书可以随之迁徙，等我到了家，不免倒抽一口冷气，书籍何辜，也受到了株连。新居之湫隘，简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处，不过是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我的五口红木书柜已经换成三个小得可怜的书架；大部分的书都已卖给了旧书店。幸而安娜知我，几部我喜欢的中西文书籍还塞在两口木箱里，放在床下；不过他们和我的缘分，至此已到尽头。三年困难的岁月里，都已作了口腹之资，真是罪过。旧书店员视我为一个落魄的藏书人，隔三差五总要来我家转转，问有否稀贵之书，我也趁此舍而求食。

前纱络是个曲里拐弯的胡同，路面经过多年煤渣和垃圾的堆压，已较两边屋基为高。屋子原是清时权贵的马厩。幼时朋辈每以我的姓作调侃，称我为“马二先生”，如今可真的成了马住在马房里了。胡同虽无特别显眼的地方，但到了一定的时辰，就有一定的小贩，或打鼓或吆喝，在胡同头尾巡行，倒也耳根不静。到了刮风雨雪的日子，便显得凄凉了。我的屋子后墙外便是街道，有时可以长时间听不到脚步声。

不过那几年正是喧嚣的年头，胡同里可以行人稀少，屋顶上却很热闹。麻雀何罪？忽然变为四凶之一。家家都起了吓麻雀的呼喊与鞭炮声，有时又锣鼓齐鸣，幸而这时不长。麻雀不打了又打树叶，院里有株杨树，树叶做窝头馅儿，是那时的美食，也是救命的东西。

我那时家居养病，一清早听见邻家有人在催取牛奶，便醒了过来，晚上则挑灯夜读，直听到叫卖夜宵声过了，才熄灯就寝，真是“日出而读，夜深而息”。平时见人低头，不敢乱招呼，所以避嫌，屋子里则窗帘低垂，怕人窥测，屋门常关，连嬉笑当令的儿女，也都噤若寒蝉。这就是我蛰居胡同的现实。

以后成为摘帽右派，调了工作，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邻近胡同，但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幽居的情趣，便成为过眼云烟了。但我总不能忘掉前纱络胡同，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踟蹰一番，看惯了大马路，才感到这里的寒伧与湫隘，真该随现代化而改弦易辙了。

1993年12月27日七重天

荒 芜

伐木日记

小 序

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我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陆陆续续记了一些日记，约十万字。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抄走，下落不明。不料去年十一月间，有人发现了那部手稿，并承他的好意，用挂号寄还给我。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1981年12月

高尔基写过一篇短篇，叫《二十六个和一个》。我们这次上山的129人的伐木队中，有3位女伙头军。我们的比数应是四十二与一。但实际的比数，并不如此。象我们所知道的，吴大姐连遭巨变，丈夫病故于前，爱子惨死于后，刺激太深，精神失常，现在住在清水镇医疗所里，奄奄一息，说不定，哪一天早上，她就不声不响，和我们大家告别了。所以真正的比数应为六十三与一。

另外两位女伙头军，按照我们队里习惯叫法是徐二姐和毕三姐。徐二姐原籍绍兴，是鲁迅先生老师的孙女。名门闺秀，家学渊

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编辑,写一手好剧评。这位二姐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精明强悍,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利嘴,说起话来,一句也不饶人。她的丈夫在一个驻外使馆当参赞,一子一女在第四中学读书。当她被划为右派之后,她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跟她丈夫离婚,跟她子女脱离关系。她说,以后各走各的路,她绝不愿意连累别人。她就是那么一个斩钉截铁的人。不信,哪一天轮到你去帮厨,跟她一起淘上半天的大豆和高粱,你就会知道,干起活来,她的那股认真劲儿,是什么样儿的了。如果你在切菜和劈柴时,碰破了皮肉,那她会把她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关于她,有许多可写。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写不完。改天,等到大礼拜,我要跑到山背后去,拿出一整个上午时间来写她。

毕三姐是我们队最年轻的小妹妹,论年纪,她比小刘大一岁,倒数第二。但是全队不论老少,赶她叫三姐,没有半点别扭之感。她随身带着针钱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酸枣刺、野蒺藜给你拉破的棉袄棉裤缝上。有的人把破毛衣送给她织,破衬衫送给她去补。还有人身上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她做的针线。她平常不多言多语,可是她那两只黑黑的大眼睛似乎更会说话些。她在北京的一个科研机关工作,跟她一道来的人说,她自杀过,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发现较早,救治过来。那场空前的大运动,象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枝折干摧。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时期。我记得她刚来时,脸上没有多少血色。两只眼睛看人呆呆的,好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似的。她好像只跟伙房几位大姐说话,就是跟她们说的话,也是极少的。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花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

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

慢慢地，毕三姐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我们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学习会一个大礼拜两次，都在星期一晚上开。实际上是走形式，开的是东拉西扯会。但是就在这个会上，我听过她两次发言，慢声慢语的，很有条理和逻辑性。

她在那个研究高能物理的机关当研究生。她的导师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而且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有一天我问起那位科学家，她说，不久以前，他还给她来过一封信。

“说些什么呢？”我问。

“能说些什么呢？”她反问。“无非是叫我好好保养身体。我们和你们却不同呀！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她的黑色大眼睛直瞪着前方，又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补充了一句，“可是我们呢？我们离开了实验室，什么也干不了。”

“不，你也可以写。写出新的《离骚》来，新的《哀江头》、《丽人行》来。屈原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汨罗江，杜甫到过的地方，最远不过成都，我们走过的地方比他们远十倍。屈原只死过一次，我们死过九次。象我们过去那样，在零下 33 度严寒下，在辽阔的北大荒平原上，给大豆脱粒，打一班，24 个钟头；象我们现在这样，在完达山原始森林里，只要天上一出月亮，我们就上山截木头。这样的事，莫说屈原、杜甫没经验过，就是荒山老林里的猫头鹰也没见过。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 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小刘调走以后，队里派了小董来跟我拉锯。小董跟三姐是同事，过去和她常有来往，还到她家里去过。他告诉我三姐的妈在北

京的一个师范学院中文系里当教授。

“三姐不但在她的专业方面是个尖子，中文的基础也很结实。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这种人反正永世翻不了身了。”

小董这个人，据我的观察，各方面都很好，就是精神有些萎靡不振。我们多次给他打气说，瞅瞅那些大树，凡是根扎得深的，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风越强，雪越大，它越长得苍劲挺拔。但是他抱定了“永世不得翻身论”，听不进去。他的一件棉袄是全队最破烂的，有几处棉絮外露，已经被野刺扯光。三姐给他补过几次，可是实在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

有一天上午，我和小董正在伐树，三姐来了，手里提了一件新棉袄。

“小董，穿上，试试合适不合适。”

“这是给谁的？”小董问。

“给谁的？给小狗儿的。”三姐噗哧笑了。“看你那副样儿，简直象个叫化子。我们从科学院来的，都替你寒碜。大家一合计，就凑了点布票棉票和钱，让我给你缝了一件。”

小董愣了。

“发什么愣，还不赶快穿上。”我说。

棉袄果然做得合适。穿上新衣的小董显得漂亮精神多了。

“这布票、棉票、钱我一定照还。”小董说。

“这裁缝手工怎么还呢？”我说，“我看哪，干脆跪在地上给三姐磕个头吧。”

“那还不容易，”小董一面说，一面果真趴倒磕起头来。“下个礼拜天，我请你去清水镇吃猴头狼肉。老黄作陪。”

三姐笑得前仰后合，我从来没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我今天来有两件事，”她笑完了说。“第一，是给小董送棉袄，第二，是要跟你们伐两棵木头，体验一下伐木的感受。我跟伐木队上山快四个月了，连一棵树都没伐过，那还象话吗？可是，我从小

就害怕使用锯子。我们县城里有个城隍庙，两边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两边两个恶鬼，正在拉锯，把他锯成两半，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我又看到妈妈收藏的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每次我拿起锯子来，我就联想到那种酷刑。”

“善哉！善哉！你是把木头当作有生之人了，这一闪念胜造七级浮屠，”我说。“其实有些人比木头还要无知，即使你锯开他的脑子，也不会流出一滴血来。”

那天上午，小董和我跟她伐了三棵树，两棵红松、一棵黄菠萝。事实证明，她是一个很细心的锯手，尽管体力比较差点。

大礼拜那天，他们果然去吃了狼肉，据说吃的很愉快。我因为临时有点事，没有陪他们去。但接着便有风言风语，说什么七仙姑下凡了，就在伙房里。我听了那些闲话，老实说，很替三姐担心，因为我们队里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定，就是改造期间，一律不许闹恋爱。

有一天，三姐又来送午饭。饭后她主动跑来问我，有没有听到有关她的闲话。我如实地告诉了她。

“你介意吗？”我问。

“我才不介意哩！”她坦然地说。“我恨不得把他们也夹在夹板里，拦腰锯断，那些嚼舌头的！”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株苍劲挺拔的红松来，它的根在丰厚的黑土里扎得更深了，它会在未来的大风雪中唱出一支更嘹亮的歌。

刽子手——伐木日记

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叫他刽子手，连带队的分队长都不例外。比如，工地上出了点什么工伤事故，要找个人把伤员送回营地，这时，分队长就会说：“让刽子手送他回家去吧。”这话，要让外人听了，会吓一跳，但对我们，刽子手那三个字，就象老张、老李一样平常。

不久以前，我碰见了二十多年前一道伐木的老朋友。老友重逢，免不了叙旧一番，我们谈到了往事，谈到了刽子手，朋友感叹说，那么生龙活虎一般的汉子，却给糟践死了，而象曹辛之，瘦得象根麻秸秆似的，竟也挺了过来，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叫人不可思议。

“你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么？”

“不知道。除了跟他一道从歌剧院下来的那几位以外，知道的恐怕不会太多。”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他刽子手吗？”

“这我知道。因为他在一个歌剧里扮演过刽子手的角色。”

“你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得名，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的话。”

“那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谁叫他说的不是时候呢？就是那么一句稀松的话，一经加工，就给他定了案。”

“原来还有这么一档子事。说老实话，他那副模样，可真象个刽子手。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那一张方脸和那一脸胡子，还有那半截铁塔似的个儿，胆小的娃娃们见了他会吓哭的。”

“其实，那也是一种形态的男性美。由于审美观点的不同，有些女同志对于小白脸还不一定很‘感冒’咧。至于说小娃娃们害怕他，那可不一定。有一次，我同他背粮往回走，走到弓背岭下，碰见一个老爷子带着个小孙子从清水镇上看病回来。那个孩子因为腿上生疮，不愿翻山过岭，正在大哭，而老爷子又实在抱不动他。刽子手问清楚了，尽管已经背了五十斤粮食，二话没说，把孩子背了起来。弓背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一路上，他唱着他自己编的《动物园之歌》，学鸟叫，学猴子、大熊说话，并且把他在镇上买的冰糖（那在当时当地，简直是宝贝）分给他们爷俩。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小家伙搂着刽子手的颈子叫大爷。”

“对于音乐，我是外行。究竟刽子手唱的怎么样？”

“我也不内行。刚进北京，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在东单地摊上买了一整套日本重灌的世界名歌选的唱片，那里面有几张世界歌王意大利的卡路索唱的意大利民歌，还有美国劳伦斯·提贝特唱的卡尔门的片段，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歌，我什么都忘记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听见一个意大利的乡村集市的闹声，一个农村妇女唱卖她的鸡蛋黄甜饼的叫卖声，或者好像走进了那个峡谷，就在那个小林子旁边，看见唐何塞为了要叫卡尔门继续爱他，用独眼龙的刀子，把她砍死。有一天，我接到我的大女儿的来信，信中说，由于大跃进，一家都在挨饿。我那个身体最棒的大孩子，首先得了浮肿病。他妈妈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只鸡，想炖一锅鸡汤给孩子补养补养，不料鸡还没炖熟，连锅都被人从公用的大厨房里偷走了。原来，我还以为吃不饱饭的只有我们这些在边疆地区劳动改造的，现在我才知道，连北京的机关干部和家属都在受罪。我们土地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要是全国老百姓没有饭吃，如何得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一个人走向工棚后面的松树林里。夜色乌黑，寒气凛冽。天空只有稀稀疏疏的几颗星，闪闪烁烁，显得又高又远。我摸索到一个树桩坐下。就在那时，从上面远处传来了

低沉的歌声，唱的正是提贝特唱的那一段，就是唐何塞砍死卡尔门之前唱的那一段。歌声完全表达了爱极反成恨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和提贝特唱的同样动人，但是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于是我马上想到了刽子手，一定是他，只能是他。我寻声找去，果然是他。我向他说的第一句就是：‘刽子手，你比提贝特唱的还要好。’他告诉我，他们歌剧院里也有那一套日本唱片，只要他有时间，他就去开留声机，这些年来，他几乎快把那些片子磨平了。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深夜跑到树林里来唱歌。他说，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他不在深夜里一个人出来偷唱，难道还能期望有什么人请他举行独唱会吗？那天晚上，他几乎把一套片子里的歌曲全都唱了。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歌声，我仿佛又回到北京的小屋里了。音乐的魔力是不可思议的，一旦你爱上了它的话。”

“我总是觉得刽子手有点儿怪。有一次，他从新开的水稻田里回来，那时大概是七月里，中午天气相当热了，他头戴一顶大草帽，光着上身，右胳膊上缠了一条五尺来长的大青花蛇，蛇头就翘在他右耳朵旁边，瞪着眼，吐着舌头，他就那么向伙房门口一站，差点没把伙房里的几位大姐吓死，但他却一本正经地问她们，他到底象不象一个玩蛇的叫化子。”

“那次在小清河畔开水田种稻，我也在。我记得，队里还请了两位朝鲜族的水稻专家，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清水桥离家太远，中午那顿饭由伙房派人送到地里。那年正闹饥荒，送给客人吃的饭是大米饭，菜是一荤一素，荤菜多是清水河里打的鱼，素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送给我们吃的千篇一律，不是棒子糊糊，就是高粱米粥，外加一碗青菜汤。就在这种场合里刽子手露了脸。他从小就学会捕蛇。捕蛇的工具简单极了，一个汤匙大小的小铁叉，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铁镊子。他把小铁叉绑在一根手杖上，用来叉住蛇颈，再用两个手指夹住，蛇嘴就自然而然地张开，然后拿铁镊子拔掉它的毒牙，那蛇便被缴了械，无所作为了。清水河边多蛇，他每

天抓几条,象剖鱼时摘去苦胆那样,摘去毒腺(如果是毒蛇),洗干净,切成段,放进地头上烧开水的铁锅一煮,不需要任何佐料,加一把盐,就是一锅蛇段汤,浓浓的,乳白色,比鸡汤还要鲜美。有些从来没有领教过蛇味的人,乍上来不敢染指,过了一半天,看见大家吃得舔嘴咂舌,津津有味,便也跟着开起洋荤来。1956年底,我陪印度小说家库马尔到广州去游览,曾品尝过那里有名的龙虎斗,不时觉得不过尔尔,这次吃起蛇段汤来,却忒觉鲜美。这大约由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的不同,味觉也随之起了变化,所以慈禧太后在逃难的路上,啃窝窝头也有栗子味。刽子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善于捕蛇和吃蛇,而在于他有一套理论。你当然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如果它讲的只是蒋氏三代如何捕蛇,那它就不会成为传诵千古的奇文。它的奇绝之处,在于它揭露了苛政毒于蛇的残酷生活现实。刽子手对我说得好,在一般人的眼中,毒蛇是一个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可怕的怪物。一旦你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掌握了对付它的手段,那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枯木朽株,破布败絮。对动物界里的毒蛇是这样,对人类中的毒蛇,如贪官、污吏、军阀、官僚、霸王、暴君之类,亦复如此。他们的毒牙无非是权势、地位、钱票子、枪杆子,而拔掉他们的毒牙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舆论。可惜他死早了,没有把他的高论写下来,要不然,人们就会看见一篇新的《捕蛇者说》,比旧的那一篇思想境界更高。因为永州蒋氏只不过是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可怜巴拉的人,而刽子手却戳穿了人类毒蛇的本相,并把拔掉他们毒牙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的气概就比蒋氏雄伟得多。”

“那么你为什么替他写下来?”

“要写的,你放心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写的东西那么多,而我们的来日毕竟有限,想起来实在叫人发急。”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那一年队部发动的,对于刽子手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所谓‘日记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杀鸡给猴子看，目的在于把他从群众中孤立起来。扣的大帽子是拒绝改造，妄想成名成家。有人偷看了他写的日记，向队部作了汇报，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其实，他不过是如实地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日记里还记下他和他妈妈的最后两年的七、八封通信。”

“可惜，他的日记全烧掉了。”

“没有。有人事前透露给他，队部要他上缴日记，他就扬言已经把它烧了，实际上他并没有烧，偷偷地保藏了下来。”

“现在日记呢？”

“就在我家里，如果你感兴趣，哪一天到我家里看看去。”

“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呢？”

“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自从他受到批判之后，许多人都避免跟他接触，但是我们暗中仍有往来。在农场上，就在那小河边；在山上，就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我们总是隔两三天，趁人们晚上就寝的前后，象两个年轻的情侣似的，到老地方去谈心。我们无所不谈，越谈越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越多。比如，他喜欢京剧须生余叔岩的唱腔，我也喜欢。我们常常为他唱的某一个字的吐音和拖腔而辩论一个晚上。他接到他母亲自杀的消息不久之后，他就病了，天天发低烧。凑巧，我那时的任务是发锯，不出工，分队长就叫他作我的助手。后来热度不断上升，人也消瘦得厉害。分队长让我把他送进清水镇的医院，并让我每隔三五天去看他一次。入院不久，医生就诊断出，他得的是克山症，当地叫血热病。病人的热度，有增无已，一直到死。那是一种不治之症。死前的两天，我去看他，他已经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了的了。他托付我两件事：一件是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因为他们离婚的时候，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否则男不重婚，女不再嫁。一件是

要我收下他的日记，留作纪念。

“‘留下作个纪念吧！’刽子手拉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不会写文章，但那里记的全是真事真话。如果能作为你写作的素材，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和稀泥”——伐木日记

“你看那一边，”小刘拽着东方对我说，“白茫茫一片，闪闪发光的，那就是乌苏里江。再向东，就是老毛子的地方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象你这样一个老干部，象我这样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能到乌苏里江边上，完达山的原始森林里来伐木？”

“我想象过。从我知道我要到北大荒来的那一天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这里来。我的家乡是在江淮平原上，那里从来没有高山老林。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读那些描写非洲或南美森林的书，他们把森林写得象个战场似的阴森可怕，那里不但有狼虫虎豹，而且有鳄鱼。后来我又读到关于大小兴安岭的游记，人们把那里的森林写得那么和平寂静，象天堂一样，一伸手就能采到猴头、核桃，到处是阳光普照、鸟语花香，困了，躺在那纤尘不染的干草上美美地睡一大觉。其实那都是想当然的瞎说。你看那边那个树挂^①，要是你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会把你砸死。”

“我也读过一些写伐木者的诗，一点也不使我感动，因为那些诗只能描绘他们的外型，接触不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因为写诗的人没有拿过大锯，他不懂得每一棵大树在它倒下的一刹那间，会在伐

^① 倒了下来却又给另一棵树架住了的树，叫做树挂。

木者心里引起何等激动。有人把一刹那叫做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你大概听过这个故事：有两个人伐木，上锯已经过半，眼看大树就要倒下，一个人突然叫停。他尿急了，马上跑开，就在他刚一走开的时候，树倒了下来，正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这个故事就好在，它把性命交关的问题，当作一个笑话讲了出来。”

上午，我们坐在帐篷外面空地上听专家介绍伐木经验。没有一丝风、一丝云，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更没有一点声音。人们好像给他催眠了似的，三个钟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的报告。报告人是从邻近的一个劳改林场请来的。他是江西人，年纪不过四十岁，从五二年起就当伐木工人。他从天时、地利一直讲到人和，连各种木材在不同季节、不同温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都讲到了。伐木中重大伤亡事故多半由于错误判断树木的倒向，于是他举出了十余种典型事例加以说明。偶然的因素也估计在内，比如当天的风向，当地的特殊地形等等。打挂最好玩^①，放挂最危险^②。敢于放挂的人才是林场上的勇士，因为他是为了普渡众生才下苦海的。夹了锯怎么办？如果手边没有多余的锯，最好的办法是在锯条上倒点酒，会起意想不到的润滑作用。冬天伐木要极力避免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水打湿内衣。一件汗湿了的内衣在你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想想看，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可惜我不会速记，否则我会记下一本完整的《伐木手册》。

会后，我们请他吃了一顿野猪肉。据他说，他的刑期已满，再过两个月就回南方去和家人团聚了。我们大家听了，一面替他高兴，一面又不禁羡慕。有期的刑期终有刑满之日，可是我们却是遥

① 打挂是伐倒附近的一棵树把挂树打下来。

② 放挂是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

遥无期的。

今天,轮到我和王大个儿回来取中饭。伙房说,要晚一个小时。帐篷里空无一人。我从床头上小箱里拿出贺勒威编的《惠特曼全集》来。我记得他在《大斧之歌》里讲到过伐木。果然找到了。

**冬天帐篷中的伐木者。森林中的黎明,积雪有时把树枝压折,
自己的快活而响亮的声音,欢乐的歌,森林中自然的生活,扎实的白天工作。**

夜晚熊熊的火,美味的晚餐,谈话,用杉枝搭的和熊皮铺的床;

这个建筑工人出身的美国诗人从来不讳言他热爱劳动,他把伐木生活当作欢乐的节日来过。从斧头,通过辛勤的劳动,他看到一座新的伟大的城市的诞生。

**那个城市拥有最强大的演说家或诗人,
他们爱护城市,城市也爱护他们,理解他们,
那里没有专为英雄树立的纪念碑,只有平凡的言行,
那里有恰如其分的俭朴和谨慎,
那里男人和女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
那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
那里的人民立刻起来反对被选人的没完没了的胡作非为,
.....**

那里公民总是主人和理想,而总统、市长、州长等等只不过是拿薪水的代理人,

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人屈原、杜甫、惠特曼在这一点上永远相通,那就是他们念念不忘人民。

王大个儿轻手轻脚地走进来。

“哟，在雪山里关门读《草叶集》，真是太美了。不过，我得警告你，要当心那个龟儿子近视眼，他连马回回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了。”

我们 15 个人到 25 里外的山脚下清水镇上去背粮，每月背一次，每人每次背 50 斤。小镇有五六十户人家，有一条街，街上有邮政代办所、诊疗所、澡堂、理发店、小饭馆、百货店。你可以把你每月的 32 元生活费，全部花在那里，要是你愿意的话。

背粮是个美差。它意味着一整天的逍遥自在。五六十里山路和 60 斤的重载，对于一个青年人或中年人，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在澡堂里热热火火洗一个澡，在小馆里有滋有味地吃了一盘猴头熊掌或者两条黑龙江的大鲫鱼，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错，下午背粮上山吃力些，可是沿路随时随地都可以休息，又跟马回回谈了一路的清诗，回到营地的时候，太阳还是老高的。

今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从邮政代办所里拿到孩子们寄来的两封信。我还花了八毛钱买了一瓶大曲酒，我想作一次夹锯试验。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天气陡冷，有些木材便发脆。今天上午老晁和小褚伐一棵榆树，直径三十九厘米，上锯才切进十厘米，整棵树就劈了开来。树身一卷，两人均被打倒。小褚左腿胫骨打折，老晁胸部受了重伤。队里派了两副担架送青山镇，半路上老晁便断了气。

老晁是学地质的。他告诉我说，他的工作是敲石头，现在却叫他锯木头，就因为他坚决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人劝他，何必那么认真，想开点。他火了，大发脾气说：“明明看见有人瞎指挥、干蠢事，祸国殃民，你不反对，反而和稀泥，你还有一点人味儿吗？”

小客——伐木日记(附后记)

我们伐木队是个“右派”队,又被安置在边疆的深山老林里,基本上是跟外界隔绝了的。不许家属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所以在我们住区内,很难看到一张新面孔。我们平常自称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①的虎。

但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例外。1959年旧历元宵节的中午,上山送饭的人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平凡的消息,一个小客人来到了伐木队。消息象一颗卫星在山上引起了轰动,连当天最引人的话题,晚上的一顿元宵都没有人提了。

“谁的小客人?”

“吴大姐的。”

“她的什么人?”

“儿子。”

“多大了?”

“14岁。”

“不是不许探亲吗?”

“他的情况有些特殊。”

“怎见得?”

“他一家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简直是个右派之家。在学校里,他的同学把他叫作小右派,他火了,跟他们大闹了几场。去年年底,他爸爸在八五一农场病故,他下定了决心要来奔丧。他外公外婆扭不过他,又怕管紧了,出了什么事,只得打点他到这里来。”

^① 即霍乱病的译音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吴大姐告诉我的，还有错！”

“居然有人自愿跑到这么个深山老林里来，和我们这种人混在一起，可见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晚上，在工棚里，在吃元宵以前，队长报告了十天来伐木的进度以及集材、装车的问题，接着话题一转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队上来了一位小客人胡小鹏同志，希望大家好好招待。”

小客人也说了话：“我爸爸死了，妈妈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家。我到这里，不是作客，是回家。我是个学生，到哪里，都得学习。希望伯伯、叔叔、阿姨们帮助我学习劳动，学习各种知识。”

所有的人都拍手表示了欢迎。

小客人面目俊秀，很象他的妈妈。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讲话不多，但有分量。总之，是那种容易引起人们好感的小伙子。他被安排在老晁原先住过的铺位上。晚上，他妈妈和伙房的两位女同志也来问这问那，于是在他的周围，便响起了笑语之声，活跃了工棚的空气。有人看见吴大姐手里还拿着针线活，问她忙些什么。

“小鬼哪里知道这里冷得厉害，以为北京用的棉帽子棉鞋，一样可以在这里过冬。我只好在帽子上给他缝几块皮子，挡挡风。看来，大号棉胶鞋也得买一双。”

“让他也帮帮你的忙。”

“是的，是的，队长说了，上午让他自修。我们各种专家都有，将来让他自拜老师。中午跟着伙房的人上山送饭，下午帮着伙房打打杂，劈点劈柴，决不能白吃公粮。”

“听你说的，咱们这一百来条大汉子，每人每月还有二百大毛，还能养活不起一个小伙子吗？”

以后，他果然上山来送中饭了。吃饭时，我们大家都聚在一处。饭后还有半个钟头的休息。一天，就在我灌开水壶的时候，他和我闲聊起来。

“你是黄伯伯？”

“你怎么知道？”

“妈妈告诉我的。我见过你。”

“在哪里？”

“在我外公家里。”

他外公是个书法家，爱收藏字画。我跟他同事，每当他收到名家作品，就找我们去观赏。由他外公又谈到当时常去作客的几位老先生，他都有印象。

“我妈妈还要我拜你做老师呢。”

“学什么呢？”

“学写文章。”

“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是因为写了文章才到这里来的。我说与其学写文章，还不如学伐木。”

又过了两天，还是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他坐在一根横躺着的枯木上，正向摊在膝头上的一本大册子上写什么。我轻轻走到他前后。原来他是在画画。画面上是一个中年妇女。我在他身边坐下，仔细一瞧，才知道他画的是他妈妈。她坐在伙房门口削土豆。阳光斜照在她脸上，显得神采奕奕。生活的艰辛虽然在眉梢眼角留下痕迹，却掩不住发自内心的善良与耿直。

“画得很好。不太象，但是画出了她的精神。”

他抬头对我微微一笑说：“我每年给她画一张，这是第八张了。”

“那么你已经学了8年了？”

“是的，我六岁就开始学画了。我喜欢画人，我更喜欢画我理解的人。”

“可是，小鹏，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可不那么容易。有时也许要用十年八年的工夫。”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一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人，他的一个

表情,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下子就打动了你的心。怎么说呢?你喜欢的人你就想多加了解,你越了解也就越喜欢。”

我问他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他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同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谁都愿意和好人生活在一起,到这来,就是对妈妈和你们的一种信赖。

离我们住地 25 里路,有个清水镇,镇上有一个澡堂,一个小饭馆。碰上大礼拜天(十天一休),我们常去洗个澡,吃一盘野味,野猪肉,狼肉或熊瞎子肉。路上他拿他的新作给我看。

“这是我上月画的一张。”

老场景,还是伙房门口那块小平地。后方是堆好了的两大堆劈柴,前景左方是一块大石桌,桌前斜倚一把大斧。劈柴人坐在石桌右边一张矮椅里。他仰着头呆呆地频视远方,右手里夹的一支卷烟已经快烧完了,但还在冒着烟。

“简直是痛苦的化身。这是谁呀?”我问。

“他的原型是杨子山伯伯,你知道他的事吗?”

我摇了摇头。

“杨伯伯和她的爱人感情很好,他们有一个小女儿已经进了小学,她爱人在一个外事机关工作,机关近来一定要她划清界线。我和杨伯伯连铺,我常常半夜醒来,看见他瞪着大眼睛瞅屋顶。”

“其实对方也是出于无奈啊。”

“这一点杨伯伯倒很能体谅她。但是我还是要说,为什么非要苦苦折磨好人呢?这不就是株连九族吗?”

3月15我们就要下山了。3月5日是个大礼拜,小鹏和许多人上了清水镇,临走前还从妈妈那里要了一个大饭盒,说是要带两条大鲫鱼给她吃。晚饭时,所有的外出的人都归了队,只不见他回来。天黑下来了,仍无消息。大家觉得不妙,派一个小队拿了电筒,打着铜锣,连夜上镇去找。据说他确实洗了澡,也买了鱼,以后便不知去向。又过了两天,一个打猎老汉来到队部,他说他在东南

十多里外一个山凹里，发现了死者的遗骨。衣服都撕成了碎片。只有一顶帽子完好，他带了来，果然是小鹏的。据老汉的推断，小鹏在归路上，受到了狼群的袭击。

吴大姐从五号夜里，便神志不清。她好像变成了傻子，突然老了十年。六日上午，人们让她坐在伙房门口小平地石桌旁边矮椅子上晒太阳，她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说，不笑也不叫。给她吃她就吃，给她喝她就喝。但过了不久，就昏迷过去。当天下午，队部就用担架把她送到清水镇医疗所去了。

舒 芜

让筏木者醒来

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

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堂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写一个 129 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 56 个人中的几个人，以及全队仅有的 3 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 55 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 102 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 30 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黑、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伦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

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棵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干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

截材时被擗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 56 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 9 点干到 11 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擗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顾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他们有一个 14 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

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10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粱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粱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

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问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家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

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救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找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住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嘴,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切菜劈柴碰破了皮肉, she 会把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合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

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在难友之中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小杨有一次下山背米，粮店邻家失火，快要殃及粮店，小杨爬上屋顶救火，头脸和手臂都烧伤了，事后粮店送感谢信到伐木队，表扬他的见义勇为。“刽子手”一次背粮回队的路上，将要过弓背岭时，见到祖孙二人也要过岭，孙子腿上生疮不愿爬山，祖父又实在背他不动，“刽子手”自己已经背了50斤粮食，二话没说就把孩子背了起来，过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他一路又说又唱，百般哄着孩子，过了岭临分手时，小家伙搂着他的颈子直叫“大爷”，尽管他生得那副模样真像个刽子手，有人说小娃娃见了他都会害怕的。

这样一些好人里面，也混杂着个别的败类。像那个姓樊的，大家给他取绰号“樊摇头”，并不是因为他爱摇头，而是大家一提起他就要摇头。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专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闻必报，无闻捏造，惟恐天下不乱。还有那个近视眼，他连别人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还有那个罗圈腿，本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为人能说会道，来北大荒后，在“右派”劳动队里，逢年过节，组织个晚会什么的，照例由他奔走张罗，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人拾到他的一个笔记簿，才发现上面全记着别人的“反动言行”，为他告密的材料。但是，十篇《伐木日记》里，在这几个人身上只用了少的笔墨，事实上这几个人也很孤立。连王大化拾来的猴子“大圣”，也是每次见了樊摇头，就对他撅屁股，（这是淘气鬼小王教的，）所以全工房的人宠爱的“大圣”，只有樊摇头把它恨得牙痒痒的，他终于找了机会偷偷把它吊死在树上了。《伐木日记·大圣》写到大家发现“大圣”失踪的真相时说，“于是一切都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摇起头来。”这一结非常有力。在惨死的“大圣”的尸首前的所有人的一起摇头，是对樊摇头的有力的谴责，也表明这里还是好人多，他们道义上的一致否定所产生的力量，不是个别丑类所能抵御的。

是的，他们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并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

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有一个“右派”,没有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活累活全得由他去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听说北大荒这里的“右派”们彼此彼此,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前面说过的王大化的唯一亲人小女儿在北京一次车祸中遇难,王大化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断了之后,有一天他下工回来的路上,拾得一只受伤的猴子,他便用了慈父慈母一样的爱来医治抚养这只猴子,整个工房的人也都把它当作宠儿,给它命名为“大圣”,“大圣”也给王大化、给整个工房带来了安慰和生气,后来竟至于可以放它自由跳入森林游玩,只要王大化呼唤一声它就回来了。伐木队有一条硬性规定:不许谈恋爱。但是,硬性规定往往行不通。年轻漂亮热情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小毕(毕三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借口作针线活来找她,她本不想搭理,可是看到他们那副破破烂烂的样子,又不忍心驳回,还是有求必应地替这个缝,替那个补。而她的心却已有所专属,她爱着的就是那位见义勇为、救火受伤的小杨。小毕初来伐木队时,成天呆呆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但是,正如《伐木日记·女伙头军》里说得好:“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都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豹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树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慢慢地,小毕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会上敢发言,平时敢欢笑,也就敢于恋爱,敢于冲破不许恋爱的硬性规定了。所有这些,包括猴子的人性化,都是人性的胜利,有人在,就有生命

和爱情在。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尤其严酷,常常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前面已经说过,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木头碾死,吴大姐的儿子被狼吃了,生龙活虎的“刽子手”得克山病死了,小褚的腿被砸断了。此外,那位坚强的吴大姐,挺住了丈夫死亡的打击,仍然每天工余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可是不久儿子又被狼吃掉,她一夜之间突然老了10年,人们让她坐就坐,不动不说不笑不叫,给她吃就吃,给她喝就喝,终于昏迷过去,被抬到附近小镇的医疗所,奄奄一息地等死去了。还有人总算离开了伐木队,死神仍然没有放过他,就像那个小刘,学气象的,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打成“右派”,在伐木队里最年轻,才21岁,总是有说有笑,跟谁都乐呵呵的。晚饭后他总是点起松明子,正襟危坐在床头读各处借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还能背诵许多长篇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内容发表许多评论。他终于因为是学气象的,有一技之长,上调到一个小县里当气象员。他给伐木队的难友来信说:那个气象站虚有其名,连起码的仪器都没有,他只好在县小学里教几点钟算术,住在一座破庙里。荒芜给他回了信,两个月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批着8个字:“此人病故,退回原处。”

当然,成千上万的“右派”还是死不绝的,正如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过:被木头砸死的,被野狼吃掉的,病死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肯定会活下去的。他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生命中这一段时,肯定会发现这一段希奇的、独特的、真实的生活是丰富的宝藏,他们中有各种文艺人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时代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像吴大姐,像“刽子手”,都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刽子手”还为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临死前仍然把日记交付给难友。荒芜自己就写了约10万字的日记,他还有计划地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荒芜鼓励小毕道:“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

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他又只写出了10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经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人天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噩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伐木日记·家信》中说到老鬼被砸死,就地草草埋葬时,有这样几句:“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把他忘却,不让他成为生者的累赘。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木头砸死了,埋在这里,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我。”这与“但求安静”的遗言是一致的。我作为老友,应该遵守他的遗言。但《伐木日记》写的是生命怎样通过苦难死亡而行进的历史,这是不应该忘却的,所以我把它介绍一番。我的拙笔难胜转述之任,所以我几乎全是抄它的原文,以存原文之美;不过把十篇打通,重新编次组织一下,以见其所反映的已经相当全面,稍补《广陵散》一曲未终之遗憾而已。聂鲁达有名篇题曰《让那伐木者醒来》,兹即借以为题。

1995年4月5日,清明节

(选自《麻花堂外集》,荒芜集,1989年8月版)

黄苗子

床 虱^①

我这个人虽不算绝顶聪明,可一般也不太傻。比如说,看了敦煌壁画中描写一个王子因为看见老虎饿得要死,就自己跳下岩去“舍身”,用身体喂饱了那饿虎的事,至少我是不愿意干的。因我还从未遇到一个三岁娃娃横过火车正在驶来的铁轨这一瞬间,所以我还无从考验我有无勇气扑过去推开孩子,自己“舍身”在火车下那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精神。

我之所以不想“舍身喂虎”,是因为从小就知道老虎是“坏人”,它吃人,除了把它关起来在马戏班表演、哄哄孩子之外,老虎对人一无是处(当然你如患过风湿症,你会说虎骨酒还有点用处,可是那不是活的老虎)。而救孩子呢,那你可以举出十百种理由,虽然你当时想的,可能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感情。

在我的一辈子中,我也曾有一个时期做过那王子所做差不多的“慈悲”的、愚蠢的舍身行为。但那不是我自愿的,而是十分无可奈何的一种大慈大悲。

也就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我曾被投入四面是墙,门口站“警卫员”的所在。“警卫员”,这里需要略加说明:他们并不是为了我去“警卫”别人,而是别人派来“警卫”我的——我只是被“警卫”

^① 查《辞海》,臭虫一名荐蠃,一名床虱,以《臭虫》做题目,老伴嫌太俗,荐蠃这个怪名没有人懂,因以《床虱》为题焉。

的对象。

最初,我以为这个所在只是我一个人活着,铺板、铁窗,全是死寂东西,太寂寞了。可是天黑之后,我始而彷徨,继而恐怖:

“还有我们!”

“我们!”

“我们!”……

诸位,我遇到的不是鬼(鬼不是活的,不可怕。),我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巡回在我的胴体上的爬掌动作,原在这个密不通风的小小地带,除我之外,还生息着无数生灵,它们是——臭虫!

臭虫,我以前也见过,我不应大惊小怪,但是你尝过成千上万臭虫永无休止地向你一个人袭击的滋味吗?

不知道因为我是“要犯”而把我隔离,还是因为我是“嫌疑犯”而对我优待,总之我是一个人一个单间。据说这里的铺板是睡六个人的——换句话说:应当由六个人分担的被“吃”,现在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了。古时候祭祀大神的牺牲,还分别由马、牛、羊这躯体庞大的“三牲”来献享呀,何况牺牲还是早已宰割过,早已没有知觉了呢!

明知道“古人韩愈写了《祭鳄鱼文》就起到了驱逐鳄鱼的作用”,这是彻底的撒谎,因此当时,我也不想写《祭臭虫文》。

我无可奈何地、一天一天地熬下去,正象元曲里说的,“消瘦了沈郎腰、潘郎鬓”!但我却意味不到臭虫在我身上,每晚到底吸去多少血。

然而我到底不是一个彻底的消极主义者,我那时天天在读经典著作,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及“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等唯物主义法则,于是我就运用到臭虫身上。

我起初发现,把臭虫按死在铺板上是百发百中的,可是它在墙上爬,你有再大的本领还是难于逮住它,你明明看准了,用指头往下一按,结果是——不见了!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和观察,我才发现

臭虫的脚原来跟壁虎一样，在立面上爬行时能够用足趾吸附在物体上，但当它感觉到受袭击时，便立刻弹跳到地面去，你就无从按住它。当我意外地发现这个秘密时，我随后就用右手承堵在下面，然后用左手中指按到墙上，这一来，我的敌人就乖乖地跳入我的右手掌中。

臭虫一般不在床板面上做巢，而在底部，它发现这样更安全些。你不要以为臭虫的喙只能插进人的柔软皮肤里吸血，不是的，它比钢钻还厉害，能够把床板、墙壁啃出很深的窟窿和沟缝，它们的“住宅区”，就是凭这张铁嘴一口一口地啃出来的。当我发现床上和墙壁上，臭虫在那里挖洞产卵时，（一个母臭虫一年产卵三、四次、一次就产卵 50 枚！）我曾经用饭粒和窝窝头封堵住那些洞，但第二天，轻而易举地就被它们搬掉了。

那时我真感到遗憾：第一没有昆虫学的基本知识，第二，缺少观察和培养臭虫的科学仪器，因此我无法完成一篇对生物学界具有重大贡献的科学论文。不然，我今天也许已成为生物学博士。

按照我当时的身分，是无法向我的“警卫员”提出消灭臭虫的强烈要求的。但大约一年半以后的一个夏天，当我拖着如柴的瘦骨（现在，朋友们都承认我是个“老胖子”）“放风”回来之后，发现房内充满敌敌畏的气味，我知道这是开了恩，第一次用药杀臭虫了。

但是当我俯身一望，床底下凝聚了一大摊血和无法计数的臭虫尸体，我立刻感到心情不怎么舒畅，这是长期积聚下来的，我自己身上的血！谁不愿意把鲜血献给应当献给的地方呢！

最近，看到一个画家朋友画的一本以动物为题材的画册，有一页他画了一个臭虫，却幽默地题道：臭虫——“先生，杀死我，不可惜你的血吗？”我当时即欣赏这句话的智慧，但心头却似乎泛起一点“山抹微云”那样的轻翳。

遗 嘱

一、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约定，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对我的人“忽发慈悲”，在公共场合或宣传媒介中，大大地恭维我一番，接着就说我生前与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对他“推崇备至”，他将誓死“继承我的遗志”等等，换句话说：即凭借我这个已经无从抗议的魂灵去伪装这个活人头上的光环。那么仍然引用郑板桥的那句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此外，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对着别的尸体痛哭，我管不着，不在本遗嘱之限）。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三、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浪费。顺便声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张裸体主义。

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决心叫人对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种仪式。我的朋友张正宇，由于“告别”时来不及给他戴上假牙，化妆师用棉花塞在他嘴上当牙齿，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一闭目就想起来。因此，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即使只让我爱人单独参加的遗体告别。

四、虽然我决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体献给医学院，以免存货过多，解剖不及，有碍卫生。但如果医学院主动“订货”的话，我将预先答允割爱。

五、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我曾专门去了解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按你生前的等级办事，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为此，我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我临时的“行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形亲切，本是好事。但有人认为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此嘱。

庄周说过一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志趣相投，都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户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礼节的子贡去他家帮着筹组治丧委员会。谁知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位生前

友好，早已无拘无束地坐在死者旁边，一边编帘子，一边得意地唱歌弹琴：

**“哎呀老桑头呀老桑头，
你倒好，你已经先返回本真，
而我们却仍然留下来做人。”**

子贡一见吓了一跳，治丧委员会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头汇报。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听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点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个框框，然后指着子贡说：“懂吗？我们是干这个的——是专门给需要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们这两个可了不得，一眼就识破了仁义和礼教的虚伪性，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过你放心，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懒，世世代代安于在我们的圈套里面睡大觉。而这些肯用脑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却被人目为离经叛道，指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无事生非的傻瓜。他们的道理在很长时期仍将为正统派所排摈的。子贡，放心吧，我们捧的是铁饭碗，明几个鲁国的权贵阳货、季桓子、孟献子他们死了，还得派你去组织治丧委员会。因为再也没有象我们孔家的人那样熟悉礼制的了。”（大意采自《庄子·大宗师》）

以上的故事讲完，想到自己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人到了70岁，也就是应当留下几句话的时候了，于是写《遗嘱》。

长歌行·读舒芜《让筏木者醒来》

读舒芜《让伐木者醒来》

奇文不可读,读之盈襟泪;往事不堪忆,忆之肝胆碎。去年已闻荒芜病,不意夙如殒星坠。掩卷怕看舒公文,此文铺天盖地横风骤雨,一似半夜蛟龙呻!当年我亦北大生,生幸不死死微尘;欲遣巫咸叩帝阁,黑奴吁天天不闻。不幸生,不促死;“投之有北”常事耳,祖龙之坑亦如此。当年我亦北大徒,浑浑噩噩生死途,日记白写焚无奈,文献无征愧荒芜。当年子弟江湖老,我老江湖徒懊恼,小妻宝马遍官街^②,独不见荒芜坟上草。完达山,雪如银。啾啾鬼哭天惨昏,幢幢绰绰游冤魂。祖龙之坑平如砥,诸儒地下埋千纪,伐木之人醒何俟,太息“陈陶十万良家子”^③!牡丹江水流,密山山气浮;手持《惠特曼》,肩扛沉木头,芜魂兮大荒,啸傲归兹丘;迎汝者谁?老晁、老于、吴大姐与胡小鹏,擗臀“大圣”欢且蹦,一曲《森林》广陵散,“刽子手”来歌《卡门》^④。黄泉浊世孰凄苦?屈原比干竟何许?风光北国此“多娇”,恰称诗魂来此土。我昔服役兹山麓,饥肠羸骨支肿足,最是荒唐李景波,开荒要种红烧肉^⑤。我歌声竭谁复怜?众伐木者终长眠;抉目国门,子胥呼天。君不闻,先君去者聂绀老,曾问“我是何材值几钱?!”

1995年岁末于澳洲

(选自《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

注 释:

①舒芜《让伐木者醒来》,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内容介绍荒芜的《伐木日记》,兼悼逝者。

②“小妻”,二奶的古称;“宝马”,名牌车也。

③借杜甫句。

④“迎汝者谁”以下,均《日记》中的人物、故事。

⑤李景波当时语人:“眼看大伙嘴馋,想种几亩红烧肉,给大家过个瘾。”

魏荒弩

牧丁和我

听说,诗人牧丁死于十年浩劫。他是怎样离开人间的,我至今仍然一无所知。又不便多去打问。其实,自50年代中期断绝来往以后,我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每一忆及,便为一种怅惘之情所困扰。

最后,偶然翻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卷第二集,像久别重逢的故人,我又惊喜地读到了牧丁的诗篇。从此,牧丁早年的身影总是闪现在我的目前。往事历历,一时引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与牧丁结识(其实是建立通信联系),大约在1940年前后他在成都主编《诗星》的时候,距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起初是给《诗星》写稿,这是一个篇幅不多的32开小型诗刊。撰稿者间或有一二位名家,其余多半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后来,他得知我译的长诗《爱底高歌》(德·蒂奥·蓉格世界语原作)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发表,便写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长诗列入他主编的《诗星丛书》出版,并声明不付稿酬,仅赠样书二十册。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我当即去信表示同意。从此便书信不断,建立了友谊。继而他又把蒂克的诗集《小兰花》列入《诗星丛书》(1942年),蒂克当时的在昆明,经常与我谈起牧丁,对他也颇具好感。1943年,我与晓崧合编《枫林文艺》,他曾不断寄稿来,给予了

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虽未谋面,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朋友热诚坦率,是一个颇为相得的朋友。

1945年,抗战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大流动、大迁徙,犹如八年前。从此,千千万万的亲朋好友失掉了联系,纷纷奔赴自己向往的地方。我与牧丁也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待到我们相见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1954年春天,苏联专家伊·萨·毕达阔夫(И·С·Лятаков)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在中文系开设进修班。授课教师中,还有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和钱学熙教授。参加进修的,除本校有关教师、研究生外,还有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派来的文学理论教师和研究生,总共也不过二十来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南开大学的顾牧丁。真是意外的巧遇!我们这两个长久通信的老朋友,终于在北京大学见面了。更巧的是,我当时的寓所在旃坛寺后面的府藏胡同,而他的家则安在地处地安门西大街的妇女干部职业学校——他爱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两地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因此只要彼此得闲,便时有往来,谈天说地,颇以为乐。如此过从,大约持续了一年光景。

牧丁,苏北人。中等身材,架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总洋溢着笑意,生活简单朴素。第一次接触,我便发现他十分健谈,心直口快,有话从不藏藏掖掖,比我想象的还要率直,遇事爱发议论,爱作不平之鸣。他自幼家道贫寒,放过牛,所以后来取名“牧丁”,偶而也用笔名“朱实”。他只读过小学,但一生刻苦自修,发愤读书,矻矻孜孜,终于学有所成,跻身于大学教师的行列。抗战时期,他一直在成都的一些中学教书。1947年参加民盟,解放后曾到华北革大学习。1952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曾开设“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选”等课,颇得系主任李何林的赏识;同时由于工作上积极肯干、政治上要求进步,曾被评为“模范教师”。他一生不嗜烟酒,酷爱读书、买书,以至广为搜集。这一习

惯,就是在他一生苦学中逐渐养成的。比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搜求保存了大后方出版的大量文艺书刊,一种一套套,应有尽有,几乎是完整无缺。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他拥有的抗战文艺书刊,整整塞满了他南开寓斋中的6个大书架子。并表示有朝一日要利用它写一部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况或新文学史。

牧丁本身就是诗人,曾写过不少好诗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又是《诗星》的主编,对当时诗坛的情况了如指掌,交结了不少诗人作家,曾不厌其烦地跟我谈论艾青、田间、阿垅、鲁藜、绿原、谷风(牛汉)、蒂克的诗。可以看出,他赞赏“七月派”,而他的诗其实也酷似“七月派”。以他对诗的执著热爱和对诗的钻研理解,加以他的卓越口才,我想他的“中国现代诗选”课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怪不得他的这一门课曾在南开受到学生的欢迎。而在当代诗人中,他对常任侠的中文修养最为欣赏,曾一再对我称赞他文字之洗练,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凡是常老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其他学术著作,他都一一买来阅读、珍藏。当时说着,便从案头拿过新购得的精装巨著《汉画艺术研究》,指着序言让我看,啧啧赞叹不止。凡此种种,均可见牧丁平日审美情趣之一斑。

1954年的文坛风云翻卷,气氛紧张。我们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以及对胡风日益严厉的批判,自然也在话题之内。在这方面,他比我知道得多,我多半只作为一名听众,但我们得到的共识则是,胡风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一向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追随鲁迅先生。按说,进入新社会他理应是很愉快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竟会遭到那么巨大的痛苦,陷入那么艰难的处境。但当时由于我们对新社会的信赖,便总是把这一有历史渊源的文艺上的论争,归结为某些个人之间的恩怨,如此而已。但在这里也要如实指出,即或在这种私下议论的情况下,我们对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也并无任何的不逊或不敬

之处，遑论其他？！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批材料之后，全国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等到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牧丁和我就先后被隔离、抄家了。寻思横祸之来，主要是由于我们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率直。牧丁，虽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所理解，平日言论也较多，但就揭发的材料看，也不过是“宣传”了“到处都有生活”、“主观战斗精神”等早已不成问题的一些学术性问题；而我，主要是与牧丁和牛汉是朋友、有联系，并于牧丁事发以后，在答复一个负有“使命”的外系学生提问时，说过一句老实话：“胡风在重庆时期，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进步文艺理论家。”所谓的“胡风分子言论”，主要就是这些。牧丁是全校两个“要犯”之一，我则仅限在系里审查。因此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时间也较长。但不久都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虽被隔离，但我却能从每天清晨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如抗战时期他即与方然、阿垅、绿原有联系，解放后仍与阿垅有来往等等，但均不足以说明牧丁有“反革命”的事实。至于说他曾在“中央干训团”任职等等，我既未听他本人说过，也未听到别人提起。何况这又出自那样狂热的喇叭，那就更是非我所能尽信的了。即使果有其事，又将如何？历史也只能说明过去。牧丁解放后的主要政治表现是“模范教师”。在那一段被隔绝的受难的日子里，记得我们也有一次巧遇：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早晨，在我用过早饭的归途中，只见他被人带着，头发淋湿，光着双脚，在雨水中哗啞哗啞地走着。紧蹙眉头，目不斜视，低头向食堂走去，活脱脱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这一幅雨中押解图，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难忘。

我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便已审查清楚，回到了备受惊吓的家。牧丁，则拖了大约有一年之久。他不能回南开了，只好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好像等了很长时间，后来高教部让他到郑州大学中文

系。他一拖再拖，终于还是到了郑州，但很不情愿。从此三十多年来，天涯睽违，形同陌路，再也不敢互通音讯了。前者，他因工作调动，一再赅赅延宕，从而侥幸躲过了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劫难：“反右”。但到了“文革”，我想这一回他是插翅难逃的了。果然，“四人帮”就擒后不久，就传来了牧丁惨死的噩耗。终年，估计也不过 50 开外，正是年富力壮、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生存和工作的权利，怎不叫人悲痛？！

我和牧丁，友情本属一般。但因同涉那一株连最广的文字狱案，又因一同“偶语”而获罪，仿佛一时成了休戚相关的患难兄弟。今天我来为文纪念他，自然也在叹惋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戈戈微言，于事又有何补？！

1990 年 3 月 30 日，北京西郊

吴祖光

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 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

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

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

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怎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敬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欠 账

新风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 111 篇,约 50 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 13 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 1977 年开始,至今约为 13 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烦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然而偏偏横遭不幸,最终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残疾。这就是新风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也由此而生。从 1957 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 1975 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异数”,她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

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那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记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10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风霞，其它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佚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书，行将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

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而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50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大书,可以想像,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文,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疚。歉疚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为力,

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际，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

从“1957”年说起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近代的中国，从百年前的满清、北洋政府、国民党……一系列愚蠢无能、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当权者害苦了中国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百余年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刻，蒋介石居然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发动内战。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她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前途无限光明，必然战胜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国民党，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时我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在日暮途穷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开始作报纸副刊的主编工作，并且在上海连续编写新的话剧剧本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落后

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终于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做起了电影编导的工作，并且在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两年中我最为萦绕于心的还是祖国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乌云散尽，中国出现了光辉的太阳，百年的奇耻大辱一旦洗雪。虽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给我优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匆匆结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轮回大陆，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然而那时还没有空航，通过尽可能的关系，才买到了船票，紧赶快赶，终于赶到祖国大陆；然而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已到，海轮靠岸才到青岛。新中国建国大庆我是在青岛参加的，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剧本写作，我始终认为电影导演太过烦琐，杂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写作，不受别人、更不愿被别人管束。我在香港两年做电影导演的目的是为了熟悉一下电影，为以后写电影剧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则是怀抱无限的感激之情，也确实尊重我当时的领导。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谈我的今后工作任务时，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这两夫妇在以前的中国左翼电影就很有成就了。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先去拍一部

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摇手说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儿说：“任何事物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现在就应开始去工厂体验一下生活……”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认识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么也没有预料到，我突然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当然，半年之后，我自己就看见这部《红旗歌》是一部到半个世纪后我想起来便满面通红，惭愧无地的影片。

然而，我对于共产党还是满怀敬爱感激之情的，这首先是驱除了我青少年时代萦绕难休的满腔忧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憎恶。我的工作既然是出于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这样接受任务吧！但我对这个任务始终是勉强的，情绪不高的。

手边的工作不是十分紧张的，加上对于别来多年的北京有无限离情别绪；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个常常领着同志寻找失去的记忆的向导。此外就是关心家里的老亲和对自己的小家庭作长久建设的打算，我首先用两年在香港做电影工作挣来的钱买了一所有十八间平房，位置又在东城繁华地带的舒适的四合院。把年迈患病的父亲和高年的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早经我的劝告辞去，现在便由我负担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了。1954年全家从南方迁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动员父亲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家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朽的统治，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看到了近百年来、真正爱国、真正廉洁、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历经劫难收集到的一批珍贵文物，又多年卧病全依靠母亲和弟妹们的辛苦收拣保护，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四川再回南方，运回北京。不应该留给孩子们继承，我想最好是献给国家。”父亲点头。第二天我便打电话通知父亲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识的老伯、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到我家来，尽可能地请他们一一鉴定，看了两三天才大致看完，两人都对

我说：“真是珠玉满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不知你家想要国家出多少钱收购？”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要提这个，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献给国家。”父亲那时由于右肢中风瘫痪，说话十分吃力，但听觉尚可，听我说完只是连连点头，而且满面笑容。因为捐献的话我根本没有同父亲商量过，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弟妹谈过，远在台湾的长姐也全未与闻。

由于我离家日久，这批文物跟着父亲的踪迹，搬迁多次历尽辛苦，都是母亲带着一群弟妹们包扎呵护，还曾经有一个时期要躲日机轰炸，抱着几件特别珍贵的字画、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艰苦备尝。事后回想，我竟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未免太过主观了。241件文物拉了几车到故宫博物院，母亲叹口气说：“总算卸下了负担，放了心，不再发愁了。”

为了国家，只有献出，不计得失，多年的积郁得申，祖国江山如画，前路一片光明；我对生活、对环境、对前途，都是无限欢乐和安慰的。然而不过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激发了我爱党爱国之心，假如说对党有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党员领导，这主要是延安来的某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而且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戏曲界：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平常谈论、讨论、写作、理论都是这样……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正在这时号召整风，而且从文艺界首先整起，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态度十分诚恳，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在此时纷纷提出意见，响应“党的号召”……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

开说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从而展开了一个成为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展开的“反右派运动”。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汉，把我的发言加一个标题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这样，田汉就摆脱了自身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为戏剧界、甚至扩大为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

接着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进行了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对我的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知有多少，现在回忆，至少不下五六十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文××的在青年团召开的一次会上，发言批判我，发言很长，内容全是吴祖光贪淫好色：如何看淫书淫画，如何搞女人、玩女人，如何引诱年青人搞下流事……而到1960年我从北大荒经历三年“改造”，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他听说我已经回来，又很快地来看我，告诉我他当时发言的目的全是为了我好，其内容全是他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对我的“揭发”材料中提出来的，为了向我“通风报信”，便于我写交代材料。这样说他倒是我的“真诚帮助”了，但是谁都知道，这位当年自称是我的表兄的文某恰恰是以玩弄女性著名，至今从不讳言自己是好色成癖的名家。使我认识了我一世交游，什么样的“狐朋狗友”都有。

受了几个月的“批判”之后，我这个一心一意热爱祖国、不惜中断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并把家庭全部收藏捐献祖国的爱党爱国者，于1958年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才回到北京。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倒都经受过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首先说我的妻子新风霞，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广大观念最喜爱的演员，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然而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

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刘××威胁迫使她和我离婚,被她断然拒绝之后,立即给她也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这个晶光透体的“评剧皇后”便立即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到了“文革”时代竟然在病中被曾经受过她的恩惠的年轻评剧院演员刘敏庚打伤成残废直到今日。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至于我的父母,父亲病已垂危时刻,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最好、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将我放逐万里冰荒,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他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儿子的家,把应当由大儿媳承担的一切责任背到老人的身上……不能不说,我的原应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为党为国家献出最大贡献的忠心耿耿的文艺工作者,毫无愧色的干部就这样被摧毁掉了。

回想1949年我从香港满腔热情投奔党和新中国的怀抱是怀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认为选择自己事业的自由都义无反顾的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想到号召提意见原来是一个骗局。把“阴谋”说是“阳谋”,从而发展到“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庐舍成墟,弄虚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虚报产量,大事谎骗,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后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抢”,把祖国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杀人场;使城市一片血海,农田遍野荒芜。有史以来,以弥天大谎惑世惑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将昔日战友甚至一一杀戮,真乃“史无前例”。“文革”开始,我曾有一年行动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门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时见街心锣鼓齐鸣、口号声震天震地,原来是一辆人拉的大车上反手捆绑了四个赤膊老人,

白布横标上大书反革命分子“彭罗陆杨”；乃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钦犯”。当年不都是赤胆忠心忠于伟大领袖的吗！现在就都落到这种地步，蓬头垢面，非复人形。片中说明，这位国家主席被折磨得惨不能睹，没吃没喝，长期不能洗脸漱口，头发里长满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没有见过刘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来，“刘主席”被折磨成这付惨象真是难以想象。

这使我多年已经忘记“文革”当年的一些经历重又出现：我在我的“工作单位”被“管制”的当时，开始只能留在家里，不准自由行动，而所谓造反派则可任意闯来为所欲为，譬如从上海来了一伙青年到北京来串连，自称是我弟弟吴祖昌任校长的“上海市北中学”的学生，故意找到我家来“造反”，这就说明祖昌目前显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学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来造他哥哥——这个“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骂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动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刘挺身而出，制止了这群野蛮的上海青年造派，从而保护了我，使我至今感激这个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好人。可惜我现在也全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华楼党委书记老姜更好得多了。还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邻近不远一所大红门大四合院的人家，是当时一位国家部长的公馆，部长本人待人和善可亲，在街上偶尔接触都热情招呼，而“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一个中学学生，参加了当时的一群学生组织的造反派的“东城纠察队”，却多次闯入我家来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里一样，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在我家大门上用白粉笔写着“大右派反革命吴祖光”字样，上面还划着大叉子，他曾多次来抄东西，又摔又打，对许多精巧好玩的东西要把玩半日然后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许多人同时对一把美国货的尺把长的刀把玩甚久，又给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个人又来闯进北屋径直取走这把刀高兴地拿回去了。看来这位贵公子是何等喜欢这个“文革”世界啊！

1960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过了半年,被“组织”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这个工作我从内心是喜欢的,亦能胜任的,而且写了不少剧本。还带着一个当时最年青精锐的国家京剧团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一时,戏研院的许多年青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都对我十分友好并且尊重我,但几年后“文革”开始,立即起了变化。到了打、砸、抢的混乱时刻,我就从“老师”一降成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关闭在一间小屋子里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到家一看,原来全家一片混乱,我的书,我家大客厅的桌椅摆设全部像遭了抢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残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残破的屋里发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满身是汗地件件捡起这些破烂东西,客厅里连地板砖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诉我造反派说地下埋有军火,所以挖开的,屋顶也挖开了一角……

从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两个儿子都已离家,只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儿在家,两个外来的“房客”那时还没有来。这一阵北京真是恐怖世界,随时都会有妖魔鬼怪闯进家来。戏曲研究院的一个青年工作者(原来对我执弟子礼甚恭的陈湘),有一次居然一个人骑了辆平板三轮车来到我家,进屋之后把我的书大量搬到车上装了一车,然后用绳子捆好,骑回去了。

另外一个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是他“造反”之后,成为“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骂我,说得到新风霞的单位“中国评剧院”的通知,是我偷写给风霞的纸条,被“革命同志”发现了,并把纸条给我看,原来我写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大意如此)那时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约有几个个月我俩不曾见面,我有一次遇见中国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我托他带去这张便条。李大声责骂我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应当说,由于我一向待人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所以从来没有结过什么仇,李振玉平时也很和善,与

我也一向友好,这次可能是当了“领导”,所以摆一摆“威风”,然而我感觉到他没有力气,这个耳光打得没有一点劲道,但却是整个“文革十年”挨的唯一一次的一个耳光。在一群年青恶棍“造反派”手里受这样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四位“高干”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还能欢呼“毛主席万岁”吗?现在唯独杨老依然健在,他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是怎么看?怎么评价?

不能说后来毫无觉悟和改进,不是现在就消失了“万岁”的称呼了吗?但是我想,假如发一个声明公开宣布不该有这个反动封建意识,向人民群众作一次公开的承认错误岂不更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惨非人的受难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个人全部储蓄买下来的十八间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协和医院旁边,“文革”一开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闯进抄家,接着就占据住房,第一个人竟是东城萃华楼饭庄党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带着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炽大灯泡,为所欲为。相反,作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却只能吞声受气,后来我听了京剧演员老朋友叶盛兰的话,把我一家还住着的十间南北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却在不久之后,又被当地街道一个女干部来说:“你们家人口不多”;不该占有四间居室,而抢去中单元的一大间。时间已过去近30年,应该至今还占着吧……难道这样的巧取豪夺能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制的国家吗?而且据我知道,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华楼的党委书记由于今年四合院面临政府拆迁,要求换个大房子,赖着不走,终于赖得了他理想的住宅。这位党委书记拿抢到的我的房子换取高级享受,真是无耻!是骗子,无赖!

写到这里,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戏曲、诗词大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万字的这本书。这使我忽然想起:

这本书自己就有,果然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是约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汉基金委员会”送给我的,由于书太厚太重,田汉这个人我又十分憎恶,所以根本没有看便放在一边了。这本不久前出版的65万字的大书从第788页到790页完整地叙述了田汉移祸于我阴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后后,使我明白而且证实他和周扬等人一致行动阴谋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脱身,反而全部由他对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斗争会的全部过程。而这一场阴谋陷害,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还把一个天才的、得到全国广大观众热爱欢迎的新凤霞凌虐备至,赶下舞台,使病残集于一身,世人都看见这颗明星的殒灭!

感谢宋词介绍我这本董健写的《田汉传》,虽然只占全书将近900页之中的3页,却用文字记下我受害的全过程,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晓。难得年轻的戏剧史家董健掌握了当年的真实史料,并被记载于史册,我对他深深感激。

也感谢戏曲和诗词家宋词为我提供了这部真实的史籍,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也感谢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场反右斗争,视知识分子为仇敌,以凌虐知识分子,为最大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错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仗势欺人的“四人帮”制造的数不尽的血腥罪行,对人民、对国家欠下多少血债!

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毛泽东作宣传工作会议报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听会,而且遇见演员石挥坐在一起。毛表现得太虚心、太民主了,听讲的人一个个心情舒畅,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如此谦恭朗爽、胸襟开阔。开完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出门时遇见艾青,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认为未来的中国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像,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

话”的“记录”完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年过去了，“文革”居然结束了，残破的国家逐渐进入恢复阶段，一切渐渐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那田汉，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补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

1997年12月31

祖光是个男子汉

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约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约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

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40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妻子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国家，把自己从香

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

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一个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运动,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看热闹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约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

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
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 是
有骨气的男子汉!

郁 风

最可怀恋的地方

被关进四堵墙一席榻、不见天日的有限空间里，经过几个寒暑之后，心里想的就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震惊、困惑、怀疑、愤慨、抗议、希望或绝望，都没有结果。仍然是两顿饭，等天黑；开了灯，睡觉等天亮。

一张报，一本书，就是生命的延续。

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

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因为我要活着，活着直到疑问得到解答，直到暗中在操纵我的命运的魔鬼现出原形，真理重新放出光芒。

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到能够战胜生活如真空的“闲”的苦恼，能够战胜那用严酷的审问、诬陷、讹诈所造成的恐怖，战胜那与世隔绝的与无期徒刑无异的监禁所引起的绝望；为此，我要使自己快乐，要用美丽的形象充实思想，用曾经向往的一切，去温暖冻结了的信念。

在许多可怀恋的地方中，最可怀恋的地方就是故乡。

谁都有自己的故乡，对故乡都有特殊的感情。读过鲁迅写他的故乡和沈从文写他的湘西故乡，都使我感到哀哀欲绝的凄凉。

然而,即使是那么破碎的,在那个时代阴影下的故乡,也是亲切的,可爱的。

而我所怀恋的故乡,却远远比他们那个时候美好得多。虽然她也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带着我儿时对于祖母和曾祖母的凄凉的回忆,但是更真实更深刻的是伴随着新的希望,显出生气勃勃正在姗姗迈步的美丽形象的故乡。因为我是在跨过一个时代之后的1956年又回到故乡去的,虽然那一次时间不长,却是第一次看到故乡的新生,用我的全身心去拥抱她,画笔一毫一发的描绘她,倾注了我对伟大的却是久经苦难的祖国的无限希望和信赖。

那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人,把劲都使出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用手,用脑,工作或创作,只要是需要,我做了,我就高兴。

当时又怎能想到十几年后,被关进与一切亲人、朋友、同志隔绝的监狱,长时间的闲着两只手,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是用时间消耗来使你的头脑也蒙上蛛丝,使思想生锈,扭曲变态,或者身体瘫痪,或者精神崩溃分裂成为精神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不少就这样报废的国家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7年过去了,我的身体和精神终于没有瘫痪。如今我又能做点什么的了。在那七年中能够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设法使自己享受一点快乐,而经常使自己愉快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绘着我那绿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乡。

1956年,那是在秋天,江水早已由黄变绿了,一片片白云在对岸的山间投下蓝色的阴影,而一丛红叶树隐现在峡谷中。

迎着凉爽的风,(在那长年静止的监号里,我曾多么向往吹一下江边的风啊!)走在村边石板小路上,一排高个儿粗壮的向日葵,一个脸儿向着你,所有的脸儿都向着你,随风轻轻摇曳,就像鞠躬微笑着的仪仗队。

1964年,我又回到故乡,那是在春天。

富春江岸铺满了一片片娇黄的油菜花，粉红色的草籽——紫云英，和嫩绿的秧田。到了初夏的“双抢”时节，我跟着小队的男男女女像过节日一样，争先恐后的半夜三点钟起床，摸黑走到田里去拔秧，笑语声冲破了黎明。老伯伯和姑娘们寻开心，说要比赛，看哪个姑娘拔得最快，八点钟收工到他家去吃火腿汤年糕。是真的，我住在阿根伯家里，一天吃三顿大米饭和两顿点心——咸菜春笋汤年糕。双抢时节，家家都是一日三餐。

但是我也听到家乡父老向我申诉，曾经有那么一两年，叫做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可是家家都不许做饭，一家老小去食堂领一碗吃不饱的稀粥。屋里一颗粮食也没有，连铁锅也给搬走了。小伙子到田里饿得扶不动犁。他们说，解放前受剥削苦，可利上滚利还能借到一口粮食，那时却连借也无处去借啊！这话使我战栗！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后来中央派的田家英同志在富阳蹲点，搞调查研究，逐渐纠正了许多政策上的错误，家乡人谈起田家英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连没有文化的老汉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愿那样害人的蠢事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

啊，那使我快乐有时又使我心酸的故乡，一别十年，你又怎样了？

当我获得自由以后的1977年秋天，我又去了故乡。虽然十年浩劫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毕竟已经过去，故乡又在向前姗姗迈进了。人们热情地向我慰问，但是不愿再多谈他们那里派别武斗一类的蠢事，似乎宁愿它没有发生。

江上的白帆仍然缓缓地在青绿的山峦背景上移动，而更多的是崭新的翠蓝色的小火轮，拖着十几艘一列长长的运输船，激起向岸边散开的波浪。那上面装载着多少双劳动的手从富春江底掏出的沙石，由于它们不像接近海洋的河流中的沙含有盐份，对金属不会腐蚀，因而成为许多基本建设工程中所需要的东西。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叹息那些本不该发生的蠢事。我只是庆

幸江山依旧,故乡的儿女仍然会把最好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又一次经受了灾难的祖国。她使我又一次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人,能够把劲都使出来。

1980年1月,北京

萧 乾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一

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柜台外边有个顾客正跟店员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给烫糊了一块。客人气势汹汹,忘记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营,就满口飞起“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一类五反时期的帽子;可是帽子越大,柜台里头的那个人越不服气。他说,烫糊了,我们向你检讨不就完了么! (“检讨”两个字是横眉立目地嚷出来的,说的神气跟那个字眼儿很不相称。)那个衣服给烫糊的人显然没从这个“检讨”得到任何补偿(无论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所以也还是不肯罢休。这时候,店员就绷起脸来,俨然占了上风似的,理直气壮地说:你这个人真是学习得太差啦!我既然向你检讨认错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我在旁听了,颇有感触。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观。“检讨”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学习差”成了骂语。

那个店员怎么会想出“抢先检讨”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观察——没把握,是说,我这个观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由

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譬如说,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过嘴,反而抢先检讨之类。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现还有: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譬如说,作家们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责任也很不小,他们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膊抗拒车轮的螳螂毕竟占少数。我国有两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语:“杀鸡嚇猴”“兔死狐悲”;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解放初期,我见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册子,批判一部有原则性错误的长篇小说(《再生记》),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我看了××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深为愤慨”。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说的批评,写起批评来。

《十五贯》在古典剧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学习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的精神。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吓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贯》。当时我想:这可说是我们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无可非议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现了。

我问过一个朋友:咱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现更新、更好的见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创性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可怎么能把个人风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可怕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

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啰嗦?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人民在我们这边。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二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现在,他们那宪法早已经被麦卡锡、杜勒斯垄断资本的走狗踩成一团烂纸了。现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愤慨,讽刺和哀伤。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

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宪章”，早已经被那些金融大亨、军火大王指挥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目前“争鸣”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般“运动”的空气在支持，劲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三

谈到“放心”和“容忍”，当然谁的思想里也不会包括反革命的言行。然而要保证长期在人民内部贯彻这种民主政策，就需要在不正确的见解与反革命的言论之间，严格地划一道红线，而今后的偏向和困难，可能就潜伏在这里。

在目前的初夏气候里，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心情当然是豁然开朗了；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加不好搞了”之感。其中，我还估计最感觉棘手的，是做人事及思想工作的，如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事科科长们。可是我也听到不少人说：今后民主空气保证了保证不了，作为党组织处理“人”的问题的左右手的人事部门的做法，还的确是个关键。

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位民主同盟的盟员私下里说：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还谈什么互相监督。当然，这个说法偏，甚至歪，在感情上显然对人事部门有抵触。我们只要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尊重人事部门，认识到它在机关内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事部门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今后如何改进工作的方式呢？

我知道有些非党同志干脆把人事科看作驻在机关内部的派出所，不过今天的派出所也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解放前，派出所是神秘的、恐怖的，一般人走路宁可多绕几步，也离它远远的。今天的派出所呢，南屋里正给孩子们种牛痘，北屋发着粮票布票，西屋里一位同志也许正舌敝唇焦地给人调解家庭纠纷，从早到晚，市民是川流不息地来往。总之，派出所今天已经从神秘恐怖变为体现政

府关怀人民的机构了。可是就我的见闻所及,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虽然没有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科里时常是一只放人事材料的保险柜(我个人的印象是:这种材料非党的领导干部即使对工作有好处,也看不到),和一些跟大家不大往来的老干部。这种隔阂一小部分是工作上的必要(其实,我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一大部分是由于经历的不同。这些老干部的优点在于单纯,而他们工作上的缺点也常常发生在这上头;他们对中国旧社会不大了解。因而,对机关里的知识分子时常也就缺乏了解。轻则和一般干部互不往来,重则在文化和政治上,彼此各存着轻蔑心理。

另外,还有人这样感觉: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或是人事部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不见回音。这个滋味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政治上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多。这自然也更增加了不健康的神经感,它本身就形成一道完全没有门窗的墙。

自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还是健康的。他们非常辛苦,也做出许多成绩,一笔抹煞是不公平的;不过,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中,我感到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有缺点,而这种缺点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弊多利少的。

比方说,一个人民团体的民盟组织在讨论吸收某一同志入盟的时候,与人事部门有联系的负责同志在介绍材料时提到:在某一国际事件发生时,有人反映这位同志曾说过一句什么不很正确的话。

那个人民团体从肃反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轻易构成嫌疑,因而也不能轻易进行追查。可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党员同志的外甥)由于某干部对他的工作提意见,他立刻倒打一耙,硬说三年前曾经连续五次看见那个干部在宿舍里有猥亵行为。人事科不问青红皂白,就派了两个人进行调查,而且,调查了半年多,到现在仍然没个下文。

这个团体有个附属机构，过去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党员。支部书记和掌握人事科的副秘书长（同一位同志）主要信赖机构里一个“积极分子”的一些“反映”。结果闹得内部疑神疑鬼，互不团结，并且使得群众一度跟支部对立起来。直到那个机构有了党员，并且挨到肃反后期，才发现那位“积极分子”原来并不怎么积极，然而工作上早已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听说机构里一位参加工作七八年的同志已经坚决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算不算是主观主义的作法呢？

连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讲究凶杀必有凶器才能成立，我认为为了明辨是非，防止把挟嫌诬陷与真正向组织汇报情况混同起来，应该给“反映”定出一个规格来；比方说，必须有某种证据或旁证才能算数，不能任何人一句话就能叫另外一个人背上黑锅。第二，不必要的拖延只有加深群众与组织之间的距离。既然调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宜于不了了之。第三，对于一句不正确的话，即使证实了，也只能作为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想法，不宜遽然成为跟着这个人走的“人事材料”。第四，应该承认说出来的不正确的话比不说出来的要好，它得到的待遇不应该是被暗地里记下来，而应该相机地进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内部矛盾得到解决。

我们的人民政权主要是依靠人民的积极力量，广泛地联系群众，而不是主要依靠少数人的“反映”。过去，有些人事部门的工作可能过分偏重于警惕的一面。对于“反映”虽不至完全相信，可也要求不苛。历次运动对显然有意捏造和挟嫌诬告者，事后似乎都没有什么惩戒。如果缺乏直接的接触，只根据少数人的认识来判断多数人的情况，就不容易避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

大凡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人事部门，必然平时对干部成见一大堆，真正遇到肃反那样时机，反而心中无数。事实上，由于准确的“反映”而抓到特务的事有，由于不准确的“反映”而严重地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甚而不必要地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的事也发生

过。那时候,最陷于被动、最丧失威信,常常正是人事部门本身。

现在大家都嚷着“拆墙”,我完全同意应该从两面拆,而且,我认为负责人事和思想工作的同志在这意义重大的工作上,可以起极大的作用。比方说,把每个干部的人事材料好好清理一下,要是还有些捕风捉影、已经证实不符事实的小条条,就撕掉;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的,及时地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的干部进行教育;过去有些措施使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也尽量向他说个明白;同时,该质问干部的,除非是反革命性质,也最好当面问个清楚(这个工作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应该已经做了一些吧)。今后,让人事部门更能成为大家有冤可以伸,有苦可以诉;成为不仅仅做保卫工作,同时也能解决内部矛盾,加强内部团结的地方。

要在机关内部长期、健康地开展“鸣”和“放”的工作,我认为机关里做党和人事工作的同志(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也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广开“反映”之门,使歹人无法得逞,又要避免在客观效果上纵容不真实、并且带个人动机、破坏团结的“反映”。这样一来,积极分子的圈子必然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同志们亲近组织,而大家也就会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

徐懋庸

不要怕民主

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的“民主太多”，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

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构成的，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

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不要怕不民主

前几天谈过“不要怕民主”,今天想谈谈不要怕不民主。

看报纸上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笔谈,许多人谈到有“顾虑”;关于小品文,《人民日报》上有人提到“新危机”,同时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也有人谈到“危机”。这一切的反映,实质上是说明:现在确实有少数怕民主的人存在,因而另一方面,就有很多怕不民主的人存在。倘没有前者,自然不会有后者了。

但我以为,即使有怕民主的人存在,人民大众也不要怕他们。

历史上,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由来已久矣。孔子讲他的“仁”学的时候,我看已经碰着这个问题的外围。训诂家说仁字是“相人偶”,“二人为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的时候,就发生对阶级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之法,就是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也得多少给人民的利益一些照顾,给人民的说话一些机会,这也就有些几近乎民主的意思在里头。否则,一味横征暴敛,专制高压,人民一定就起来造反。所以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仁”是统治阶级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政权既已归于全体人民,阶级之间,既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但非对抗生的矛盾却还存在,那么,民主就成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手段,所以,今天的民主,就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大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有“仁人不忧”,“当仁不让”的态度。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曾经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过。何况,现在并不是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政权不让我们享受民主,只是少数官僚主义者不让,那么,我们有什么怕的!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为什么怕官僚主义?人们最怕的是死,但现在的官僚主义者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能致人民于死地。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在今天,归根到底,恐怕只有极端反对民主的反动派才会死于民主,坚持民主的人是决不会蹈民主而死的,就是那只是多多少少有点怕民主而基本上不反对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也不会。

现在的民主,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民主,也是当仁不让,因为只有它的领导,才能实现真正的供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在别的问题上,都是谦让的,他们决不与人民争利,而且实行自我牺牲。但在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实现真理的问题上,是不谦让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当仁不让”中又有谦让之处,就是,他们并不以为自己一定能够做到“不违仁”、不违民主。所以,我们只在确实认为自己符合真理的地方,才不让,而当发觉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却又坚决向真理退让。

而且,即使自己原来掌握了一点真理,而当看到别人的真理比自己更大的时候,他也退让。鲁迅曾经教人“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就是萤光也有作用，但是，他又说：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社会愈发展，真理愈光大，炬光和太阳总是愈来愈辉煌的，所以，我们在当仁不让之中又随时存谦让心；同时，还想到，炬火或太阳，并不排斥萤光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并不会消失。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

李慎之

大民主和小民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3 页载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在当年虽然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我的上级——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

我们这番话是在 1956 年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 1949 年北京解放时起就在我手下工作，1957 年秋天的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

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案:199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开八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的时候。我自己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1956年3月的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九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规定,党内的本来只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人,但是,第一、邓拓同志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毫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受到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提名要吴冷西同志代替邓拓同志列席中央会议。冷西同志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从延安时代起就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

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应付自如,而为冷西同志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120块十六开的版面,虽然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要二十三万四千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虽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罗材料翻译上报的依据。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 selective eyes 或 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的结果。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

外,还要制订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同志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冷西同志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如此等等,不下几十条,我因此还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由于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支持我这样想的,不但有冷西同志那里来的“言者无意”的传达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他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至少能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他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志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又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

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因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决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会整人的领袖,批评也并不是整人。另外,冷西同志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潮问题。”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的问题,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同志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

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还是并不紧张。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 11 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改”,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

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是我的功劳。在批斗时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还曾传令嘉奖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最权威的。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向下传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但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

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最早说大民主的人。”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十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读完之后有一种爽然若失、悔之已晚的感觉，我要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愚蠢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实行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次整风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

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由大民主所建立的制度)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点富有“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看到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 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 1968 年 5 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还不算走红,然而在欧美的大学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西方人的心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至于官僚主义能不能彻底消灭,该不该彻底消灭,他们就不考虑了。

事情已经整过去四十年。我年已七五,行将就木。我个人微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优容

宽厚,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得承认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但是那是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失败,农村到处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黄秋耘

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

当时我并不知道，比起新闻界来，文坛更是是非之地。我千方百计脱离了新闻界，却投进了文艺界，其实也并没有脱离苦海。幸而这苦海中还有一艘“诺亚方舟”^①，我又恰好跌在这艘“方舟”之上，才得以死里逃生。

根据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印发的文件粗略统计，在10年动乱期间，大约有200名以上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而且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编导史东山，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招麦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关于他们的悲惨死亡的内幕情况，很少人知道，知道的人也不会轻易讲出来。

不管怎样，邵荃麟同志给我指定的阵地还算是风险较少的。《文艺学习》只不过是一个普及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青年读者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的基本知识，提高群众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为我国的文学队伍培养后备力量。从1954年4

^① 据《圣经·旧约》所载，太古世界大洪水时，诺亚携同其家畜避居于方舟上，是以幸存。

月创刊,到1957年12月停刊,一共出版了45期,每期的篇幅48面,共8万字左右。印数从创刊的12万份一直增加到近40万份,每个月的来稿来信达千件以上,可见,它还是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的。总括起来说,它做了如下的工作。

一、帮助读者正确阅读、欣赏和理解作品,更深刻地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通过作品更好地认识生活,更多地获得教育。

二、提供一些关于我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帮助读者逐渐对中外文化传统获得正确的了解,在更宽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教养。

三、提供一些写作的知识,介绍一些创作经验,发表并评介一些较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习作,帮助培育文艺的新苗。

四、提供一些文艺科学的知识。

五、经常答复一些引起读者所关心的文学阅读、写作方面的问题;对于有较大普遍性的问题,则组织读者进行讨论。

六、报道群众的文学活动情况,发表读者学习文学作品的心得和体会。

韦君宜原来是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她主编《文艺学习》期间,很强调文艺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效果,但后来大概是受到社会上的(包括我的)非正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变得有点“非正统”起来了。例如1956年《文艺学习》转载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还发表了赞扬这篇作品的评论文章,就是出于她的决定。当时我下乡去了,对这件事没有过问。当然,假如我还在其位的话,肯定也会赞同的。至于组织讨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则是我出的主意。

平心而论,《文艺学习》在它出版的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当然,对上述六个方面的工作,都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最后的几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一些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来批判,伤害了一些

本来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这是极大的遗憾。当时我的处境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即使还是由我主持笔政，我自问也没有力量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这一切，当然也不能归咎韦君宜和杜麦青，他们虽然也不同意粗暴批判，但同样没有办法“扭转乾坤”。“误尽平生是一官”，一个人既然在其位而谋其政，有时候就免不了要作违心之论，做违心之事。

在这里，我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仅仅以组织讨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为主要“罪状”，还加上发表我和刘绍棠同志的文章等“严重右倾错误”，就勒令《文艺学习》这份深受广大青年群众欢迎的刊物停刊，这是不公平的，顺便提一下，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那几个刊物，没有一个不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它们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主任），绝大多数不是被错划为“右派”，就是受到“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

在《文艺学习》工作期间，我负责处理过几桩政治性案件。韦君宜虽然是第一把手，但她不大愿意介入这一类事情。我当时兼任中共作协总支委员，再说过去干过多年军事工作和地下工作，党龄又比较长，这副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在处理毛宪文一案的时候，我是十分慎重的。毛宪文是内蒙古人，当时在《文艺学习》当编辑，当地公安部门在敌伪档案中找到了一张他“亲笔”填写的参加国民党的入党申请表，作为检举材料寄来给我们。申请表上的笔迹完全不象他本人的笔迹，但事隔七八年之久，一个人的笔迹是可能改变的。我用放大镜认真检验了这份表格，发现他把自己父亲的名字写错了，误写了一个同音的别字，这就引起我的怀疑，照理说，当时他已经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了，就算文化程度比较低，一般也不会写错了自己父亲的名字。申请表上还盖上了指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核对一下，这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指印。当时办案还要讲点法制观念，对未受行政拘留的公民，是不好随便

勒令人家盖指印给你拿去检验的,否则就是“侵犯人身自由”。我想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耍了一点花招,假装说我办公桌上台灯灯泡的钨丝断了,我正在接待客人,请毛宪文给我换一个新灯泡,毛宪文当然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后来我把两个灯泡都拿给公安部的侦察部门进行技术鉴定,留在灯泡上那十个鲜明的指印,没有一个和申请表上的指印相符。这就可以证明这张申请表肯定不是毛宪文亲自填写的。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敌伪档案中呢?这仍然是一个谜。我派出李兴华同志作为外调人员到毛宪文的家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最后才把事情弄清楚了。原来毛宪文的姐夫王绪在国民党部队三十五军某团当书记,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党规”,无论哪一个“党官”能够亲自发展20个人入党,就可以提升一级,并得到奖金一百块大洋。那位书记把他能够记得起姓名的后辈,一一都填上申请表,由他自己代盖上指印,算作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新党员,一下子就发展了20人。解放后,这位书记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当时还关押在监狱中,他的记忆力还不错,能够一下子就说出十多个“假国民党党员”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毛宪文。李兴华同志又让他盖了十个指印,拿回来一一核对,他的右手食指的指印果然和申请表上面的指印一模一样。这个“假案”总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冯光一案,本来非常简单。只发现了一张胡宗南抗战初期在陕西省凤翔县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举行毕业典礼的集体照片上有她在场。她对曾经在战干团受训这件事,从来没有隐瞒过:入党时交代过,以后每次填写履历表,也都如实交代。一个青年在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举办的军事训练班里受过训,但没有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去干一般的抗日救亡工作,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入了党,这根本不能算是“罪行”或者“错误”,更没有必要把她“隔离审查”。但经办此案的同志竟把冯光隔离审查了两个月之久,并且把她家里的全部东西都翻箱倒篋地搜查了一遍,即

使在当时来说,这样做也是太过分的,不合法的。这一案件虽然不是由我直接经办,但作为领导人,我没有及时加以制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比较复杂的重大案件是冯大海一案。冯大海是个行政十七级的党员干部,当时担任《文艺学习》创作组的代理组长,业务能力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文艺思想跟胡风比较接近,也去过胡风家里,但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有一个老同学,在我们海军的一条军舰上当中尉枪炮官,这个人跟他关系比较密切,但仅仅是生活上的关系,例如一同去参加舞会、逛公园、冯给他介绍过女朋友等等。这位海军军官对文艺一窍不通,也根本不感兴趣。冯大海有时向他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他也不置可否。胡风等人既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冯就被怀疑有意向他的老同学套取我海军内部的机要情报,秘密向胡风汇报。因此,冯的专案组比较特殊,是由公安部的一位张处长、海军司令部保卫部的一位上尉军官和我三个人混合组成的,由我担任组长,归公安部直接掌握。所有的专案材料(包括档案、交代材料、审讯记录,等等)都属于“绝密”范围,不准对外泄露,也不用送给作协的领导同志审阅。定案结论也是由本小组自行拟定,直接呈报给公安部审批的。

冯大海是由公安部直接下命令逮捕的,签发了逮捕证和搜查证,指定由我去执行。在1955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深夜里,我带领了几个人去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觉得根据一些不实不尽的材料,就随便怀疑一个人有间谍活动,加以逮捕,这样做未免过于轻率。同时我认为,即便胡风等人真是反革命集团,跟胡风等人有些来往,甚至赞同他们的文艺观点的人,也未必个个都是反革命分子。至于说冯大海奉胡风的命令窃取军事情报,则更是无稽之谈。根据那个海军军官的交代,他告诉冯大海的只限于一些军中的轶闻趣事之类,作为军事情报,那是一钱不值的,况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尉军官,根本不可能知道多少战

略性的军事机密。但,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我有意做得宽容一点,我没有给冯大海扣上手铐,当人们带他上汽车的时候,我扭过脸去,在房间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低声对他的妻子说:“要照顾好孩子!”这句话等于暗示她,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她想开一点。我真害怕她会自杀,这一类事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专案组组长本来不该说这样的话。

在冯大海被隔离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每一次提审都是由我主审,其他两个专案组成员陪审,冯自己写了近10万字的书面交代材料。我们曾经开过十多次会议,反复研究过审讯记录和交代材料,我们还派出专案组人员内查外调,收集了二三十份旁证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冯大海一共见过胡风三次,每次都有许多人在场,胡风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他。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也没有遵照胡风的指示去办过什么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只限于文艺界的一般情况,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更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机密。冯大海只是一个行政十七级的干部,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也是极其有限。当然,他在胡风面前发过牢骚,骂过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他谈到《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是韦君宜和我的时候,胡风没有说什么,只说了一句:“黄秋耘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为什么要请邵荃麟给他作序呢?其实邵荃麟并不太了解罗曼·罗兰。”根据这样的案情,本来很快就可以写出定案结论的。冯大海还够不上是“胡风分子”,也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不必给予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至于对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进行批评教育就可以了。我根据三人小组一致的意见,再三斟酌过字句,写出一个定案结论,呈报给公安部。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定案结论不到一个月就批复下来(通常起码要拖三五个月的),同意不给予冯大海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记过也不降级。但是认为象他这样跟胡风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毕竟是不可靠的,不适宜留

在党内,要开除党籍。工作也要调动一下,不能留在北京。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理并不能算是很公平的,既然冯大海仅仅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就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那未免失诸过重了。但公安部那位张处长极力劝阻我不要再往上申诉,据他所知,凡是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案犯”是可以免于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的,重的要判处有期徒刑,最轻的也要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假如再进行复议,说不定处分还会加重一些,这样对于冯大海和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们量刑过轻,就是犯了右倾错误。

这一点,大概冯大海自己也心中有数。当我们的这个定案结论拿给他本人看的时候,他却喜出望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欣然签字表示同意。听说后来他的爱人抱着孩子来接他回家的时候,一家三口都高兴得跳起来,好像是得到“特赦”。一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第六类右派分子的处分也往往比对他要重得多,虽说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不过,冯大海的最后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调离中国作协以后,在张家口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担任文化教员,有时候也让他编导一些小戏。他出差到北京,还常常来我家里聊天、吃饭,和探望老同事、老上级一样,好像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法官”和“犯人”的关系,对1956年的往事半句也不提起。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受到猛烈的冲击,说他本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只不过由于我这个“漏网右派”的包庇和开脱,才得以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在饱经折磨以后,终于用上吊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他的妻子早已跟他离婚了。

50年代以后,凡是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出过问题的人,在下次政治运动中很难幸免,而且第二次打击往往比第一次打击还要猛烈得多、厉害得多。冯大海在第一次打击时只受了一点轻伤(这本来也是无辜的),他死在第二次。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

《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也不可谓不重了,但,他们全都死在第二次。作为政治风暴的规律,总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些的。而且越往下刮,风力就越猛。上边刮起七八级的风,到省里就达到十级以上,到了地、县,就变成十二级的强台风了,卷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人物的身分越小,受害的程度就越大。所以胡风虽然挨了整,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坐牢的时间远超过10年,但毕竟还没有死去,一直活到今天,当上了全国文联委员,而冯大海最后却非送命不可。

与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进行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进行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当时这一运动并没有公开报道过,知道的人也不多。批判会的方式很特别,范围不大,参加的人只限于作协以内行政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干部,有时也吸收一些作协以外的文艺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最高潮的时候也不过50人左右,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得挨个发言,进行揭发批判,至少也得表个态。一言不发的人也是有的,一个是陈翔鹤同志,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刚进文艺界工作不久,对丁、陈和主持运动的人之间的争执,实在闹不清谁是谁非,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检举”和“揭发”材料,也判断不出是真是假。我一边开会,一边却神游物外,只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强烈的愿望: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了吧,我打从心底厌倦极了。烦死了。这样的批判会在宝珠子胡同全国妇联礼堂一共开了十三次之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的时间又拖得特别长,一般从下午三时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结束。那时候,机关的食堂早已休息了,饭店也已经打烊了,幸亏在南小街一带,还有些卖夜宵的小食摊,只供应馄饨和烧饼两种食品,勉强可以塞饱肚子。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少数还是积极的,例如有一位同志,他事先准备好发言稿,激昂慷慨,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像煞有介事。当然,他所揭发出来的大都

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始终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提倡每一个作家都写出一本有影响的好书，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另外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敷衍塞责的，例如另一位同志，开会时总是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画上一张素描速写，他画画的技法本来就不大高明，加以心不在焉，画出来的素描总是“神似”而形不像，他自己也不满意，一画完就撕下来，揉作一团塞进烟灰缸里烧掉了。

记得有一次会议休息时间，我在院子里问陈翔鹤同志：“你为什么不发言呢？”他朝我苦笑了一下：“哦，我不了解情况嘛。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发言呢？”我学着他的腔调说：“我嘛，同样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心照不宣，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对这样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批判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了。

陈翔鹤同志是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人。他是个老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

我不知道，陈翔鹤同志所说的许多人的悲剧，是否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但我心里明白，他对我说这么一番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这么一个“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的悲剧人物吧。不幸得很，陈翔鹤同志这一席话竟成为谶语，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我。当然，这是到若干年以后才应验了的。他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被诬陷为影射庐山会议，替彭德怀翻案，在1969年4月下旬被殴打致死。他所遭受到的灾难就远远不止是“谤议沸腾”和“频致怨

憎”了，和嵇康一样，他也是因文章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的，虽然他是一个“性不伤物”的谦谦君子。我自问也是一个“性不伤物”的“人道主义者”，但是这些年来所遭受到的“谤议”和“怨憎”也往往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十三次会议中，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后来在某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中，我随口说，有许多同志修改了或者推翻了原来的发言，是由于“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这句话就被认为“助长了丁陈集团的反党气焰”，列为我的严重右倾错误之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诛心之论”了。当然，到了1979年，又给我改正了，认为我这样说并没有错。

会议尽管开得没精打采，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速记员和打字员）可忙得不可开交，每次会议过后，都得整理出厚厚的一本发言记录，记得很认真，很详细，连每一句插话都记了进去，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可以使用，要记得那样详细是很不容易的。十三次会议，一共产生了十三本厚厚的发言记录，大概总有洋洋数十万言吧，全部打字油印出来。参加会议的人，每个人都发了一本，上面印着：“内部材料，严格保密，会后收回。”我总是怀疑这一堆“废话录”怎会有这么大的机密性。我不知道会后还有没有人会耐心地从头到尾看它们一遍，至于我自己，我一收到就把它锁进抽屉里，从来也没有翻阅过，直到上缴时为止。

1956年秋季，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要复查、甄别“丁陈反党集团”一案，澄清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指定由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璉主持其事，还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由黑龙江省前副省长杨雨民同志担任主任，下面配备了十多二十个专职工作人员。他们找每一个发过言的同志反复核对，请发言者把打印出来的发言记录重新修改。我在批判会中一直没有发过言，这一切自然都与我无关。当时我跟韦君宜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看到杨雨民来动员韦君宜修改发言记录，要她破除顾虑，实事求是，把一切有“反党”涵义的词句全部删掉，真是说得唇焦舌敝。

当然，有的人改得多一些，有的人改得少一些，有的人全部推翻。其实，看来这一切都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一案，就算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全部属实，假如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话，也构成不了多大的罪名；全部推翻了，丁、陈和其他十多二十个受牵连的人最后也还是免不了全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就连主办此案的李之琏、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受到党纪处分（张海留党察看两年，降五级，下放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其余的人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开除党籍）。据我所知，其实李、张、崔、黎等人跟丁、陈素无密切关系，也从不来往，“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有些人甚至根本未见过丁、陈的面，只不过由于职务关系，奉命行事而已。作为自始至终参与过文艺界这么一场“大辩论”的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恐怕只能说，一切都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看来从1955年初夏开始的反胡风、批丁陈、肃反、审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不过是序幕，是前哨战，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呢，那就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作

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经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错已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编辑们看到我抽文章，心知有异，纷纷打听是怎么一回事，我装作若无其事、轻描淡写地答道：“没什么！有些话我还要斟酌一下，改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就是。”

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争。

那一年我将近40岁，这在心灵上和理智上已经是成熟的年纪。我知道发生了新的情况，暴风雨快要来了。但关于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我是一无所知的。当然，有些人比我还要胡

涂,比如杜麦青,他还是主张要继续“放”。这也难怪他,他并没有得到“转”的信息。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那怕我是个“小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当然,对这种转变的出现我早就有过一些预感,不过,没有“提示”,我就不可能作出判断。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记得在今年春天,有一位作家曾经预言过:十二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除非他送给爱人的礼物没有被接受;谁的脸上都不会有眼泪,除非他在看一个动人的古典剧或是笑得太过分^①。

在十二年后的生活中,是否真的没有忧愁和眼泪,谁都不得而知。但,至少在今天来说,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快乐也有忧愁,有欢笑也有眼泪的。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而是在困难中取得成绩,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成绩更值得珍贵,我们的胜利也更值得自豪。

我们艺术作品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鼓舞人民前进,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有些艺术家却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歌颂和空虚的赞美,而掩饰着我们的斗争和成长的困

^① 见1956年第三期《文艺报》《向新的高潮前进》一文。

难,这样的歌颂自然显示不出我们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因而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不能感动读者。比方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个个都是牛羊满谷,五谷丰登;每家农户的餐桌上都摆满了鱼肉,几乎把桌面都压得塌下来;每个农村姑娘都穿上了崭新的花布衣裳,甚至还披上了彩花头巾。其实这样的图景和我们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今天农村生活斗争的复杂情况和存在于农民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作家,是敢于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的。他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曾经真实地、毫无粉饰地描写了苏联革命初期人民的艰苦生活:

……每天早上,他们在这里喝完了茶,就动身出去工作。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象无烟煤一样的硬面包。天天是这些,真是单调得要命^①。

……

保尔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的一只腿从污泥里拔出来。因为觉得分外寒冷,他才发觉他的一只靴子的烂底,已经完全脱掉了……他实在不能再这样下去,只好下工——这会是为了一只靴子。他从污泥里捞出那片靴底,忧郁地看着它,而且打破了他不再咒骂的誓言^②。

这些还仅仅限于写物质生活的困苦;至于革拉特珂夫在《士敏土》一书中,更进一步写到广大工人群众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所作的斗争。

我觉得,这样的描写仍然是振奋人心的,有积极作用的。人们

① 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76,278页。

② 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76,278页。

决不会因为看到生活中有困难和痛苦,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就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相反地,惟有看到克服苦难、战胜错误的英雄行为,才能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增添勇气,去接受严酷的考验。革命总是在惊涛骇浪中前进的,革命的人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温室中酣睡,或是在地毯上跳舞。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病态的悲观主义是可怕的、危险的,但是廉价的乐观主义也同样有害。在目前我们的文学艺术领域内,后一种思想情况似乎更值得注意。

只要是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的人,谁都会看到人民群众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痛苦。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困难和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的。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勇气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勇气去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他还算得是什么艺术家呢?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勇于干预生活。所谓干预生活,就是既要肯定生活,也要批判生活。肯定有利于人民的東西,批判不利于人民的東西。肯定时要有饱满的热情,批判时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冷静的头脑。这两者本来是相辅而行的。

难道说,我们写了生活中的困难、痛苦,就会伤害了我们所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么?不会的。社会主义的朝霞是光辉灿烂的,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决不会把一点黯淡当作满天阴霾。问题只在于我们抱着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去理解、去写。只要我们抱着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理解、去写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我们就不会灰心丧气,更不会幸灾乐祸。我们揭露了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正为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的是要克服它们、消灭它们,为的是教育人民群众怎样去对付它们,那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难道说，我们写了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就会破坏我们艺术作品中的美感么？不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不能歪曲生活，但是也不能逃避真实或粉饰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研究中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艺术作品里的美必须是从真实地反映生活中得来，美就是生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摄影记者拍摄农村秋收的图片，他嫌农村妇女穿得不够漂亮，特别请了几位女学生来“扮演”秋收中的农村姑娘。我以为，这样的做法就是粉饰生活。在艺术作品中，虚假的美，装腔作势的美，只能叫人恶心！

不管是肯定生活也好，批判生活也好，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关心现实，贴近人民。作为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人民共一个身体，同一个灵魂，和人民结下生死不解之缘，和人民同甘共苦，同歌同哭。浅薄的乐观主义和冷漠无情的生活态度必须改变，而代替之以对人民命运无比的关切；粉饰生活的怯懦心理必须克服，而代替之以正视现实的革命精神；对个人得失利害的打算必须割弃，而代替之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道出人民的衷曲，写出人民的爱憎喜怒，离合悲欢；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在人民的成就面前一味嘻笑，而不善于歌颂，在人民的困难和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出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也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1956年9月

（选自《黄秋耘自选集》，花城出版社）

江曾祺

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

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后

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蹭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 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

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20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

“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墨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91年1月31日

刘 衡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 ——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

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内蒙古。

1957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道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不容易等到5月底,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

“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

“问题还没搞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

“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

“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

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很差。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

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

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边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部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

我看陈×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

自投罗网

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

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支部派他和张×(党委办公室主任)、周×(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说:“审干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

周×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

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

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钊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

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在标题上用文学语

言辱骂右派分子,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

“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 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 第一、第二两次

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 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 偿还不偿还? 4.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

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 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

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

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

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而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

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

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

老记者陆×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道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干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

“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

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

“你、你……”陈×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大家奇怪：刘衡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沫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部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嗥。”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

开头几天,陈×对我比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不像是在革命队伍里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个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他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跟他们(指另外几个被批斗的人)不一样。”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对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汪×(记者部副主任、支部书记)批评陈×右倾,不应该对我那样温和,陈×立刻对我变脸、疾言厉色了。本来嘛,历次运动中的打手当然要考虑“温情”的后果,他不能为某个下级影响自己的仕途。但我没有失望,因为社论上还有一段:“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

9月23日,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

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

党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来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农村部主任林韦原先对我说：“你在革命队伍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他为难了，说：“党中央发了脾气，不好办了。”报社从武汉弄来我给父亲写的全部信件，汪×叫我交出父亲写给我的信，并打印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抄家”行动是侵犯我的“人权”，反而十分高兴，放心，以为很快可以回内蒙古。谁知汪×看了来往信件，硬说我让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是给他出坏主意，破坏反右派斗争。肖风也为我惋惜，说我有包庇父亲的行动了。我的思想被搞乱了，以为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给李克林（党总支委员）看看。李克林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立场是有点模糊，但不是什么坏主意。”以后汪×再一股劲说我包庇父亲时，我恼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样”（以后反右倾时，批斗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刘衡”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报社要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们了。临开会时，汪×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释：“这不是哪个个人决定的，是党决定的”。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和我父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她满脸通红，说：“是不是政治问题现在还说不定”。但在批斗会上，她又恢复了她的穷凶极恶的样子，对我无限上纲。肖×批斗我说：“你说，是汪×划的你。光这一条，划你是右派，就没有错！”以后，陈×对我说：“你们都恨汪×，其实，汪×的后台是我！”“你们瞧不起汪×，其实，她的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

批斗大会后，我们好些人被派到图书馆干活。有天，党总支办公室的姜××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结论上签名。我去时，裴达正在他的结论上签名，姜××对他十分温和、客气。轮到我时，我不肯签，说上面讲的许多不是事实。姜××拍着桌子大骂：“你的态

度最坏,明天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要加重你的处分!……你只管事实部分,政治结论是党下的,你怎么不相信党?”我本想写一句“我不同意这个政治结论”,但一看他可怕的样子,就像他的巴掌马上就要打在我身上一样,不敢写了。光对结论上不合事实之处予以说明,签上名。回到图书馆,我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叭叭掉。在旁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蒋元椿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问:“什么道理?”他说:“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要牺牲的。苏联就有许多例子。”我问:“什么例子?”他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苏联的一部小说。写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名叫佐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位舞女与白军有勾结,利用佐丁的名义向人们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级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当时情况紧迫,没有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他枪毙。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我对蒋元椿说:“如果党要我牺牲,会告诉我的,就像告诉佐丁一样。党不告诉我,我就不盲目牺牲”。蒋元椿说:“党不告诉你,你自己应该这样想。”

我是在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看到这本小说的。1943年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我正在关中分区关中师范教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从延安带来了一批自称特务的人,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陈英的女同志现身说法,说她在延安怎样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广播、搞自由主义,破坏党、破坏边区。还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等等。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年丰上台说自己是特务,我也跟着说。下台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问陈英:“我们在西北大学时,在党领导的读书会里,都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去边区时,党都是叫我们好好工作,并没有叫我们搞破坏!”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呀!”我问:“原先不知道自己是假共产党员的现在也变成

特务了吗？”旁边一位领导同志赶忙拦住我：“你不要到处说你不是特务，不是假共产党，你破坏整风！”我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当特务的是极少的，怎么到了解放区，特务会这么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丁临刑前的一些内心独白震动了我：“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的、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着未来，只是为着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我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们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促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不久，抢救运动进行甄别，证明绝大部分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领导向佐丁讲的不得不枪毙他的理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群众决不会了解冗长的辩解的。群众只懂得单音的 yes，或 no”。我想：“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污蔑群众吗？这本书可能有问题。”听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样。

十多年过去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又想起了这本书。蒋元椿一提，感到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去问这本书的译者林淡秋（编委、文艺部主任）：“《巧克力》不见再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听说”。于是，《巧克力》有没问题，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党汇报思想

中央指示：被划为右派的党员，一律开除。记者部要开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党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来，林沫原先照顾着我，陪我到饭馆吃饭。慢慢，不愿和我一块上街了。他多次劝我，不要摆出一种不服气的架势，要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认罪，给人一个“态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态度不好才被划成右派的！”他责备我：“你太不懂事了！党说你是右派，你承认了，以后证明你不是的，难道党会责备你当时的承认是说假话吗？会有这样的道理吗？”我痛苦得写不出检查，他帮我写了一个，说了一些大家都在重复的话，如：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党对我的挽救，我要低头认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由我抄写，签上我的名，交给汪×。林沫说：“你态度好一点，人家不会划你；即使划了，处分也会轻一些……现在后悔也迟了。开除党籍是最后一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开除。不要临走还给大家一个坏印象！”我满口答应。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党章。我学习它，仔细寻找我的不足之处。准备大家一说开除，我就举手。

一天晚上，记者部开支部会了。林沫到内蒙古交代工作，准备搬家（内蒙古记者站三个人，我和钦达木尼两个成了右派，林沫这个站长当不成了，因此把他调回北京），无法参加。其他一些老记者有的说要找人谈话，有的说要赶写稿子，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光是汪×领着傅×等一批年轻人乱起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汪×当主席，先开除林钢。林钢十分沉痛地说，他因为不好好进行自我改造，以至沦为可耻的右派。他以后要进行脱胎换骨地

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说着说着,伏在桌上哭了。汪×连忙说:“林钢有悔改之意,我们十分欢迎,建议行政给他较轻的处分。现在举手表决……林钢在被开除前,还有表决权,自己可以表态……现在,同意开除林钢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到会的人都举起了手。林钢举起了手,我也跟着举了手。

轮到开除我了,汪×叫我表态。我说:“我也同意被开除……”汪×不等我说完,就插嘴:“你同意?讲一讲理由!”我说:“我感到我不够党章说的党员八项条件……”傅×赶忙说:“我们也不够!我们开除你,不是因为你不够条件,是因为你沦为可耻的右派!”我一下子愣住了。汪×说:“你攻击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不平……”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右以后向党汇报思想,怕又斗错了自己人。”汪×吼:“你哪里是汇报什么思想?反右派了,一些党外右派不敢讲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党内继续向党进攻!”从外表看,我讲的话的确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分辨,就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呀!可是当时有谁去仔细分辨这个不同呢?汪×见我不发一言,接着又说:“你还给你父亲出坏主意……”本来我在肃反、胡风问题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据这些划我右派还有点道理,但一提我父亲,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怎么会是什么坏主意呢?”汪×说:“不管不管!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开除刘衡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大家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汪×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汪×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现在迷糊了,我弃权。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会了,我准备了好几天要“低头认罪”的话一个字也找不着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好、是坏,行政处分是轻、是重,我已毫不考虑。从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一阵从来没有准备、从来

没有想过的吼声(也就是我灵魂深处的吼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汇报的!”汪×赶忙挡住:“你看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刘衡最近交给我一个检查,我满以为她的态度变好了,有改悔之心,准备让行政给她较轻的处分。现在你看,她凶恶的面貌又暴露了!她死不甘心,临走还要放一次毒!一个党员向党汇报思想,党就要开除她的党籍,你说党多残酷呀,党内多黑暗呀!”我说:“不是党内黑暗,是你们的工作有偏差!。我并不想和人顶嘴、吵架呀,我并不想最后还要在党内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呀,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毫无办法。”第二天,我冷静下来,告诉汪×,我不同意被开除,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听说开除的事经支部同意后,还要经中直党委批准。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中直党委会冷静、慎重一些。我对陈×说:“请你们千万不要马上登报”。我想,报社的领导喜欢赶热闹、表现自己的成绩。如果冒冒失失一登报,就没法更正了。我们更有嘴无处说、有冤无处伸了。谁知不说倒好,一说,在1958年1月6日,报纸就登出,《人民日报》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从内蒙古回来后,知道我的态度无法改好,也无可奈何。他听说我已被开除,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对我说:“真想不到,就像做梦一样。”田流(记者部副主任)对林沫说:“原先我们都把党当成妈妈,以为对妈妈无话不说。现在才知道,对妈妈也不能胡说八道”,汪×对林沫说:“现在看来,和上级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工业组,跟组长王揖关系不好,他就把我调出,我就到记者部来了”。肖×对林沫说:“刘衡以为划她右派,是假的,是我们在演戏。现在,报纸都登了,是演戏不是?”

我问蒋元椿,“在开除你的支部大会上,你自己举手没有?”他笑着说:“以前在陕北,中央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他自己也是举了

手的”。我很惊讶,党员在接受错误处分的时候,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要说假话,隐瞒自己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党性强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这就是盖棺论定。也不相信中央党报人员的水平真的那样低下,真的分不清敌我,可是,为什么党要这样划我呢?对我更是一个难解的谜。

对党组织不能说假话

1958年4月2日,报社开全社工作大会、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以后,我们大部分人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唐海县府所在地)劳动了,当时正在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声中,我是受的第三类处分,属于劳动锻炼范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这与干部下放并没实质性的差别。林沫对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平原,主要产大米,比有些干部下放的地方条件还好。他叫我好好劳动改造,把懒病好好治一治。我的问题报社已经掌握,不要再到农场喊冤叫屈了,我说:“当然,我身体差,劳动不好,又加上不服罪。农场要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我就不得活了!”

4月8日,我们十多人和别的单位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北京车站坐上火车,以后又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柏各庄农场。我们报社来的全部分到第4分场。蒋元椿、林钢、胡平、刘晓晞、赵克惠、李右、方达、张恩铭到3队;刘时平、吕建中、裴达到4队,我和孙乃、田兰坡到4分场场部。大概领导照顾妇女,除了我和田兰坡外,别单位到4分场的女右派也集中在场部。有《工人日报》的陈蓓和全国妇联的谢松生,另外还有王兆祥、王济培、左渊明……分别来自中直各机关。

领导我们的是4分场人武部的干事王振山,30来岁,共产党员,谢松生打饭时,脸上毫无笑容,王振山看见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偷偷一笑,我认为他了解事情真相,把他当作党的化身,“无事不可

对党言”，对他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他笑了，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每天，他分配给我一些轻活，和我有说有笑。谁知不多天，农场发下一张表，叫我们填写。我一边看，一边填，填到中间，有这么一项：“你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我脑子一闪：“说真的？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我责备我自己“农场也是党组织，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写：“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再往下填，有这么一项：“你是否受过严格的审查？”我脑子又一闪：“大概我们现在是在受严格的审查！”想到林沫责备我的话：“老爱顶嘴，说话不晓得客气、委婉一点。”这次，不能再给农场留下这一印象了！就在填写对处分意见的前边，加了一句，变成：“我愿意接受党组织严格的审查，但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

全农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都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只有我一个人公开不服、立刻把农场领导惊动了。总场公安局张局长特地赶来了解情况。有天晚上，他和王振山来到我们女右派的宿舍。我正坐着，向他点头打个招呼。他大吼一声：“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连珠炮似的训斥：“我走了几十里路（当时不通汽车），大老远跑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坐着一动不动，真是太没礼貌了！”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劳动一天，太累了，不想动。实际上，是我没有养成向领导低声下气的习惯，不知道见了领导要站起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人，应该有个卑恭屈节的模样，想到他亲自跑来帮我解决问题，我内心感到过意不去，我的确是太不懂礼貌了！接着，我就把我为什么不是右派的理由向他说了一遍。还说到，这个问题由报社掌握，本来不想在农场谈的，只因农场让填表，才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写了出来。在写以前，我还闪过“说真的、说假的”念头，这是不对的，以后不再这样了。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老生常谈的话，像什么党不会冤枉人的，你要低头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当时听不到心里去，现在自然更是记不清楚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王振山从此对我变脸了，不断对我训斥、责骂：“你这个右派，欺骗我们工农干部，我差点被你骗了！你真害人不浅，你害得我挨批评，差点要撤职拿办！”还说：“你在报社的政治结论上，明明签名表示同意结论，来到农场你又变了卦”。我听了，十分高兴，看来农场已和报社联系，看了我的政治结论表。就说：“我是对一些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加以说明，然后再签的名，是对说明签名，不是对政治结论签名。”他说：“你太小看我们农场了！只有报社才能解决你的政治问题，我们农场不能解决？”我说：“我当时以为你们只管我们劳动，政治问题由报社管。现在你们也管，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一直对你交心。说真心话，怎么会小看你呢？”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解释，靠扰，把他当成知心朋友，甚至傻到对他说：“我解不了你的秘密，你的职业的秘密。你外表很凶，不断训斥别人。其实你的心很软，见不得别人的眼泪。那天，谢松生愁眉苦脸地向你买饭，你偷偷一笑，我看见了。”

王振山让我做较重的活，让我挑水、掏厕所等等。嘲笑我的气力、姿势：“连10岁的小孩子都不如！”他知道我害怕把劳动和服罪连在一块，不停地说：“你劳动不好是因为你不服罪，你不服罪所以你才劳动不好”。“你到这里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有一次，训着训着，他向我说开了悄悄话：“你不应该把你们不是右派的话告诉我的，你不应该对我说……”立刻，他感到他说漏了嘴，又大声对我吼了起来。

他让大家监督我、孤立我，说：“她是不服罪、反改造的，你们不要相信她，跟着她走，你们要好好服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大家对我没有好颜色了，老是横眉瞪眼，表示他们和我不同，我成了四分场场部斗争的重点，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李右是第三队的重点，和大家闹得不可开交，王振山鞭长莫及，就把他调到场部。他来后，因为有我这么一个比他更顽固的人，他才免于当重点，得到解放，参加到批斗我的行列在右派小组

改造,也和划右派时一样,你划了别人,自己就免于被划。别人当了重点,自己就可以免于当重点。自己的安全是建筑在别人的罹难上面。

这年年终作改造鉴定,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关系大家前途、命运、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大事。我仔细看了看鉴定表,上边把右派分子排成三类:第一类口服心服,第二类口服心不服,第三类口不服心也不服。我对王振山说:“第二类口服心不服,不是对组织说假话吗?怎么比第三类还要改造好些呢?”他说:“口服,是讲不出道理了,不得不表示服。当然比心不服口里也对抗的好。”我听了,并不以为然。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一到敌我斗争的紧要关头,共产党的章程就变了,变得我不能理解了?明明不同意自己被开除,却要自己举手表示同意;明明不服组织对自己的处分,却要把不服放在心里,不在嘴上说,这样的人比心口如一,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还要好!共产党不是逼着党员哄自己、欺骗自己吗?为什么党要这样做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属于第三类是无疑了,但我想不通,也无可奈何。

农场怎么违背党章

1958年底,王振山管理右派有功,由干事升为人武部部长,1959年2月,总场让右派分子回家过春节,四分场的右派分子全部放假回家了,只把我一人留下不让走。无论我怎样哀求,也不生效。我写去一个汇报:

我感到时间有点长,如果我是光身一人,戴着帽子来到右派小组,和大家一块劳动、学习、开会、斗争,长期下去,即使有些烦恼,但也不无好处。

可是我有爱人和小孩子。我的爱人早就不愿等待，因为我的爱人当的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属，等待出征的妻子，带着幸福的微笑，观看来自前线的捷报。我的爱人当的是可耻的右派分子的丈夫，而从农场传回去的有关我的消息，始终都是不好。只要想到我的家庭，我就感到软弱，不能支持，感到风浪太大，时间有点长。

春节过后，右派分子都按时回来了。

不几天，总场场部突然向全场发出一个通告，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直不服罪、反改造，要加重对我的处分，由第三类上升为第二类。即由劳动锻炼上升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由60元降到26元。全农场100多名右派分子都知道了，纷纷把我当作反面教员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我们4分场也召开右派小组会，要我表态。我并没有被吓倒，只是感到奇怪，会上，我说：“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一个人是不是右派与他的工资多少没有关系，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即使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的”。“是不是右派与处分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分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分，我也不是的。”

王振山淋头泼下一顿大骂：“你这个顽固右派，你太把我们农场看扁了！你说我们违背党章，你有什么资格？你早已不是党员了！”“告诉你，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你的嘴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你是一块啃不动的老牛筋！我要看看，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我对王振山当众骂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但不生气，还经常提醒他，让他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后我对他说：“你们只在右派分子这个小范围搞，倒没什么。千万不要散布到群众中去，要是散播出去，党的威信损失就更大了”。

谁知不说倒好，一说……不几天，这个加重我处分的通告就贴在四分场场部的墙上，王振山洋洋得意地对我说：“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农场的职工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抗拒

改造的顽固右派，编了歇后语，嘲笑我，如：“刘衡过沟，没辙！……”

我是平反问题

1959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柏各庄农场轰动了，到处都在谈这件事。右派分子们看见了一线曙光，偷偷希望自己正是这摘帽中的一个。我内心十分不安：“大家都摘帽走了，光剩下我一个人了！反右派运动采取大呼隆办法划右派，又采取大呼隆办法摘帽子，我就糟糕了！”

王振山、四分场领导不断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赶快认罪、承认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有次，场长说：“你看，连溥仪都摘了帽子，你还摘不了！你还不不如溥仪……”我说：“我们两个性质不同。溥仪是伪满洲国皇帝，这是千真万确的，改好了，当然可以摘帽子。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问题，我是平反问题。”就这样，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个人虽然很顽固，可是对党倒很忠诚。”

不多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那天，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大礼堂没有座位，只有一个半月形的主席台，台上有几位农场的干部。我们对着主席台排队站着。先由一位干部宣读《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再由一位干部宣布农场第一批摘帽右派分子的名单，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改造的成绩、摘帽的理由。每个人姓名后面都加上“同志”二字。我们报社的裴达也在其中。大家一听，摘帽的只有10位，自己不在其中，都泄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反右派不再采取大呼隆办法，我就好办了。”我们报社30名右派分子，这次摘帽的除裴达

外,还有留在报社改造的杨春长。一共2人。

接着,由被指定的摘帽右派代表上台讲话。无外乎是“感谢农场党的领导,使我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在农场的改造只是起点,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将来的道路更长,今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任凭风吹浪打,不再犯同类错误”等等。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这是我们农场全体右派分子第二次大集合,头一次是1958年4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相距一年多了。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棐、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肖乾……突然,肖乾向我走过来了,我们来农场后,王振山向我谈过肖乾。他说:“三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肖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好些,写了好多好多,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三分场的肖乾、四分场的刘衡,你们是一对活宝!”农场关于我不服罪、加重我处分的决定是通告全场的,肖乾当然也看见了。肖乾来找我,我猜他是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横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谁知我们刚寒暄几句,三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肖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肖乾一直受着监视,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也。

会议继续,公安局张局长讲话了。他说:“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

全中国高高飘扬。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一些右派低头了，认罪了，服输了，表现较好。根据中央精神，农场决定给他们摘掉帽子，使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们仍然是好同志，现在摘帽的10个人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我们希望所有在农场改造的人，都能摘掉帽子回去，与家人团聚，重新工作，不希望有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长期留在农场劳改。”

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喊道：“四分场的刘衡，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大家都摘帽了，你就摘不了！你想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一些人朝着我看，大家的眼光刺得我的脸发疼，我心里咚咚跳，感到这一下自己可完了。但是，张局长停了一会，接着又说：“不过，你不要灰心、丧气，你还是有前途的。只要你服罪，承认这顶帽子，你也可以摘掉，甚至比别人还要摘得早。”我听到最后一句，豁然开朗：“这不是威胁利诱吗？开头是威胁，现在是利诱。”我心里笑了，脸上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来场开会的路上，我内心沉重。回去的路上，我脚步轻快，不时露出笑容。

一回到四分场，王振山马上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表态、谈感想。大家都表示，要以裴达为榜样，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轮到我时，我说：“它们是右派分子，应该争取摘帽。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是摘帽，而是平反问题。是右派的要摘帽，不是的就该平反。这里头有个甄别问题。”当然，在我的内心，认为大家都是平反问题，但我不能说。不然会惹起众怒，对我“群起而攻之”。

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

1962年，我们在农场劳动4年多，领导要把我们全部调回原单位了。我们回报社后，除我之外，都分别摘掉帽子。这次摘帽不像在农场那样大张旗鼓了，而是个别通知他本人，即毛主席说的

“阴摘一批、阳摘一批”。在通知的同时，还告诉他组织上对他的安排。留在报社的有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朱克潜、杨春长和我，其他人都分别到内蒙古、贵州、河南、新疆等地。有些去外地的人愤愤不平了：“怎么我们这些摘帽的不如没摘帽的、我们这些改造好的不如顽固右派刘衡？”有的人甚至向我发脾气，认为我的待遇不应比他好。领导就向大家解释：“刘衡没摘帽子，没有地方肯要，只好留在报社。”

我们在农场4年，不知什么时候，谭立当了报社的党委书记，他见了我说：“别人改造摘掉帽子，你改造却加重处分！”我说：“那是因为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他说：“哈，你说对党说老实话的加重处分？你好反动！”但声音里含着笑意，看来他对我比较了解、同情。我说：“是这样的，现在说老实话的吃不开。”他说：“你回来，随便找个工作干干吧。”我干了短时间的杂工（如挑水）后，没有部门要，被分配到资料室，不久，工资由每月26元升到99元（即17级，比原先下降4级）。

我在资料室，工资是最高的，但工作却是最低的，如剪剪贴贴之类。有的人又发牢骚了：“怎么我的工资还不如当右派的？”以后工资调整，就给有的人升了级，特别是当领导的，他的工资不能低于右派，不然他怎么能叫做领导呢？

我对这些毫无怨言，因为那些摘帽右派如裴达等都没恢复工作、工资，恢复党籍。使我感到，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必须继续调查研究：反右派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拜访许多领导，如梅益、习仲勋……一半为了呼喊，一半为了刺探。

我找得最多的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我说：“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

快进行。”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有一次，她回答我：“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口：“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原先《人民日报》社把高粮从内蒙古调回来，告诉他，要为他甄别，不几天，中央决定不甄别，又叫他回内蒙古。

1962年初，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调安徽当省委书记。临行前，刘少奇曾暗示他，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分子平反。李葆华到任后，就大刀阔斧地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等到中央下命令不甄别，安徽已有数千右派平反了……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搞甄别的省，其他各省（包括《人民日报社》）因动作迟缓，没有赶上趟，李葆华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30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到了1962年，由于“大跃进”受挫，中央于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千人大会）。会上，除了林彪为毛主席大唱赞歌之外，彭真、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对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1959年的庐山会议、党内民主生活等等谈了许多意见，谈得很好。

一时间，政治气氛转向宽松。彭德怀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3月6日，陈毅甚至在广州的创作座谈会上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一时间，到处都在说“甄别”、“平反”。既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可以脱帽,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批错了的可以平反,很多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就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的右派很多,也应予以甄别、平反。于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由副部长平杰山主持,在7月26日写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谁知在8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1.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2.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分子帽子给他们戴上。3……

一个月后,即9月24日至27日,著名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三风”,即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这样一来,统战部再也不敢提为右派甄别、平反了,还给一批已经摘帽但是表现不好的(主要是要求为自己翻案)右派分子,重新戴帽。

在7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即后来称为的“三不主义”)。于是,从大家的讲话中,他看出林彪是忠于他的,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的,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就为他以后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毛主席又演了一次“引蛇出洞”。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奥妙，只是奇怪为什么有很明显的甄别问题，党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不“有错必纠”？党已经不是我理想的共产党了！我不死心，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只有继续呼喊、继续刺探。

我在资料室干活的时候，一天，社长进来了。我拦住他：“你知道我的事情吗？”他笑了：“知道知道”。我说：“反右派有个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呢？”他收起笑容，变了脸色：“No no,反右派没有甄别问题！”我说：“有、有，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大家真的承认自己是右派，他们都在说假话。”他立刻声色俱厉起来，大声呵责：“他们比你好！他们知道不甄别，就不做声。他们比你好！你、你，你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

社长也提起“政治”二字，我在政治上不行，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究竟什么是政治呢？难道政治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吗？我更糊涂了。同时，我如果像大家一样默不做声，不与人交谈，我怎么能收集材料，了解每个人在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言行、表演呢？何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静等领导开恩，坐享其成。看见不对头的事，我必须大声疾呼，提醒领导，唤起民众，尽一点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哪怕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向毛主席、刘少奇呼吁

我们在柏各庄农场的时候，只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敌人。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香花、毒草的标准，也是只看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人民日报社后，才知反毛主席也算是敌人。“两”反变成“三”反，毛主席的威信空前高涨，我必须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才能解决我的右派疑问。

“毛选”不能解决我的疑问，相反的，越读“毛选”我越心疼，我

好像是个受害的人。例如：

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而我，既没有写文章，又没有作演讲，只是向党组织作汇报。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何况我的意见并不错！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是，当时划右派光看鸣放前后的那一会儿。即使只看那一会儿，也是只看一个表面现象，并不去区别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是，当时给人戴右派帽子，只凭几句言行就定案，是先下结论，后调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这些话都不作数了。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是这样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办法，应

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批判却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没有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作老实人。”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口服心不服”的比心不服、口里也讲出来的要好。在逼供信的空气里，促使大家假认罪、假检讨，以至我这个唯一讲真话的人，变成死不悔改的顽固派。有毛主席的话作后盾，我更有把握、更坚定了。用同志们的话说，也就是更顽固了。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天不怕，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里没有别的巧，只因我听见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我心里照，不怕霹雷闪电、地动山摇，我心里有个红太阳，斗争起来有力量！”我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讲叙以上情况。告诉他：反右派的好些做法，以及我的种种遭遇，违背了他的许多教导。因此，“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是您领导的党！”

我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看越觉得它能够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例如：书上说：“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他理直气壮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对他个人来说，他无所畏惧”。

我想，我被划为右派后，一直是孤立派，不同意政治结论，不同意被开除党籍，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打击，我正处在这种“光荣的孤立”的地位。书上说：“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和革命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

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于是，我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呼吁：反右派要有始有终，必须甄别。一开头我就说：“我给您写信，我是泪流如雨，因为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您懂得党员的心。……”

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我要加强党员修养，受尽虐待毫不怨恨。光荣的孤立算得了什么？少奇同志是我知心！”

我给毛主席寄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不，比“石沉大海”还坏：石头掉进海里，要冒一个水泡，我的信寄了去，却没有一点回响。我给刘少奇寄去的信倒是有一点点声响：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天，与我同在牛棚劳改的陈×问我：“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我说：“他当时是副主席，我怎么不能给他写信？”他说：“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也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说：“刘少奇究竟有什么罪恶，我搞不清楚，不过，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这点是对的。同时，一反右派，我就在说，我比他说得早，并不是我学的他。”他说：“那你比刘少奇还高明？”看来，造反派对刘少奇抄家的时候，把我给他的信抄出来了。但不知陈×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件事的。

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

在资料组，我按时上下班，剪贴资料，做些不需要多少知识、力气就能胜任的工作。比起在农场，劳动强度小多了。大家为我开过几次批判会。各种千篇一律、牛头不对马嘴的批判接踵而来，一点不能打动我的心坎：

“刘衡犯错之后，一再不承认，加重处分后，并未接受教训，的确令人难以想象。花岗石脑袋敲打好多次，没有改进，骇人听闻！”“她搞翻案活动，不能让人容忍！她立场十分顽固，三个问题（指肃反、胡风、父亲问题）和党针锋相对，怨气冲天。这样的错误不算反

党,什么才算反党?她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有反党思想(指我对抢救运动的看法),20多年来,没点变动,令人惊奇!”

“她没有起码的觉悟,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她到处活动、告状,兴风作浪,跟党对抗到底。只要容许她发言,她就反驳。只要有机会,她就污蔑,始终不肯回头”。

“凡是在重大问题上,她都有她独特的看法。任你千言万语,她有一定之规。由于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因此是非也就不同,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她攻击党无孔不入,有空就钻。她通过思想汇报向党发动新的进攻,越来越猖狂。‘肃反、抢救运动都错了,逼得大家说假话’,她把党丑化成瞎子,连真假都看不出。她攻击报社党委,‘划人右派,是否夹杂了打击报复、官僚主义’。污蔑报社党委长期把她置之不理,‘不知是慎重呢,还是官僚主义’?我们都不支持你的意见,难道我们都是打击报复、官僚主义?”当然,有些批判稍微能打动我心坎,引起我的思考和反驳:

“你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就可胡说八道?就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结果怎样?彭德怀的意见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吗?结果又怎样?”

我心里想:“那他们被划成敌人,也有问题”。但我不能再说,连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光说把你搞错了,不要说整个反右派。反右派是毛主席领导的,一说整个反右派,问题就大了”。我说:“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有意见,才汇报的。整个反右派没问题,我还提什么意见?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

“你要为民请命?太狂妄了!告诉你:当了右派分子,就要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不能骄傲、翘尾巴!”

我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保留我的意见。”

我是用可怜的最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人民？是敌人？即使达到了人民标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现在报社没摘帽子的只你一个，你要顽固到底吗？”我说：“多年来，同志们除了逼我承认帽子、给我乱扣帽子外，揭发不出我有任何真正的三反罪状。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清楚、越肯定，是有大家的功劳的……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大伙儿嚷起来了。我只好又说一遍：“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

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

给我打击最大、几乎要把我压垮的是林沫提出离婚。

反右派初期，我和林沫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才有我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向支部汇报的一幕。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后，立刻把他“惊醒”，他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了。我到农场后，他写来大量信件，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有些意见（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自己、把自己说得坏坏的……）我接受了，但在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很大。例如，他说：“假若你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你能及时地进行深刻的检讨，用阶级观点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清算，而后痛改前非，破白立红。你是有可能不戴右派帽子的。即使戴了，也会得到很轻的处理。但是，这一步你没有走对。你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痛心悔过。相反的，你情绪抵触，大叫冤枉，其结果呢，你结结实实地戴上了帽子，而且得到了重重的处理。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态度。”

我认为：“态度”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处分轻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问题的性质。同时，态度好坏拿什么来衡量呢？低声下气、

唯唯诺诺、满嘴假话叫做态度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坚持真话叫做态度坏。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他还写：“你来信仍然认为你的问题是搞错了，还在那里等待中央的什么复查。这说明你仍在原地踏步未动。听说有不少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中都有所进步，他们都在彻底悔过自新，努力争取、变化自己的思想，从右向左转。而在这个改造中，你显然是落在后边了。你如果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改变，那将一直落在后边。事实将证明你是彻底错了。别人可以争取三年、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摘掉帽子，而像你那样，那就很难说了。”

“你在农场大概会经常听到驴子和猪的那种单调而无聊的叫声，但因为人们知道这类生物的特性，所以听了它们的声音，并不觉得愚蠢和讨厌。如果一个人也像它们那样总是发出单调刺耳的叫声，人们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怪物。但是也竟有这样的人，你只听她在那里叫着：‘我冤枉了，我不是右派，党应该纠偏！’最近又提出什么‘什么时候划分敌我界限？’界限不是早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吗？还要怎么划？我看这样的事是永远不会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右派分子自己的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那就可以重新变化过来。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很努力，我看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么。但如果像你这样，顽固不变，我看什么时候也是化不过来的。一个人已经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自己硬要去作驴子、猪，我看任何人也没办法。”

“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在报社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个。其他我所听到的报社外的有些右派分子，传来的消息大多是在劳动中表现很不错，都在下决心改造自己。你在这个问题上顽固不化，只能表明你的阶级立场，你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改变你的态度。或者说，你始终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认识自己的问题，始终和党对立。你既然不能和党和人民走一条路，那

当然,我们就必须分手。不然的话,那你就真心诚意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悔过,下最大的决心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

我感到,他不是我认识的林沫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

“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他们是这样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我们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了。感情的深度是与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我们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我在农场被加重处分后,他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没有批准。我回到报社后,他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他。我们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说:“我是因为反右派有问题才去向党汇报的,现在反右派弄到我头上,我更知道它有问题,怎么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过来,只好不改了。”

他说:“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别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适工作,你还养猪!别人摘了帽子,可以当记者。你就不行,不让你写,人们早把你忘记了。”

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们要我承认帽子后,才能摘帽子。人们说我是小偷,我说我没有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我偷东西没有。怎么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

他说:“就算将来证明帽子戴错了,可是,这几年,你许多文件不能看,许多会议不能参加,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赶不上去了。”他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只好拿《红岩》里的华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励自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最大的进步;宁要原则,不要脑袋;宁要真理,不要所谓的前途。他说:“党的政策从来只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是要牺牲的。你的不幸你一个人担承吧,不要连累我、连累孩子、连累我们一家人。”

我说：“你过去常说，有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闹离婚，以后问题搞清，这些人被人骂死了，抬不起头来。没想到你现在也这样！”

他说：“这次运动和以前不一样。”

他又以我是顽固右派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批准了。我被划右派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经过长期分离，都不肯要我……在闹离婚期间，我胸部突然剧痛，发作起来痛得死去活来。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痰，吐不出、吞不进。中医说我得了胸痹（即心绞痛）、痰迷心窍。经过长期针灸，才有好转。我从未想过自杀，但我算是体会到了：“怪不得有人会自杀！众叛固然可怕，亲离更为可悲。身受社会与家庭内外夹攻的人能挺得过来吗？”我决不会自己去死，我要亲眼看到反右派的结局。我想：“真正的战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

向党汇报

“右派分子”，对我可说是个新名称，1957年反右派了，这个名称才引起我的注意。运动初期，领导是把右派分子归入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右派分子就变成反革命、人民的敌人了。既然我对这个名称了解甚少，我为什么能够肯定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认，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别人都说我是，我承认了。以后证明我不是，别人也不会责怪我，“法不责众”嘛！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跟着大家一样，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这样才保险。我写去汇报：“虽然明知道承认帽子是最保险的路。对了，表示悔改了；错了，责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滑头，我宁愿当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数人走的保险路，宁愿一个人去过我的独木桥，因为我不能对党

进行欺骗”。我还写：“即使最后证明我还是个顽固右派，我对我所作的毫不后悔。因为让党了解我的真实面貌，对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党可以针对我的情况对我进行教育，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这两段话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动摇，无论以后到印刷厂、到牛棚或是五七干校，不管工资一减再减，不管肉体、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开除党籍时的诺言，随时随地向党写去大量汇报。下举数例：

我不能对党说谎

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16岁就开始把你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你连在一起，跟着你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你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你欺骗？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即使只说这么偶尔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你对我的教养。不管形势对我有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还是暂时，我始终一个心眼对你，始终对你绝对地老实。

做 老 实 人

毛主席说：“一切不老实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没有想到，老实人竟会遭到极大不幸。如果不信，我的经历可以作证！正因为我对党老实，我被加重处分；正因为我一直老实，一直被留在敌人阵营。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人！”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空洞的帽子对我早已不是重要的问题。我要做真正的无产阶

级战士，不做挂名的共产党员。我离党对我的要求很远很远，我今后改造的道路很长很长，我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我个人已经一无所有，就像以前的无产阶级。我把一切献给党，因此，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以前的无产阶级，除掉锁链一无所失。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不会失掉什么，除了帽子。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炼。我要在风浪中不倒，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当工人们要我戴高帽子游行后，我写：《我的心好像一座大山》。今天晚上，工人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行。在我耳边大喊：“打倒顽固右派刘衡！”工人们口号声声，一点不能震动我的心灵。我的心没有发抖，不会向口号低头。我的心一动不动，好像一座大山。我的心十分明白：工人们在和假想的敌人作战！

和“走资派”们一块在牛棚改造时，我写：《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早晚，我们要在毛主席像前念两遍坦白从宽，我坦白；坦白从严，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经得起考验。

《一个欺骗》“站出来，请罪！”一转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么罪？我请什么罪？谁也讲不来。讲不来也要站半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没罪的人请罪，是不是对毛主席的一个欺骗？

《毛主席会不会难受？》又是打来又是吼，不爱文斗爱武斗。游楼、用刑又活埋。罚吃咸菜窝窝头。不听毛主席教导的不请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弯腰低头。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会不会感到难受？

《“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

从牛棚出来，在五七干校时，我写：《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胸口闷，呼吸紧，好像成了时代病。在五七干校接连发生。我谈谈自己，也议论议论别人。我感到……被党组织审查时的痛苦，常常

胜过在敌人的法庭。敌人对自己越凶，我心里感到光荣。党组织对自己越狠，我心里感到越疼。在敌人的法庭，同志们常常慷慨就义、英勇牺牲。被党组织审查，有的人会去投河、跳楼、吊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真的敌人。不但不是敌人，而且对党的感情很深。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党组织的不信任，不免要在心里留下伤痕。

《生活不应老兜圆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话斩钉截铁，我的脚站得稳稳。我不会有任何动摇，不会改变我的声音。同志们尽可放心，不要把我问个不停。同志们一提右派帽子，我是又高兴，又不耐烦。高兴的是：我的政治问题十分简单，有些地方值得夸赞。不耐烦的是：生活应该前进，不应老兜圆圈。

《落实政策》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要落实毛主席准确划分敌我的政策。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解决，文章无法往下写。如果一定要写，许多事情就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怀疑……》我等待我问题澄清的那一天，等待着，等待着，时间是那样漫长、遥远。把自己同志推到敌人那一边，我怀疑他是内奸，或者，是敌人所派遣。

《我有点醒悟》读了鲁迅的书，我开始有点醒悟。我不是什么英勇，而是“迂”，像方孝孺^①。方孝孺使他的十族受到杀害，我使父母、子女三代深受痛苦。我是书房里的呆子，不知实际生活中的残酷。被自己战友流弹所伤，这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悲苦中最大的悲苦^②！

《反右派还没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

① 见《为了忘却的纪念》。

② 见《杂感》。

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并不笑得最好》一个浪潮跟着一个浪潮，一个波涛跟着一个波涛，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会笑在最后，我并不笑得最好。因为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十分痛苦的过去了。

1978年，我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各寄去一信，通过我的奇特经历提出：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邓小平没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转给人民日报领导，上边批示，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于是，社长秦川和成坊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这不合逻辑。”秦川说：“现在中央只有摘帽一说，我们没有办法。”我说：“那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就给我摘掉吧。”我的帽子被摘掉不久，全国开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有10名“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余20名以后陆续获得改正，无一真右派分子。我获改正的那一天，我在楼道贴了一张“向党汇报”的小字报，这是我被开除党籍后的最后一次汇报。

1978年12月8日——“向党汇报”之1001^①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21年！……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是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现在，

^① 21年来，我向党写去的汇报记不得有多少次了，这里引用的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的典故。暴君山鲁亚尔每晚要娶一个女人，第二天清早把她杀死。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告奋勇地去了，还把妹妹叫了去，每晚讲故事，讲了1001夜，1001个，终于使暴君弃恶从善，不再杀女人了。

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①，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① 在“平冤”前边，我特地写上“彻底”二字，表示我对党寄托很大希望。

乐黛云

我的理解 我的怀念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

——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铎同志。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柯老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边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

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同志。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惊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蒂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在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两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

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难道他真就这样永远不再回来?作为一个大叛徒?一个大特务?我当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最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收取了七分子弹钱!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

程贤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2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世界。几年来,人们完成了过去几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历程。我在北大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我曾访问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我确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1988,4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

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1988.1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场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尽管时光如逝水,往事瞬间就会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但这些场景像里程碑,联系着一些人和事,标志着你成熟的某个阶段,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

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一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况且当时在我心目中,美国真是一个罪恶的渊藪,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可以无罪开释,二战胜利前夕,我亲身体会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后方的霸道横行!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当人们埋怨汉族太受束缚,不像少数民族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舞,她就会大声反驳,有时还会一展她圆润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谣:“沙土地呀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风吹竹帘我看见了,鸭蛋脸儿,黑头发,红缎子鞋扎梅花,当田卖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

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一次还曾为她不幸的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1957年6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许多多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钮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到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11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无声无息,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

她劫持而去；说不定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钮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 37 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 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 1951 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些什么呢？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孙 钿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波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1917年在上海出生,6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金,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追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年3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50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亥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波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年5月1日,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

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导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奸。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

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简直是猪棚一般的小屋子住着7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熏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囹圄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

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 25 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 1956 年 6 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 9 月初，才安排工作。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 11 时以后才拖着劳累的身体缓步回家。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逝，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 年春节，全家团聚，过得很快乐。我利用春节期间，完成了一部 20 万字的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我 39 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更感到党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 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万物都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

这次座谈会以后，我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候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贫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己嘀咕：“收了！不放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

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等我坐在椅子上，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刚贴出的大字报，气氛异常严肃。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我下班回家，见到门口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感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莞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

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睛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

相见也同陌路人了。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

“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

“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L·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诃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

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在寒风中踽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

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

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口罩就是白色恐怖吗？我写白色口罩，完全是真实的描写，毫无他意，不可牵强附会。也搞不到白色恐怖那方面去，难道口罩有黑色、红色的么？”

主持人伸出手臂指着我说：“你！你！你狡猾！你想逃过关吗？”

接着，另一个人翻着油印了的我写的诗稿，说：“这首诗写他自己去探望友人时的阴暗的心情：‘我/走过他家门口/望见窗子射出温柔的灯光/我伸手去敲门/但是缩回了手/我不想但是又多么想去跟他聊聊……’”你们瞧这首诗，恶毒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在一片恐怖之中，看望一个友人在心理上蒙受压抑！这是右派分子的心理！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

我听着这些对我的诗的所谓“批判”，发觉一些功利主义者的头脑膨胀得非常厉害，我再也听不见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只顾独自思考了，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掉入一个可怕的深谷，谁能预料到未来会怎么样？

我为胡风冤案蹲牢狱一年之后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的生活就在一次又一次“批斗”的灾难之中延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文化界“批斗”我的大会。当我来到大会堂前时，只见大会堂门前贴着两幅漫画海报，说我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另一幅绘着我和胡风、梅志、蒋介石“坐”在一张方桌边，说我们在密室“策划”向党进攻。大会堂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并且要我都看，我来不及仔细看，有些大字报像旗帜一样高挂在大会堂中间的绳子上，我的视力又极差，根本看不清那些纸上的毛笔字，但是命令下来，非看不可，还说必须看得仔细，要记录在笔记本上。人民大会堂会场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熟识的，有些是我亲近的，谁也不跟我说话，我自己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去逢迎。即使逢迎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同我说话。我又不愿说什么违心的话，于是，只好沉

默!

批斗的第三天下午要我检查。我登上台,手里拿着“检讨书”,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党的动机,也没有反党思想。我说:“我忠心耿耿听党说,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尽量说了话,党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么,我确实弄不清楚党说这些是否算数的?”

这时,台下有些轰然,接着有人站起来喊“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于是全场呼起口号声,我的生命在孤寂的山谷之中,四周回荡着振耳的轰鸣。这次谁也没有上台来“驳斥”我。有两个人拿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在讲桌前摊开,白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毛笔字:“攻克顽固堡垒”。

就这样,我被“攻克”了;就这样,整整三天兴师动众的批斗大会结束了。自此以后,这个小城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出“批判”我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半版冠以“臭不可闻的……”大字标题。我每次读后总是不禁失笑,一味嘀咕:奇哉!奇哉!奇也!奇也!

1957年严寒的冬天来临时,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右派分子”去梅山盐场筑海塘。“右派”帽子既然戴上了,只得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我在梅山盐场总是拼命劳动,每天从工地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来不及洗去满身海涂泥浆,就拿起扫帚打扫工房、宿舍和院子。我的小队、中队里的人除掉像我这一类“右派分子”之外,谁都嘻嘻哈哈,喝酒唱歌讲笑话;而我们这类人既笑不出也哭不成。板着脸到食堂去,也只能买些最劣的菜,如果买了一块肉或一块排骨,晚上开会时就要挨批,说什么“右派分子也吃上肉”啦、“享受干部待遇”啦、“甬想改造好”啦。

每天晚饭后,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全体集合,中队长训话,总不外乎讲点白天劳动情况、表扬与批评之类。从来不会表扬我,挨批评却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到山上去背树,这树与大石

块一起是筑海塘垫底的,树的叶子桠枝全部保留,故而从山上背到山脚下是很重的,肩上压得肿痛但也不能吭出声来,有时整棵树背到半山腰,脸上已分不清淌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一个上午每天要扛三棵树下山。也就是每个人一天要上山下山背树6次,身上穿的破棉衣,而贴身的衬衣却给汗水浸透……到了晚上大队集合,大队长训话时要批评,说我背的树都是“龙头烤”,“右派分子”狡猾偷懒,专拣小树背,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偶尔听到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京剧团团长自杀了,送医院急救,救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他和我对视时的微微一笑,仿佛又见到了他咬紧牙关挑着一担石块,扁担压在肩胛上,两只装石块的竹畚箕晃来晃去,走路的步子歪歪斜斜的神态。

到了围封海塘缺口的那天,真是紧张极了。我所在中队负责溜送泥块,我们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杆,在溜泥板上拨送着接连不断飞驰而至的泥块,不能停留一刻,一停留,泥块便立即飞来堆在我的脚旁,那可耽误了大事,像我这类“右派”身份的人,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身上手上脸上全是泥浆,双脚站在泥浆上要下沉,所以站在一块竹编的垫板上,时间站久了,垫板在身子的压力下渐渐地下沉,一直到我的脚都陷入泥浆中。为了争取退潮时间把叫做“塘门”的海塘缺口堵住,吃午饭时我们双手中的竹杆仍是不停地传送泥块。为此,食堂来了许多中青年妇女,把肉包子塞到每个人的嘴里,喝水也是由她们喂的。长龙般的整条流水线操作完全机械化了。我只知道双手拿了竹杆往后拨送前面滑过来的一小块泥巴,人似乎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小担山挖泥、帮助泥水工盖屋时,中队长带了一个人来找我,该人板着脸孔,严厉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来!今天给你定性做结论了,你在纸上签个字,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说完他从皮包里拿出4张打了铅字的纸,翻到最后一张,指着空白处要我签个名字。我说我没有笔,此人便从左上边

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抓住钢笔，要翻阅纸上写着些什么，这4张纸一条一条列着我的言论罪行，有几条是用纸粘住了的，显然是不给我看的，我要撕开纸条看，此人竟然按住我的手，不准我撕开粘住的纸条，他有点恼火地说：“不准撕！”

我说：“你不准我撕开来看，我怎么会可以签字？”

他说：“就是要你签字盖手印！”他抓住我的手，我手里还捏着他的钢笔。我说：“我不看清楚就不签字”。他硬是要我签字，我也火了，我把他的钢笔往海涂里扔去，说：“你不准我看，我就不签字！”

他说：“你这样抗拒到底，好！好！你不签字也可办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愤愤地收起纸条，夹着皮包走掉了。

我脑子里混乱不堪，像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惶惑起来，我又对自己宽慰地说：“大不了多吃点苦头！大不了是死！”那个走掉了的人，姓什么，来自什么单位，我都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姓王，是文教部门的干部。过了三天，他又来了，我正在海涂里劳动，中队长派人来叫我不要劳动了，回去收拾我的衣物行李，那个姓王的矮个子也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我离开了梅山盐场，回到宁波，立即被押入大狱。从此，冬寒暑蒸，屈辱悲惨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我活下来了，终于活到了老已至，真是奇迹！我的一个亲人，见到我写这些往事而为我忧心，她怕历史重复，怕我再遭殃，我对她说，我写的是真实，为的是冀求历史不再重复，为的是鉴之戒之。

我庆幸这么多年的灾难没有扭曲我的灵魂。

1996.6.

公 刘

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我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

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趑趄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瘢。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 1500 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 30 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 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狂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 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

住。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远处山腰开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竟，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

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 300 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 米、10 米、20 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粱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粱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 8 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

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却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群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我哪一只手心？”中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

中中中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大枪。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轮着供应。男女分灶，只能扎在男人堆里，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不敢吱声。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不像如今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汤，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三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

为了探矿，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这天，我们正走着，突然间，空谷里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我茫然地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地味道。

我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沙沙乱响，还没等我作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无比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操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自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瓜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牲！我又挥舞起探

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调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不但沾着狼的血，带有眵目糊和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右派”，竟然教恶狼变成独眼龙了！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显然是助威，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谢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块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您；我就怕您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了。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您的名字赖，你看，您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哈哈大笑。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的确是为了找到铁矿，完成任务，哪怕是立上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

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

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怪异,把儿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

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死命!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记住,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般般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 20 天;1984 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 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罢。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这句俗语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原载《人生六十年》丛书),

丁 耶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

“突出贡献”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我是个“四放”干部。在“改正”以后,新上来的领导班子很关心我,要设法给我评一个“高级职称”,好享受“高干”待遇。一位管人事的同志问我有什么“突出贡献”。这可难住了我,写了半辈子诗,严格说来,能有几句算“诗”呢?!可她一定要我讲几条,好往上呈报。我憋了半天只想出一条“突出”的:“1957年帮党整风,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我的意见如果被采纳了,那可真是‘突出贡献’!”她听完笑了:“您真会开玩笑。您不是几次得过文学创作奖吗?”我严肃地向她解释:“您说的和我讲的并不矛盾;我得奖的那些作品就是当年在‘鸣放会’上发言的内容,只不过是文学形式把它形象化了……”

“鸣放宫”和“鸣放罪”

我市一所高等学府有一座可纳千人的大礼堂,它原是伪满时的一座“神社”,俗称“大庙”。1957年易名为“鸣放宫”。这是根据

省委一位文教部长的倡议起的名,还请大书法家写了匾额。足见省委领导是如何重视并提倡发扬民主。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要百家争鸣,不一家独唱。就这样迎来了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为帮助党整风,省委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许多作家、教授都被请到会,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几年来的文教工作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我当时刚从东北师大调到省文联,受省委委托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并创办文艺月刊《长春》。我到处奔波,请在我省的作家、各教授参加分会工作(这就是“作家办作协”罪名的由来);在成立作协过程中,发现提名当分会理事的人中有的既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没写过半篇文学作品,会员们有意见,我把这意见在鸣放会上反映了(这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领导”的罪证)。此外,我在会上对东北师大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认为不应采用学生斗老师的过“左”办法,公开揭露专家教授的私生活,捕风捉影辱骂教师,使教师威信扫地、难以教学,有些名教授被排挤出校……我的发言引起省委的重视和肯定,并且刊登在本省的报纸上。有的学生看到我的报上的发言,便给校方写了些“还我教授”的大字报(这就是我“攻击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外加“煽风点火”的罪行)。

我当时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还以为给革命做了一件好事而甚感欣慰。我深信有关方面一定会考虑采纳我的意见、改进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所以没等会议结束我就背起行李钻进长白山老林里,访问老伐木工和抗联战士,动笔写起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我当时的心境是坦然的,从没想到我的发言会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复辟变天”联系到一起。

当报纸上登出批判我的文章——《作家办作协,丁耶黑心暴露》,我还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一场误会。谁知这场“误会”一直延续了20年,其罪名是在宪法里也找不到的“鸣放罪”!

“连升三级”

我早不升级,晚不升级,却在定为“右派”时连升了三级;不是由人事部门升,而是报纸上给“升”的。我本出身学生,执教学校,非党非团一群众,突然间在报纸上公布了我的“理事”、“主任”等官衔。我当时在惊恐之余,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终于受到“重视”,和一些名教授、名导演并列在一起,甚至比他们还要显赫些。事后才明白,之所以把我提升得那么高,不是对我的器重,而是为了向上边报成绩,表示反“右派”的“战果辉煌”。这有点像一年以后发生的农民“浮夸风”,虚报产量,亩产万斤……我被提升还有个作用,就是作为那些真正厅局级的替“罪”羊。当然这些同志最终并没能逃脱“劫难”,在“反右倾”或“文革”中仍被揪了出来,成为“漏网右派”或“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那极左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的。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被“错划”之初,我的思想极为混乱,认为当政者“失信”。鸣放之初,不是有言在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又成了“引蛇出洞”呢?原来“鸣放”伊始,省委领导确实是想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虚心听取意见,以改进工作的。但是,当意见提到自己的头上,触到了痛处,就恼羞成怒。那位曾为“大庙”易名为“鸣放宫”的部长,听到有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时便勃然大怒,找到提意见的人,劈头就是一句:“给你脸你往鼻子上抓,真是个狼崽子!”一位教授事后对我说:“当时那个发扬民主的‘鸣放会’真有点像叶公好龙,当这条龙(民主)真的来了,又怕自己的缺点错误被‘龙’揭破丢官……所以反击‘右派’命令一下,便马上扔掉‘民主’招牌,投身到‘反右’斗争中去了。”这位教授说得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2500年之久,哪能在一个早晨就化“专制”为“民主”了呢。当政者想得未免简单,而我们这些希望民

主与法制的人想得就更天真了！

三易“流放”地

可能是“反动透顶”吧，我总把改造的地方叫“流放地”。先是流放到长白山脚下人称“东边外”的小山村，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我称它为“西西伯利亚”。我一边劳改，一边吟诵韩愈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年劳改，收效甚微；又把我单独送到内蒙边上一个劳改农场，这座农场过去是改造犯人的，1958年才改成一些“罪重”“右派”的劳改农场。在这里所有的“右派”都比我处分重，起码是“劳动教养”。相处一个时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罪行”并不比我重，而是处分重；因为他们都不是“知名人士”，有的政治水平很低，连“左”、“右”都分不清楚，仅仅因为反对他们的科长、局长就被扣上了“极右”；有的只是好讲怪话，恰好赶上“反右”就扣了个“右派”。如果当时“反左”的话，可能就扣个“左派”，总之赶上什么就扣个什么。可见不仅这些被扣帽子的“政治水平低”，就连扣他们帽子的领导水平也不高。我在这期间替好几位小“右派”代写过检讨，他们尊我为“老前辈”，上什么“纲”、“线”，都先请教我。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组长”。可正当我行“官运”时，上边有令，又把我调到另一个“条件好的”劳改农场。我治下的“组员”们都恋恋不舍地为我送别，把我此番调走当成“升迁”。因为我将去的农场在省城郊区，每两周还可以探一次家。听说在那座农场里劳动的还有许多“下放干部”，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条件”很好。没想到我去后不到3天就失望了，开始留恋起“东边外”的“小西伯利亚”，也怀念与我同“病”相怜的难友们。

我在这个市郊农场不仅不是“组长”，连当“组员”都矮人一截。不仅因为“罪”大处分比别人重；主要还是我们这些“右派”成了那些犯有“右倾”错误又急于改正的人的活靶子。尤其是我，还老是

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那些急于当“左”派者创造有利条件。这里的政治气氛非常浓，说错半句话就要上纲上线，而我还老说“错话”，这就更丰富了每次“阶级斗争”的内容。我成了“反面教员”的首席，不时“现身说法”。

有一次我犯了一个连自己也不肯饶恕的“大错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一位下放干部当成了“同志”，并且公开说他是“好人”。因为他待人和气，没有向这些犯“错误”的人身上“落井下石”。这一“颂扬”可不得了，他的“班长”立刻被革掉。这边批判我“忘记身份”；那边就批“原组长”的右倾。我后悔莫及，罪不该忘记那条教导：“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害了这位同志，使他跟我们劳动了两年，直到所有下放干部都调回原单位，他才离开。

这件事发生后，有些下放干部变“精”了，提高了“觉悟”，开始同“右派”誓不两立，对我更是如此。开始在我这个“花岗岩脑袋”上磨他们的牙，当他们的牙齿磨尖利可以咬人了，就放回去参加整人的运动。客观上我们成了他们升迁的“人梯”。更不幸的是有些政治上还幼稚的“小右”也学会了这一招数，不断汇报我的“反动言行”去“立功赎罪”。在生活会上让他们互相揭发，这叫“瓦解政策”，有位教导员说的更露骨：“狗咬狗”。可有些人却偏偏要互相“咬”，结果彼此都咬得遍体鳞伤。有一位姓于的和一位姓周的，就是这样互“咬”，最后都“咬”进了监狱。落实政策时他们才说了实话，当初互相攻击的都是“不实之词”。

看出了这个招法的不人道，我没有上当，我宁愿当“活靶子”、当“人梯”，我希望大家都解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偈语成了我这个无神论者的信条。结果是所有在农场劳改的“右派”都摘了帽，我这顶帽子还牢牢地长在头上。

突击摘帽

“文革”初期，我的“帽子”戴得更“牢不可破”了。据我所知，此时我省只有少数几个“顽固分子”还没摘帽，我认识的有某大学政治系主任智某，另一位是“老延安”，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还有一位是个“老八路”，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在运动中仗义直言，保护他领导下的几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的，他一直不承认，还一如既往地向党组织交党费。自然没人敢收，他就自己“代党保存着”。还有一位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直不认罪，他说：“我同共产党共事多年，并肩战斗，我要是右派，那共产党也是右派了。”1962年劝他“认罪”，好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你摘个什么?!”而我呢，则是省文艺界惟一个没有摘帽的，我早已安于现状，继续当我的“反面教员”。“文革”一开始，我第一个被关起来，“造反派”为表示自己是“左派”，当然要用我这个“右派”来证明。

1968年，珍宝岛事件发生。我在“牛棚”里听到消息，非常替祖国命运担心，对自己的政治问题，早已置之度外，没有想到“造反派”却把我同珍宝岛联到一块儿!

那是在1968年8月中旬，驻我单位的工宣队长老于把我找去。他是汽车厂的工人，外号“于大锤”，我想恐怕又要“锤”我一通。可事实恰好相反，他不但没有“锤”我，还给我让座：“你戴几年帽子了?”“10年。”“还想不想摘?”我想这是啥时候，还谈这个，有话就明说，拐什么弯?他还真没拐弯，像抡大锤一样，“你写个检查，在大会上讲一讲你立场转变的过程。”是我“转变”了还是谁转变了，我真说不准。回去以后，我开始写检查。对这种差事，我已经轻车熟路。我把上万字的提纲交了上去。“于大锤”看看那厚厚的稿纸，皱了一下眉头：“写这么多干什么?又不是写小说，拿回去删

去废话,给你 10 分钟在大会上讲完!”

下午专为我开了个群众大会,各路“造反派”都到齐了,从他们疑问的目光里断定,谁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有的用鄙夷的目光看我登台表演,习惯地拿出小本子,准备批判我的发言。

我把准备好的检查提纲用 15 分钟念完了。下边一阵嗡嗡,显然对我的检查表示不满。有个“造反派”头头举手要求发言,此人曾率先抄我的家,并主张把我撵下乡,没等我搬走就把我住的房子许诺给他的一个朋友。他的发言声色俱厉:“这不是检查,而是翻案,再一次向党进攻。”我一听火就上来了,霍地站了起来想同他争辩。反正已经把我打到十八层地狱,妻子疯了,儿子吓成癫痫,还怕什么,刚要张嘴反驳,“于大锤”把我叫出会场,“丁耶,千万别发火,耐着性子听下去,意见提的不对也不要反驳,就当放屁。”我回到座位上继续听“造反派”们放屁。听完几个“屁”之后,“于大锤”上台讲话:“丁耶同志今天的检查很深刻,天知道我哪地方深刻,“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的认识,立场有了转变……根据……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下边听众有人鼓掌,从稀疏的掌声中辨得出他们没有想通。不仅他们不服气,连我自己也觉得摘得不仗义。可实际谁管你,帽子需要摘就摘,这是政治需要,由于需要可以是非颠倒,可以指鹿为马。

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我“改造好了”,而是由于珍宝鸟事件发生,要团结全民族,一致对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不要树敌过多,化消极为积极。我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同志也在这次摘了帽子,那位“老八路”还坚持他不是“右派”,谁管他呢,给他“硬摘”掉了。

今天回忆起那件事,并不奇怪,当初戴帽子就没有半点道理,今天摘帽子还谈什么道理不道理。那时是权当家,而不是法作主。像造反派说的: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理!

“摘帽右派”与下放

“摘帽”与戴帽照理应当有本质的差别，而实际上差别并不大，这是我在下放过程中逐渐觉察到的。

1968年秋冬之交，全省掀起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高潮，为了促使干部积极响应号召，我省还增添了个理由：减少城市人口，保护干部，预防原子弹袭击。有些干部不知是由于“觉悟高”还是被原子弹吓的，纷纷报名，全家落户农村，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惟独我，没有给戴花，而是在吹吹打打送走那些下放干部之后，才派辆汽车偷偷地把我家的“老弱病残”者运送到乡下，就像运走私黑货一样。可见我同下放干部是内外有别的。还有一件事，更使我明白了对“摘帽右派”是另眼看待的。下放以后，我本性难改，又重操旧业，继续写我的伐木工人史诗《鸭绿江上的木帮》，而且冒失地投寄给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一去半年没回音，后来听一位老“五·七插”讲，出版社来人了解我的政治情况，一听说我是“摘帽右派”便没再理我。又过了半年，长诗退还，附了一封退稿信，建议我写写“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我对这场“十年浩劫”很感兴趣，是要写的；但不是那时候写，而是在今天；不是写它的“伟大”，而是写它的罪恶。

“改正”以后

“改正”政策落到我的头上时，有人估计肯定要“卡壳”：“丁耶要不是右派，我们单位就没有一个右派了。”等翻开档案，审议了我的“右派言论”，才发现“丁耶的言论是正确的”，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一致呀！只是说早了点……”在“改正”宣布会上让我代表“错划”表态时，我牢骚两句：“从今天起，我又是35岁了，那22年不能

算我的阳寿……至于‘改正’，谁错了谁改，不要不明不白的，好像谁都错了，又像谁都没有错，这样怎向人民交代，怎向历史交代……”其实我说这些话是多余的，历史总像一个羞怯的少女，有史以来总是如此。可我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向人民说谎，应负起历史给予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

20载岁月就像水土一样“流失”掉了。组织上又把我安排在作家的位置上，可我的笔已经写不出什么诗。20多年尽写检讨了。后来我想检讨也是一种文体，就发挥我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吧。不过我把这种“检讨”文体也“扩大化”了，“扩大”到社会、国家的范围，不仅为自己写，也替别人写；替那些有错误不愿意检讨的人写，替检讨不深刻的人写。为了扫清改革的障碍，我愿再冒一次险，举起我的投枪向那个巨大的封建腐朽的幽灵进行最后一次冲杀。

1986.12.8. 于长春

秦兆阳

追 求

我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月25日被宣布开除党籍。从此我才知道帽子压在头上的滋味。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所以，1961年11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后，当个别朋友暗地里祝贺我的时候，我说：“我并没有感觉到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因为，并没有还给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心并没有归还原处，我的灵魂仍无所依，我的生命仍无寄托。虽然拚命工作能够弥补一点内心的空虚，但那不过是暂时的，是一种勉强安慰自己的办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只要努力为革命工作，像一个最好的党员那样工作，就仍然是个共产党员。”不，我没有这样坚强，我是个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脱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脱帽以后，直到1979年3月“改正”为止，十几年中仍然痛哭过无数回，有两三次哭成了严重的眼病！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大先生”。这是从幼年时代就养成的，遇事“较真”的认死理的性格，参加革命以后，党又培养了我这种“认真”的性格。

所以,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被调回南宁以后不久,我就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即使是让我重新入党也可以……”

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答复。

1964年夏天,我实在不能再忍耐再等待了,趁老伴回北京度暑假之机(当时她在柳州某中学工作),我也请假回北京看望孩子们,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想趁请假的机会向上级探询一下入党问题是否有希望解决。

“××同志,请你很坦率地告诉我吧,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来?如果根本没有可能,我就死了这条心,也许内心的痛苦倒可以减轻一点……”

“你到了北京以后,去见见A同志吧。”

“我向来不习惯于看望地位高的领导同志,而且他一定很忙,不容易见到。”

“一次见不到,两次;两次见不到,三次;多碰几回钉子,总会见到的。”

这是我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请假时,互相间的一段对话。

接着,我又去找自治区的文化局长请假,并且趁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不料,局长的回答竟跟上述宣传部长的回答一模一样,两人像是对过口径的。

“怪呀!”我想,“也许我的入党问题关键在于北京的A同志是不是点头吧?”

回到北京以后,矛盾啊!我的事就是他们制造的呀!现在我想重新回到党内来,还要去哀求他们吗?所以我一拖再拖,从7月拖到了9月,老伴不断地督促我,责备我:“你这几年干痛苦万痛苦,现在广西的领导同志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还不老着脸皮去找一找?为了党籍问题,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

9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先到×××胡同×

×号去找我最不愿意见面的 B 同志,为的是打听 A 的地址。离开北京已几年,谁知道 A 搬到哪儿去了?没想到,B不在家。我只好到隔壁 C 同志处坐了一会。当时,从报刊上看到,正在大批《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全国文联正在“整风”。所以 C 同志告诉我: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他要带领一部分文艺干部到山东曲阜县下乡搞“四清运动”。那个县农民生活很苦,要“三同”,他有胃病,很担心吃不消……他谈得很坦率很亲切,像不知道我是个“脱帽右派”(这使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感激,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就会使我心里发热,就会终生不忘)。他并且把 A 同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告诉了我。我感激不尽地告辞出来,没想到,正好在门道里碰见了 B 同志刚从外面回来。

我只得用像几年前共同工作时的口气,叫了他一声“××同志”。他也感到意外,“啊,是你!”然后让我跟着他进了宽大、敞亮、书柜上摆满古瓷的工作室。落座以后,就谈起话来。我说明了来意。他说,A同志最近患心肌梗塞,身体不好,恐怕不宜于去打搅他。不过他还是把 A 的地址告诉了我。接着就说起他自己的忙碌来了:某同志、A同志、还有他自己,是个三人小组,领导文联整风,每天去上班。……我想:“可见 A 还能工作。可见你现在更加成了重要人物,可见又有多少同志的命运操在你们手里!?”

“文联整风,事情很重大……”他说了一半又转移了话题,“你在广西还好吧?脱帽以后分配了什么工作?”还是那熟悉的圆润的喉音。

我告诉他:当地组织上对我很照顾,让我在文联专职写作。

“啊?”他像是出乎意外,“我还以为你在《广西文艺》当编辑呢!”意思很明白:你还能搞写作?能当编辑就不错!

他的长方形白脸忽然像是有点冷冷的了。我就赶紧告辞出来了。

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一句话:

“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

那是1958年7月下旬开除党籍的前两天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我的结论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的。很明显，意思是要我不要再存幻想了。当天夜里我真像五雷轰顶，又像堕入了深渊，睁着眼睛看着黑夜，看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一夜未眠，天不亮就不知不觉出了门，像游魂似的，身不由己地在附近的小胡同里飘游晃荡。天刚粉亮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晃到×××胡同××号门口了。正好传达室的同志开了大门，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晃进了大门。传达室同志声音沙哑地问了一声：“你怎么……？”他大半也知道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没有回答他，不知不觉就飘晃到了B同志的住室门外。站了会，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里面才问了一声，是带着睡意的声音，是那个圆润的喉音。

我回答了一声：“我。”里面又是好半天没有动静。我只得在屋檐下冰冷的石阶上坐下来等着。

又过了好半天，听得见屋里起床、穿衣裳、拖鞋、跟老婆小声嘘嘘的声音。终于，外间屋的门开了，露出半个高大的身子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圆润的喉音，但是冷得令我发抖，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于是，我含着眼泪，只觉得周围都是云雾，我在云雾里飘浮。……忽然，我的胳膊被一个人捉住了，抓得紧紧的，颤抖着。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儿，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阿，我的妻子，只有她深深地了解我！

当时，我俩在静寂无人的小胡同里抱头痛哭，好久好久……

现在，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耳朵里又响着几年前听到的那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是圆润的喉音，更加冷得令我发抖。

因为,经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体会到了,像我这样的人,半人半鬼的人,即使人民看着我不顾死活地工作,对我并无多少成见,有的人甚至还抱同情,可是,在人的世界里做鬼……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怎么能死心呢?不能啊!于是我给 A 同志打电话。他的女秘书问了我是谁,然后告诉我:A 同志到天津去了,不在家。他的心肌梗塞病很严重,干吗不住医院?干吗要到天津去?我只得又到他的公寓去找他。传达室里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不在家。”到哪里去了?“反正不在家!”

很明显,反正是不见我。

是不是应该死心了呢?不!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既然已经耐着性子老着脸皮开了头,那就追求到底吧!而且,老伴又不断鼓励我——她是希望,万一我能追求出一点眉目,不再总是觉得活不下去,不再总是在精神上折磨自己,她也就放了心,她也好做人,而且孩子们的处境也会好起来。

于是,在又犹疑了大约半个月以后,我又鼓起勇气到×××胡同××号去找 B 同志,希望他能在 A 同志面前为我通通款曲。不料,这一次不但 B 不在家,连隔壁的 C 同志也已经到山东曲阜去了。

我只得失望地推着车子出了大门,向西边走去,打算去看看 D 同志,因为报刊上已经在批判他了。在 1958 年上半年批判我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对我暗抱同情的。现在他也倒霉了,我能不顺便去看看他吗?

可是,我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背后不远汽车停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颜色的小轿车正好在××号门口停住了。我认得这辆汽车,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必定是 B 从“三人小组办公室”回来了,我心里一喜: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这时天已黄昏,看不清汽车里面的人。我扶着车子等着。怪呀!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吧,即不见开车的司机出来,也不见坐车的

人出来!

我只好又推着车子往西走去。几步以后回头一看,车门开了,B同志那高大的身影从车里钻出来,走进大门去了。

啊!“你以后还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嘛!”——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这句话,多么圆润的喉音,然而又是多么令人发冷!

我连忙跳上了自行车,简直不记得是怎么走进了D同志的家。我泪眼模糊地看见,他正跟他的儿子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下围棋,他的老伴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观战。他只对我点了点头,示意叫我坐下。

我呆呆地坐了五分钟,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在那样的时候,有什么话好说呢?有什么话能说呢?虽然我很惊奇,在这大受批判的时候,他怎么有心思下围棋?可是,当时我怎么好拿这样的问题问他?

等我重新骑上车子在小胡同里东弯西拐的时候,这才想到:是的,他只得下围棋,他应该下围棋,应该以此来追求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的身体实在经不住风浪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D同志的面。在十年浩劫当中,他比我还更不幸得多。其实,他真正是一个十分蹩脚的棋手,不可能在下棋的游戏当中追求到内心的平静。)

当时,北京的街道像在雾中,像在水里。我在用眼泪染湿北京,北京也在用眼泪染湿我。回到家里以后,老伴几次问我:“有点结果了吗?”我声音沙哑地把情况简单告诉了她。她痛苦地闭上眼睛愣了一会,大约是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我,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潮起伏,喉头酸哽,不知道过了多久,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我的心能够冷下来吗?能够浑浑沌沌地混日子吗?能够麻木不仁地活下去吗?不能啊!你们哪里知道,如果让我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心里积存着多少热力!”我忽然想起了鼓励自己的四句诗——是步鲁迅先生的原韵而反其意,

但其内涵的悲苦而又炽热的滋味可能有些相似：

犹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岂由之。
若蓬柳绿江南雨，
策马长途学健儿。

“江南雨”在“柳绿”的时候，意即南方的春天，意即希望能够在广西重新入党。

1985年1月于北京

(选自《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忆肖也牧

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悼念死难同志的文章，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写文章悼念我所怀念的死难战友。20年的不幸使我与他们疏远了，许多新的情况不了解，许多旧的情景模糊了，某些“关系”牵制得不好说话，刻画性格和抒发感情又不易，自己“改正”后要做的事情太多——这都是我未能动笔的原因。近年来精力衰退了，对许多想干的事情不能不总是“且听下回分解”，不知不觉就犯了老年人爱回忆往事的毛病。

历史在咀嚼着生活的滋味，
大地上浸透了欢笑与眼泪。

消逝的未必会全都消逝，
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流出的如果是滚热的血液，
终归会给人间添一点生机。

这是我的一本被冷落了 20 余年的长篇小说有幸再版时，我为它写的几句卷头诗。我想，这诗也可以用来说明我对于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们的心情。

我常常想念肖也牧，虽然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算多，相知也不算深。这原因，大概是跟“最早”二字颇有关系。有四个“最早”：他是解放以后最早受到批判的作者；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是我经手发表的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他和我都曾经最早对这一批判多少表示了一点意见；在我被“划”掉了的 20 年中，他是最早（其实也是唯一）向我约稿的人。

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晋察冀边区作群众工作和报纸工作，我在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不记得是否跟他见过面，也许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写的通讯，才知道他的名字。解放以后彼此是怎么相识的？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几次约我去中山公园的茶室喝茶，跟我谈论他的写作构思，征求我的意见。那时他颇有些青年气，单纯、直率、随便，对自己颇有信心。

于是他给我寄来了《我们夫妇之间》。

我知道，老干部进城以后，对文化低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渐感不满。这样的事决非个别。《我们夫妇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明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作品是不是对夫妇双方都多少有点不适当的描写呢？因手边没有原刊物，不及查考。但

无论如何，作品没有重大原则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我和他当时都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批判“忘本”思想的小说，竟对他以后的命运和文坛的空气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

从此，直到1956年夏天，我跟老肖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他来约我为新创办的《红旗飘飘》从刊写稿。第二次是来让我看《红旗谱》的原稿，让我提供一点参考性的意见。两次接触中我都没有问过他对受批判的感想和看法，以及批判对他的处境有什么影响，虽然我在暗暗为他难受。为什么不问？也许是不愿意触及他的内心的伤疤，但更主要的是他那坦率真诚的态度一如既往，向我约稿时那么耐心，请我看稿时那么诚恳，好像并没发生过对他有什么影响的大事。

第三次——1956年夏天，他给我送来一篇他自己写的短文章，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感得好！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诚恳地承认过去那次批判对他有益的一面；二是说了一些他被批判以后到处难以见人的情况（但写出的比他当时跟我谈到的要少）；三是由此提出建议；文学评论不要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来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当时我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我看情况替他修改一下：“由你全权处理。”

于是我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了。

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来往。一直到相隔20余年以后的1970

年,我才知道他也在1959年被补划为右派,而且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了非常惨酷的不幸。1956年发表的、经我作过修改的那篇《有感》,是不是他被错划的原因之一呢?我一直有这种猜测。并有负疚之感。我所知道的,只是《对肖也牧……〈有感〉一文的修改情况》,在1958年成了批判我的材料之一,被编印在一本《秦兆阳言论》中,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散发。

这也许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件小小的“史实”。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明白真相,也为了纪念肖也牧同志,特将我的《修改情况》节录于下。

原文:“我认为……这一次批评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也使大家得到了益处……”秦改为:“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来看,过去那次批评一方面固然给了我很大的教益(这是我一直到今天还十分感激的);另一方面却又因批评文章有不够完全妥当之处,而对我和读者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原文:“以上所说的……对我……的批评,多少有点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对待一个好人。这种批评所引起的种种事情,所形成的一种空气,确实是很可怕的。”秦改为:“以上所说的……批评,我以为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这主要倒不在于……给被批评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它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后果,使被批评者再也不能复活,并且给其他作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威胁。”

在肖的原稿中谈到自己出去作组稿活动时不敢用肖也牧的名字,秦在后面加了一段描写:“甚至我到某些机关去办事情,会客单上填写的是我的真名(吴小武)而不是肖也牧,不知怎么竟也有人知道,窗户外面竟会出现许多好奇的、含有轻蔑神气的眼睛,和‘肖也牧,肖也牧’的声音。……只有一个人坏到了成为‘癞皮狗’和‘敌对阶级’时,人们才决不会原谅和信任他。”

下面秦还删掉了一段,内容是:组织上要肖写英雄罗盛教的事

迹,但又不准他去朝鲜前线收集材料,而是派别人去代劳。

这里要作几点说明:一、我的修改在于强调批评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但并未减弱肖也牧“诚恳接受”的态度,相反地有所加强——是为了“站住脚跟”好提出建议。二、最后的那段“描写”并非我的臆造,而是肖也牧当时对我“举例言之”的。三、不准他去朝鲜前线的一段其所以删去,是考虑到也许会引起他所在单位的反感而对他不利。四、即使是读一下上述的节文,也可以看出肖也牧是诚恳地想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来促进“双百”方针更好的得到贯彻。我认为,我和他都是倒霉在这一类的诚恳和认真上。

1958年以后,我跟他就天各一方了。

1968年春夏之间,我在广西柳州,忽然接到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是由于看到了《广西文艺》上连载的我写的《两辈人》,颇为赞赏,希望写完以后给该社出版。被划成右派后还有出版社向我约稿,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当时估计,这很可能是肖也牧起的作用,因为只有他知道我有很多战争年代的素材,立志要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也只有他知道,他的老友这时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支持;也只有我知道,他这样做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人之相知,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从别的同志那里得到了证实,我的估计是对的。但当时我没有给青年出版社回信——原因和心情,正与他之不能去朝鲜前线的道理相近似——我当时倒是颇有自知之明的。

1958年初,当我正开始被批判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作家协会的“大跃进规划”。会后,我出于对大跃进的盲目热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建议书》交给了党组。总的意思是建议加强文学工作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具体办法是:组织一些作家去工厂、农村、机关,帮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协助群众写工厂史和农村史。后来,在我20年的不幸中,为了

寻求精神支柱,解除内心的苦闷,许多革命回忆录就成了我如饥似渴的读物。而读得最多的,则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的《红旗飘飘》。直到1979年我跟原在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编辑同志谈起肖也牧来,才回想起:原来这个刊物是肖也牧和另两位同志在1955或1956年创办的,那时他曾经找我约过稿。

肖在上述《有感》一文中说自己是好人,这“好人”两个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看法的天籁之声,是理直气壮而又当之无愧的。试想一下,全国解放初期,他自己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以致于成为社会上的“无面目焦挺”以后,竟然最早地创办了一个发表革命回忆录的刊物《红旗飘飘》。如果他心里没有一杆经常飘动的红旗,能够竭力地开创这一工作吗?他在编辑工作中辛勤的劳绩,认真的态度,对青年人的耐心帮助,直到今天,仍然使得在他下面工作过的同志怀念不已。他从来没有权位之心和名利之念。他只知道工作。划为右派以后,仍未放下手中的笔。

也牧同志哪里会想得到,我们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旗,竟会在夺取了全国胜利的若干年以后,被反革命的野心家们夺了过去,换成假的红旗,肆意残害那些高举真红旗的同志,包括你肖也牧在内!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犍,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如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余毒立即消亡!

1985年7月9日于北京。

邵燕祥

1957:中国的梦魇

人生往事有一些如梦如迷。人类历史有时也仿佛一段噩梦，留下一个哑迷。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距今已经有35年。3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而对多数人则是半生。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了，无论是斗争的领导者或当时斗争的对象。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然忆起那场政治风浪，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记得一些人的遭际，记得一些人的嘴脸，记得几句社论，几声口号，记得一种气氛，一些镜头和细节……他们不是历史学家。

至于这一反右派斗争是怎么“爆发”的？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人们响应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到6月8日党内发布指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四十二天中这样的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吗？是偶然发生的吗？是像有些人说的某些尖锐意见唐突了最高领导人，以致“一怒安天下”？或是像有人说的重演了封建时代的“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误人多的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①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

^① 《词林纪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官及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的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然,而有深远的背景和根源?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专著。然而,应该感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使我们能从已入选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了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前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思路,了解他关注的主要方面,以及他一直坚持到晚年的一些论断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也是我们索解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何以在此时而不在于彼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把钥匙。

一

人们熟知,毛泽东是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① 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的体系。

对于作为体系的毛泽东的思想,不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发展地即从动态中去理解它。随着党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言行经常突破原有的结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变化和实践的灵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历几十年不变的,是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完成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建设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一卷,3页。

在全国执政之初,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外敌人的存在与活动,经济和政治的困难,认为立足未稳,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年3月12日)^①;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许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未来”(1950年6月23日)^②。他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阐释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

^①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毛选》第五卷,13页:“……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②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27页:“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①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许诺选举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后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15日)^②半个月后,他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重申:“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③

理解“人民”是什么,相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密切相关,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而无论在哪个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1949年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并不是平列的。当时有人解释五星红旗,说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得到首肯,说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四个阶级,其所以受到批驳,就是由于这样的误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

① 《不要四面出击》,《毛选》第五卷,23-24页。

②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选》第四卷,1400、1403页。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3页。

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① 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就是指当时和后来习惯所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是以他们“能够同我们合作”为条件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要去“团结”的“知识分子”，同与工农一起作为“基础力量”亦即党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加以区别的。后者即革命知识分子，一般是指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是指已经或正在实现“革命化”的；前者即所谓现有的知识分子，早在1945年毛泽东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② 这就是说，现有的知识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对党在革命斗争中和革命胜利后各项任务的“有用”之材，才能成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将格格不入，一事无成。

在统一战线内部，或者说在人民内部，在作为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选》第四卷，1375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三卷，1031页。

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处于团结的边缘。毛泽东对于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如蒋介石，是认为看他的过去便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的；他对曾经是敌人和对手而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的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二

毛泽东确实是如有人所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领导者。到1952年中，他就把确认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课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这一年6月6日在一个批语中说：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从此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尽管在几年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并未因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①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毛选》第五卷，65页。

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①如果说路线分歧的话，那末从1956年“八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一个植根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提法的路线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而在1952年，这样的路线分歧还不存在，产生这一路线分歧的前提还不存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还没有基本完成，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②而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③。

1953年6月至8月，毛泽东以批示形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④，把这个不同革命阶段的“暗转”公布出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大群众了解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了；而这一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对于当时没有读到过七届二中全会文件^⑤的许多人是大出意外的。由于以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有一个搞“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一些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样三句话，被批评为不愿遵照甚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③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5卷，475页。

④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⑤ 主要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选》第四卷，1362页。这一著作收入《毛选》第四卷，是1960年第四卷出版才公开的。

至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① 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里面,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耽于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错位。现实将纠正这一错位。他们终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意识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阶段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最初说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订正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②。“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从1953年算起十年到十五年后,正是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切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自然理应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总之,这就是横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关”。

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开宣布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报刊广播的宣传和公开发表的文件一般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为1953年8月;毛泽东接着就在全中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③,意图借此“典型”,在全国开展有关总路线的“辩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同毛泽东不久以后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反右派斗争中一系列的文章,影响了名为思想辩论实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风,影响了政治风气,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政治准备。

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的

^①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②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③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90页,107页。

领导权,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国,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还存在领导权问题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回答道:

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①

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经常担心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在一切方面巩固树立起来,加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的论断的影响,在中共决策层也形成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的共识,毛泽东以特有的敏感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或者说搜索敌情。

毛泽东作为宏韬远略的军事家,时时记住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基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性考虑,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时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②。

这时,首先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汉年的案件以外,无疑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1955年5

^①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115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153页。

月写道：“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①这与十一年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思想是一贯的^②。反胡风斗争的规模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当时确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自1955年7月1日展开的新的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③，“在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④。

与此同时，围绕着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正进行着遍及党内党外上自领导下至群众的一场辩论。有些地方还发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泽东形容“1955年上半年是那樣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⑤而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已经以胜利的姿态总结说：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选》第五卷，163页。

② 在1963—1965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为“四清”运动），就是从基层政权有大约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出发的。

③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列举的成绩中有：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已经定案的有八万一千多名，其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同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④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200页。

⑤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33页。

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①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来了1956年。在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印证了毛泽东“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论断^②和从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对群众运动的信念。这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声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一夜完成,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一个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1月30日的发表;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将要到来。全国仿佛都在一片热浪滚滚之中。

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同年4月,毛泽东先后同米高扬、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③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讲话,对此讲得更加明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

^①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199页。其中“反唯心论的斗争”,指“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29页。

^③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出版社,1963年9月。

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①

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②

这个成绩为主、缺点错误次之的二分法，不仅指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估计，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低估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③联系到毛泽东曾经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就可以知道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时常在对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上相邻的。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发表了《论十大关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7页。

^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明确宣布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地位；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没有丢，“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①。特别是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关注和分析国内各样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许多思想、舆论和基层少数人闹事的动态，都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挑战这一背景上来认识了。他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我们现已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毛泽东在那前后的讲话或文章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从七十年代初他同爱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说“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恐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个人崇拜——后来又改译为个人迷信，加以区别——问题的提出，还是那个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2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①

毛泽东批评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指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②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解决，并且不是在1957年而是早在1945年以前，在中央领导的解放区已经解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③

毛泽东借用“大民主”这个词，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大民主”相区别，前者泛指过去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包括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在内。“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至于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这话是在1956年11月15日说的，不是已经为半年后的反右派斗争勾勒出了蓝图的轮廓吗？

毛泽东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个纲，眼睛紧紧盯住了“扩大”了的资产阶级的动向。本来，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④ 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资产阶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4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③ 《毛选》第三卷，1019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4页。

级,地主、富农、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他说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说到电影《武训传》中的一枝大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① 这话是1957年1月27日说的,前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整整一个月。

毛泽东这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到定息问题时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夺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一年以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② 一年之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③

仍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讲到“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8页。

②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158—189页。

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3页,351页。

有地主阶级。”虽然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但国内“许多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总是令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① 因此,“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②

毛泽东在1月27日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就是后来施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后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都对当时讲话作了“整理”或“补充”)。毛泽东这时真如他自己说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据一份大事记,后来被称为右派首领的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42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52页。

讲过话：

章伯钧在 18 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 19 日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①

手头资料不足，不知道罗隆基有两句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话，是否也是这样讲的；毛泽东一再给予批评，显然认为是要害问题，使他印象甚深：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②

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③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

① 《四个月的大事简记》，《1957 年的春天》附录。学习杂志社 1958 年 4 月出版。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9 页。

③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第五卷，484 页。

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①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夺取中间派”，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②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③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主要在知识界，就是这个缘故。

反右派斗争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分别召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期间开始酝酿，随后在6月8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整风运动是在头一年就决定要在1957年开展的：“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④这叫作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2页。

② 《毛选》第五卷，425页。

③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5页。

④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7页。

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① 因此，共产党的整风是整作风问题，后来各民主党派、整个社会的整风则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②；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③

这一全民整风自然是涉及亿万人，一直持续到 1958 至 1959 年的大跃进中。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孤立和打击对象的右派，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据有关领导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53 万人。

四

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各个阶段的任务，是以对政治形势即各个阶级的动向、态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为根据的。

且看他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④

这个“去年下半年”，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关于经济领域，人民日报 6 月 20 日社论《要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2 页。
②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50 页。
③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第五卷，457 页。
④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 页。

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由陆定一起草、刘少奇定稿的,据说此文中心是反冒进,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是公然对抗毛泽东 1955 年的几次批判,毛泽东认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有原则性错误。政治领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异议。意识形态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思想开始活跃,例如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像官僚主义等等的作品。有些评论性文章开始提倡独立思考,有摆脱教条主义的迹象。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的这一洞察,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并且实际被广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对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有些人反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自认为 1956 年下半年把阶级斗争“弛”了一下,放松了一下,接着便要抓紧了。

事情还远远不止是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估计,更推广到对“过去七年”的估计:“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1957 年 6 月 8 日)^② 怎样转为真的主动呢?“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③。

这是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是在 1957 年 4 月末到 5 月上半月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5 页。

②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2 页。

③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3 页。

才确定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长期的深思熟虑,符合毛泽东从战争时期开始就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习惯了的思路。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右派,有些过去本来就是敌人,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革命对象即敌人的;“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①

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当年的“右派言论”,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来看,那些批评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提得对的。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也说过:“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右派的特征是他们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②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悖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把敌情估计得严重到几乎要天下大乱,而按照比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左派、中间派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③其余便都是落后分子。——“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8页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427页。

③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163页。他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一些人健忘罢了。”^① 在运动中的估计,不同单位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②,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五百万人计,所公布的53万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数,正是百分之十许。终毛泽东一生,他不认为发生过“扩大化”的问题。

的确,当时有个别遭到严厉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张奚若,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这显然出于我们目前还不知情的某些考虑。

例如,张奚若继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讲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5月15日又讲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他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我们从当时人民日报摘要报道的张奚若讲四种偏差的话看来,都是一些平实之论,不知道为什么会招致毛泽东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③

也许我们只能试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着重斗争,强调斗争甚至认为“‘整’也是治病救人”^④,一斗一整,虽曰痛快,但势必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8页。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页。

③ 转引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④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9页。

把事情搞乱。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整风中所谓“鸣放”一说，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来。千百万人积极投入，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克服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使大量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得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得到解决，避免发生像在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泽东也是立足于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希望通过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三大主义”的问题，摆脱因脱离群众而可能触发“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①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整风，则本来就是为了更紧地抓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开展阶级斗争，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由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最后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人们已经看到的了。但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是不是充分汲取了呢？

鲁迅在《隔膜》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文中，曾经对历史上的思想、言论、文学之祸作过一些犀利的分析：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②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4—325页。

^②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艺术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从前艺术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艺术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①

鲁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进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状况，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以鲁迅的话来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乃至反右派斗争之前，由于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之间例如党内与党外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语词表达（包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隔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角度、深浅和先后的不同。不过，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宣布“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又来了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预演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层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努力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去弄清反右派斗争甚至它的“扩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进一步分析就非我学力所及了。

1992年12月23日

^① 《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徐铸成

“阳谋”——1957

1956年5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

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收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

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历,我就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

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们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

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建立了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

《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

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小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角四方会谈上,基本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计划,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请夏衍、姚溱、罗烈(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另外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分别地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宗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

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30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陈平守、傅雷、周煦良、孔

罗孙、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界代表

按界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有时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说，这正如电影《甘露寺》中所说的：“贾化。”

3月10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携登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院墙粉刷陈旧，一丈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座椅。我被引到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门口。听到康生一一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接着慈祥地对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主席的赞赏使我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及舒新城，其他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反正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坐在我对面。康生先说：“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地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

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问到:“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

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

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情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的前几天，陪同我的苏联外交部人员说，赫鲁晓夫可能要亲自接见你们。会谈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文革”时，这张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使我多尝了喷气式的味道。

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

我们决定5月9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四十四天，收获不少。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

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 30 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着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找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我和钦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作领导的党员至

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即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接着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44天,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

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是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不愧后来被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点。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

翻阅 1957 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 1957 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索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 月初,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他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我,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 7 月 2 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国情研究》1989 年第 1 期)

冯英子

遍插茱萸少一人 ——敬悼徐铸成先生

1991年12月26日,《新民晚报》举行复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海新闻界的老朋友都来了,旧雨新知,济济一堂。独独缺少了徐铸成先生,原来徐先生在三天以前,12月23日那一天去世了,我遍看座中,有一种“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觉,在那快乐的会场中,默然者久之。

1992年1月7日,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去了。那一天送花圈和挽联的人很多,张承宗先生送的挽联说:“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诤言真言,抬头喜见云开日”,上一联倒是徐先生一生的写照,而下一联也可能是徐先生一生的希望。回到家里,不过是三点钟光景。我痴痴地坐在书房中,回忆同徐先生相识、相处的过程,真是悲从中来,泫然、茫然了。

我认识徐先生是在40年代初期,那时徐先生在桂林《大公报》工作,我在桂林《力报》工作,因为同业关系,在一次什么会上相识了。但那时徐先生在新闻界已经很有名气,我则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雏儿,而且当时各报同业,极少往来,因此我们虽然相识,却并无很多往来,只是点点头,客气客气罢了。

1945年,我在湖南晃县办一份《中国晨报》,当时《大公报》的记者高元礼先生,在《大公报》上发一条消息,说这个报是王耀武办

的，我写了一封信给王芸生先生，说明此迅不确，徐先生代王先生回了我一封信，说“无心之过，尚乞原宥”。

上海《文汇报》被查封之后不久，原《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郑永欣先生突来找我，他说叶元先生手中有一张《国民午报》的牌子，可以同《文汇报》合作出版，想找一位既同《文汇报》观点相似而又同《文汇报》没有牵连的人去搞编辑工作，因此想到了我。我随即来了上海，同徐铸成先生碰头，他约了几个人，请我在八仙桥的锦江饭店吃饭。但后来因为吴开先的干预，《国民午报》胎死腹中，没有出成，而且听说他们已找了娄立斋先生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因此我同徐先生的合作，未能成为事实。

1948年时，我在上海民治新专兼课，经常在上海打溜，来时大都住在张稚琴先生的家中。有一天，张先生从香港回来，打电话把我找去，他说他在香港碰到了徐铸成先生，徐先生那时在香港办《文汇报》，但一则因为经济问题，二则急于要去北平，问张先生能不能投资五万元港币，把《文汇报》交给他办。张先生同我商量此事，问我应不应去接手此事。我说《文汇报》是一张进步报纸，当然应当支持他，问题是你有没有五万元港币。张先生说钱没有问题。因此我建议他接手此事，张先生要求我同他一起去，做他的副手，去负办报的实际责任，我开头不同意，后来考虑到支持一张进步报纸，而且既然是徐先生提出的要求，就同意去了。

不料我到香港的时候，徐先生已经乘轮北上，张先生则一进《文汇报》，就弄得焦头烂额，当时《文汇报》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朋友不少，而且大家觉得自己是最正统的革命者，别人都靠不住，他们说张先生做过张治中的秘书，他的五万元钱是杨虎的，甚至有人说张先生是中统特务，采取各种方法，来加以抵制。我一听张先生的讲话，当然不愿再去《文汇报》，以免增加复杂化。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文汇报》的大批人走了，邵荃麟先生来找我，要我去帮帮张先生的忙，我才同张先生一起跳进了这个是非之窠。

1950年时，徐先生来到香港，住在思豪酒家，当时也正是《文汇报》内部问题很多的时候，有人到广州去活动，要李章达先生、陈汝棠先生写信给张先生，指定什么人作什么之类，到徐先生那里去告状的人，自然更多了，我同徐先生既没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只能客气客气，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了。直到“文革”之后，徐先生同我相处很久以后，他几次公开说，他在香港看错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也几次向我说过，其实也难怪他，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之中，不一定能把问题看得清楚，重要的倒是他这种坦率的作风，这种诚恳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我后来对他敬佩的原因。

我是1953年才回到上海的，迄今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回来，就派了我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工作。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声明不去《文汇报》，我决不敢对《文汇报》有丝毫轻视之意，但在香港的那段教训，不免也有点杯弓蛇影了，那时徐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因此我也没有去找他。

1957年，徐先生被划成“右派”，当然更少来往了，直到“文革”时期，他这个“老右派”和我这个“牛鬼蛇神”，都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说也奇怪，这倒给了我们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原来徐先生那时在出版局，我在《新民晚报》，两个单位的连队，在一个“五七干校”，两个连队又靠得很近，因此可以朝夕相见，虽然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但我与徐先生仍有一些短暂的交谈。有一天，我收到陈楚从北京来信说“老二死了”，老二，是我们对范长江的昵称，因为长江说他在家排行第二，大家习惯地叫他老二。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快告诉了徐先生，长江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强者，身体也好，只有六十岁，怎么一下子忽然死了呢？徐先生也为之不安者久之。

“五七干校”的生活结束之后，我所在单位《新民晚报》已被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了《辞海》工作，这时，徐先生也分配到了《辞

海》。《辞海》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海，当时各类不易安排的知识分子，向海里一丢，由他自己去浮沉了。徐先生和我，初时都有点半靠边的状态。后来挂了一个编审的名义，徐先生和我又在同一个办公室，接触的时间多了，彼此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就增加，谈的东西也就多起来了。我们谈约我办《国民午报》的事情，谈香港《文汇报》的事情，时过境迁，对于旧时的一些问题，倒看得更加清楚了。我记得徐先生同我谈过范长江加入《大公报》的经过，谈过上海《文汇报》创办的经过。

徐先生说，范长江青年时代，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为天津《大公报》写教育方面的通讯，每月付固定稿费十五元，后来他回四川探亲时，忽然想到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进行采访，并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了胡政之，胡大为赞成，不仅写信去表示支持，并马上寄去了稿费，供沿途所用，并委以特约记者名义，范的《中国的西北角》，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范也因此正式入了《大公报》，成为报社的特派员。我后来检查过方蒙先生所写的《范长江传》，说法是与徐先生一致的。

至于上海《文汇报》，它的原始创办人却是严宝礼先生，据徐先生告诉我，严宝礼先生原先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八一三”战争以后，粮食紧张，铁路局的员工筹了一万元钱，托严先生到吴江去购粮食，不料钱筹到之后，日军却封锁了交通，采购粮食，不可能了。这时战争已经西移，上海沦为孤岛，主张抗战的报纸，停的停了，走的走了，而上海人民抗战之志不懈，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就用这一万元办了《文汇报》，而且找了一个英国人出面，以便瞒过日本人。

当时办报的人是严宝礼和储玉坤等，报纸出版之后，他们找到徐先生写社论，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文章，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也大大增加了《文汇报》的销路，为《文汇报》打下了基础。这时胡政之先生尚在上海，他读到《文汇报》的言论，认出是徐先生的笔法，于是找到徐先生，表示愿意投资同《文汇报》合作。

后来,胡政之以《大公报》没有用完的纸张,投资了《文汇报》,而徐先生也终于成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这就是上海《文汇报》创刊的经过。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徐先生一连出了好几本书,我也开始重理旧业,写一点文章,有些文章写了以后,还请徐先生看过。大概我们都是职业新闻记者的缘故吧,平常都很欣赏《正气歌》里“为太史简,为董狐笔”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几十年风霜剑戟的磨练,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不谋而合,比较一致,有一次我写一篇香港《文汇报》的文章,含蓄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也请徐先生过目,徐先生告诉我,当时他请张稚琴先生来搞《文汇报》,实际是救《文汇报》之急,后来这些发展,是出乎他想象之外的。其实那时我也想通了,历史嘛,就是这样扑朔迷离,《大公报》发表文章,大骂《大公报》,《文汇报》的人千方百计去反对《文汇报》的人,说穿了,就是我们的历史写照。冷静一点去理解,是很能明白的。

就在徐先生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回到上海之后,我去看他,那时他还住在武胜路成都路口,他告诉我说,“这次到香港去,也为你开了一条路。”原因是有人集资一千万港元,想在香港办一家日报,请他去主持,他设想自己去负责言论,要我去负责编辑部。我当然感谢徐先生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但觉得兹事体大,非向上面请示请示,听听上面的意见,恐不能随便决定。

又过了一些时候,徐先生对我说,我问过×公,×公说,你和冯某都是《文汇报》的人,倘若你们两人去香港办张报纸,置《文汇报》于何地?听话听音,当然是不赞成的了,也正在此时,我接到了徐迈先生的来信,他信中说,你们想去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但人家倘说你“真骂假帮忙”,你们将怎样回答呢?这正是又一言惊醒梦中人,使我又明白了一层道理,尽管我们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但是人心隔着肚皮,吃吃太平饭有什么不好,何必自己去找什么麻

烦呢？因此这件事也只好不了了而了，我可惜的是一次失去了和徐先生共事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这几年来，徐先生的年事越来越高，平常出门，也要由小辈陪着，然而他老而弥坚，依然笔耕不辍，在刊物上经常读到他短小而隽永的文章，去年6月，《新民晚报》为我举行了一次“笔耕六十周年座谈会”，徐先生也来了，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也讲到了在香港办报的过程。想不到这是徐先生同我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去年12月20日左右，《联合时报》召开一次社务委员会会议，徐先生没有来参加，听说他有点小小的感冒，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感冒一类的疾病，我们中国人是一向不大重视的，想不到几天之后，突然接到了徐先生的噩耗，昊天不吊，哲人其萎。真是哀哉哀哉。

徐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从采访出身，到编报、写言论，前后经历了几十个寒暑，他工作过的两家报纸，都同我有点关系，但我在的时间很短，我为《大公报》跑战地的时候，很快上海沦陷，报社内迁，失去了联系，1949年我去香港《文汇报》的时候，徐先生却已经北上了，所以徐先生同我共事，只是在《辞海》的那些年月，我觉得徐先生在新闻界所以拥有如此崇高威望的原因，一是他对我们的祖国，永远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做梦的时候，也希望着自己国家的昌明强大，在这一个目标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二是他敢于说真话，也善于说真话，几十年来，他写的文章，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书生论政，而大义凛然，在日寇的屠刀下面，不为所屈，在国民党的暴政下面，也不为所屈。一个人的说真话，当然也可能引来某些人的不满，但是在新闻界，徐先生的高大形象，都是人们的共识，“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很能刻画出徐先生的。徐先生逝世以后，超构同志写了篇《永别了，铸成同志！》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算是新闻界的共同声音了，我相信，徐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国家民族

的赤子之心，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将永存于天地之间，与日月光辉，同其不朽！

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厅堂还是这个厅堂，在济济的来宾之中，徐先生却不在了，“遍插茱萸少一人”，悲不可抑，书此为悼，以飨徐先生在天之灵。

附注：徐先生逝世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千字悼文，把寄《新民晚报》，副刊编辑阅后面有难色。说把徐先生要到香港去办报之事写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对徐先生的评价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评价，是用自己的历史写的，为龙为虫，别人是无法更改的，一个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奔走呼号，奋斗不息，想以有生之年，去办一份报纸，联系人民。报效国家，事虽不成，未妨其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如果有人要用罗织学，写大批判，这就又当别论了。而且，我和徐先生之间，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表白的，因而把稿子要了回来，改写此文。

1992年于上海

刘乃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与“社会主义高潮”同时，50年代中期也涌现了思想解放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出以后，引出一片要求民主的呼声，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变化，接着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事件，谁都不知道这些事和中国的百花齐放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估计总不是完全偶然的。

双百方针宣布不久，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提出脑力劳动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指出，解放前的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有的学非所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我真像天降福音！我听了以后不禁充满感激之情。我听说像我这样不能发挥专长的解放前的大学生大有人在，这是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形势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进展，国家有能力也有必要腾出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的长期压抑的愿望和理想重新升起，我想，七年以前我之所以决定留在祖国是出于为祖国服务的热忱，现在这种热忱要得以施展了，

我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记忆犹新,但是现在想到,那是因为国家初建,一切尚未巩固,对于我这样一个背景不明的人过多地警惕些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能为国效力于愿已足,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化冰总是比冻冰快。总理的讲话刚刚公布,各大城市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叫做“招聘委员会”,负责接待要求解决归口问题的知识分子。北京的招聘委员会设在中山公园内。我的工作问题早就是全家的一个思想包袱,因此周总理讲话公布以后,父亲很快行动起来,找出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其它证件去到招聘委员会,事后父亲写信到涑水告诉我,接待的人很热情,那办公室外挤满了要求解决问题的人们。我的事做了登记,留下证件,告诉父亲回家等待通知。

我并没有等很久,招聘委员会还没有任何答复,我却收到新华通讯社的通知,叫我到新华社干部处去应试,准备做翻译工作。这是因为老朋友老江推荐了我。他是继两年前推荐我失败以后再次为我努力,为此我对他十分感谢。我不敢耽搁,立刻回北京到新华社干部处。接待我的仍旧是那个老刘。他像两年前一样地再次考试了我的英语,再次表示满意,也再次告诉我回去等候通知。我回到涑水以后不久,就接到新华社的调动通知,叫我立刻报到上班。仅仅两年的时间,形势变化多么大!两年前像魔鬼一样跟着我的“档案问题”如今竟好像神秘地消失了。我的新单位两年前被我的档案吓跑,今天却对此毫不介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然而这个谜不是我能解得开的,更重要的是我得到工作了,问题解决了,也就不甚希望追究这个谜底了。

这时我要和涑水的同事们告别了。两年来的经历是特殊的,有益的,也是值得回味的。当初来时不仅不情愿,简直认为是屈辱。两年多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使我对这个偏僻地区的人们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城市里人们之间的感情很不

一样,现在要离开了,而且看来再见的机会不多了,我心里觉得真是有些难过。然而我的同事们却处之泰然。我临行前科长召集全科座谈会为我送行,大家说些惜别的话。刘国说:“我早就知道老刘呆不长。他的水平太高,在这里不合适。浅水养不住大鱼。”我看出别人都有同感,刘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农村朋友们的可爱。

二

我于1957年4月被调到新华通讯社。当时我33岁。1957年,解放后第八个年头,我终于得到了发挥我的特长的的工作。这是我从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实现的梦想,然而八年来却被无情地关在机会的大门外。在我已经万念俱灰之际,却意外地沐浴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台历上写下一句话:“1957年,我重新开始真正生活的一年!”称得上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这一年非但没有给我带来幸运,而且是我与我的祖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至今只要听到或看到1957这个数字,我的心都要颤抖。

我被分配在翻译部英文组工作,每天和几十名翻译人员一起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成中文,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用。这些通讯社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我做过用英文写稿的新闻记者,对于英文电稿很熟悉,做这种翻译工作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不久翻译部的人们就知道我英文水平比较高。实际上我是能够做比这难得多的工作的,例如英文改稿员。到很久以后我方得知,领导层在怎样使用我的问题上是有过争议的,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姓董,是很有水平而且正直的人,当时在翻译部担任较高的职务。他见我英文很好,在翻译部不能发挥作用,曾建议

把我调到国际部或对外部去改英文稿。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理由是我“历史不清楚”、“政治上不可靠”。说实在的,我只认为汉译英、英译汉之间,或翻译和改稿之间只能是难度和业务水平不同,并没有政治上可靠与否的不同。我逐渐发觉,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就只能做他不擅长的工作,或者做能力不及他人所做的工作。我自己八年来的经历和“招聘委员会”门外成群的要求换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使用人才的荒谬的原则为害之广。

然而我在这么多年企盼、请求、失败之后,终于做上了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已经是不胜欣喜,至于还应当怎样调整才真完全合理,暂时还无暇顾及,再说,即便领导层中有人极为通情达理,想要对我的分配加以调整,他也没有这样的时间。不久全国就被一场风暴卷得是非颠倒,天翻地覆,什么合理化的事也做不成了。不要说工作的调动,连增加一点工资都没有来得及。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组内平均工资的一半,发工资时大家发现了都为我不平。记得刘组长(一个正直的人)对我说过,领导已经决定为我调整,要我安心等待。孰料没有过多久,连刘组长本人也被迫对我进行违心的批判,调工资只能算是天方夜谭了。而为我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仗义执言的董君,自己也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了职,更谈不上为我张罗什么了。

三

随着双百方针的公布,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整的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惯例,运动开始由社长在大礼堂向全社人员作动员报告。他强调这次运动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一切政治运动都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要求大家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

随之就是上午办公、下午停工搞运动,方式是在办公室开座谈

会。我在英文三组，全组十余人，有三分之一是女同志。整风座谈会开始阶段很不热烈。每天下午上班后，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刘组长说：“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顿工作作风，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大家提吧。”担任记录的女同志早就把纸笔准备好。组长又问了一句：“哪位同志有意见？提吧。”还是没有人说话。静了好久，有人说，最近伙食价钱贵质量差，有贪污的嫌疑。接着又是冷场。很久以后，第二个打破沉寂的人对夜班的安排不够合理提了几句，然后又冷场。大家耐心等到下班铃响，才起身离开办公室。分手时相视一笑，意思是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然而领导上不允许这样拖下去。社长动员以后，接着各部的主任动员，然后由部的总支书记找每个人个别谈话，从党团员开始。会上有人批评社里的高级干部，于是大家的热情上升了。例如有一位部主任被指责挪用公款供夫人出国，这引出一串所谓“夫人问题”。批评的对象地位愈来愈高，直到有人提出社长渎职和失职的问题。“形势开始变了，发言的人多起来了，运动初步展开了，”这种阶段领导上常常这样说。

四

组里只有我一个人迄今没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原因首先是我刚刚调来，人生地疏，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何况新华社调我来，使我得以用上了自己的专长，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意见，其次，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共产党有什么错处，以及怎样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整风会开过两周，组内同事都发言好几次了，唯独我一句话没有说过。

一次散会以后组长问我：“你为什么不发言？”我说了上面的原因。

他说：“发言不必限于社内的问题。只要和整风的目的—致，不论什么问题，也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提。比方说，你的英文这么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使用，这就是问题，它说明党的工作作风上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番话提醒了我，我想起过去八年来不合理的遭遇，想起了自己长期的失望和压抑。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在用人方面的不当。问题可能牵涉到人事制度本身，以致于造成人事部门处理问题任意而行，不顾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这可以算是官僚主义吧！

次日，1957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作了第一次发言，我回顾了我在美国通讯社工作的经历，我的报效祖国的愿望，我效力的请求如何遭到无情的拒绝，我怎样盲目地自己找工作而遭到愚弄，后来又在农村做了两年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最后我说：“感谢新华社把我调来，我才在八年来第一次使用了自己的专长。我感到很幸福。”这时我激动起来：“这点幸福是多少年不公平的对待以后才来到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吐吐苦水。”

我发言时听到同事们不时发出惊愕和不平的声音，我接着发言，说出了久已埋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的话。“我作过两年美国记者，这不假，”我说：“但是我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写过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没有作过于解放战争不利的报道。不应该在档案里加上对我怀疑和歧视的东西。”我还追述在1951年我在镇反运动中，把自己作记者所发的全部电稿的存底和刊登我的稿子的剪报统统上交给坦克学校领导，以便帮助组织了解我的全部活动。“那些材料是英文的，”我说：“但是领导可以组织力量把它们译出来，这应该不困难。假如领导上认真审查了这些材料，对我的怀疑就可以解决。我很怀疑这些东西组织上研究没有。而这是不公正的。”

一位同事说：“这是不公正的。”另一位说：“老刘真倒楣。”“我个人的经历，但如果反映我们政府的人事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个重

要问题,因为那样受影响的不止我一人了。”我说:“因此我建议以后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允许人们自己找工作。”

我是组内第一个人在发言后引起听众的一致赞许,甚至一片掌声。我讲完以后,好几位同事走过来和我握手,表示同情我过去的遭遇同时祝贺我调到新华社。这时一位女同事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的关于允许自己找工作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次日上午,部党总支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对我说:“我看,你们组的座谈会记录,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过去对你的使用是我们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我理解他说的“我们”指共产党而言。“你谈出党的错误是对的,这表明你爱共产党。我们希望你继续这样做。”我表示感谢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党的书记如此友好而且诚恳地对待我,甚至承认我爱共产党。然而对我的礼遇这刚刚是开始。”

过了几天吴社长找我和几位地位相似的到他的办公室面谈。从动员报告以后,社长不断分批接见各部门的人,了解大家鸣放的情况并继续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走进四楼一间宽敞的社长办公室,吴社长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工作部门,然后对我们说,大家必须进一步了解这次运动的意义。他说:“党要求所有的人帮助党改进工作,邀请大家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一切真心爱护共产党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党才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加强大。共产党没有私心,不害怕批评,善意的批评。任何别的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社长下面的话我至今不忘,因为这些话不仅在措辞上而且在内容上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这次运动对党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考验。党从批评中获益,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伟大。每一个人对党的态度也将受到考验。如果你真正爱护党,真地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你就会毫无保留地发言。发言愈直率,对党的缺点批评愈尖锐,就愈能表明忠于党。”

吴社长强调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即死抱住个人主义立场，还是转到无产阶级的，党的立场的问题。无产阶级无所畏惧，所以敢于直言不讳。个人主义者害怕失去个人利益，所以不敢完全坦率。因此这次运动是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一次考验。”

社长的谈话就是这些。他的话使我沉思：我害怕什么吗？我自认为没有。共产党看来是在诚恳地征求意见。社长关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话特别打动了，使我想起自己在革命大学的启蒙教育要求“改变感情”，我觉得自己又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又必须从头学起了。一个执政党竟然邀请人们对自己进行批评，这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祖国是伟大的，这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人应该跟上时代的要求，包括我在内！

我初到新华社，确实对这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但过去几年我亲眼目睹不少情况，感到实在是有些问题。我的不幸的遭遇表明存在不正常的现象，应该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如果真地爱国，就应该直率地告诉自己的政府哪里存在问题，使它得到改进，使祖国更加富强！

我是新华社全体人员中动起来最晚的人。现在运动开展将近一个月，整个新华社大院要求整顿，热火朝天。整风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愈来愈尖锐，有人把意见写下来贴在走廊的报框里，让自己办公室以外的人都能看见，这叫做小字报。过了不久院里出现了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如浪潮一样席卷全社，所有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后来只好把新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这时全国响遍要求改革、要求扩大言论自由和开放管理体制的呼声。最活跃的是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界和党外人士。报纸大量刊载鸣放意见，内容愈来愈尖锐，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内容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文章热烈赞扬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言

外之意是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思想和言论的严格控制。这篇文章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认为作者表达了先进思潮,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启蒙。文章对我的震动超过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所有鸣放文章,作者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比我的更全面,深刻得多。当时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通栏标题。这表明文章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至少是默许。

这就是1957年5月中旬到下旬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点燃了我久已黯淡的爱国热情。我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而且发表小字报评论社会和政治。我要对党敞开心扉,告诉党我认为应该怎样做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和党这样亲近,我就像对亲人一样,像对母亲一样细诉心曲。然而正当我陶醉在这彻底交心的妙境时,竟然风云突变,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子,多少热情的面孔变得陌生了,认不出来了,我自认为是诚恳地向党进言被指为对党的反革命的恶意攻击,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并且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我受处分以后,一开始很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有的人想得比我多但是一句也不说,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倒楣的主要根源在于我的出身历史,而不完全在于说了什么。换言之,即使整风时期我一言不发,恐怕也难逃挨整的噩运。古语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五

我于1957年5月下旬发表我的唯一的一张小字报,贴在翻译部的甬道的墙上。这篇文章不仅得到我的同室的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连其它部门如参编组、选报组的人都纷纷到办公室来看我,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然,后来风云突变以后,

对它的评价就面目全非了。

这篇小字报原文如下。

从“冷漠”谈起

参加革命以来曾经历数次工作调动。每在一个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人熟了，觉得那是我的家，调走时舍不得分手，觉得牵肠挂肚的。“以后常写信啊！”这是临别时照例的互相嘱托。我是认真写信的，可惜没有回信，渐渐地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熟悉了新事物，认识了新朋友，旧同事便互相淡忘了。后来又调到别处，又是临别的互相嘱托，接着又是互相淡忘。大家变得不甚关心人，只关心工作了。

近来的变化还不止此。人们为了不犯错误，变得愈来愈谨慎。谨慎当然是好事，但过分的谨慎就产生副作用。我有一个朋友，称得起是不犯错误的典范：他不冒失，不发脾气，不走错步子，不站错立场。他的优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他也有缺点：他不激动，不发怒，不热情，对恶人不义愤，对弱者不怜悯。看啊，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消极的，都冠上一个“不”字，可怕的“不”字！

记得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有两种演讲者，一种讲得辞藻华丽优美，听众听过之后都说：“嘿，讲得多好啊！”但他走开以后谁也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另一种演讲者则不同；他讲的时候听众有的热烈鼓掌。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吹呼，有的怒骂，有的沉默，有的痛哭。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演讲者是后一种，不是前一种。

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后一种演讲者愈来愈少，而前一种却源源而来。我们慢慢变得不会犯错误，也慢慢变得不会爱，不会恨，也不会想了。

中国人民的祖先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这笔改造世界的精神财富。

然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上述我的朋友的同时人物，他们的情感淡薄，冷漠无情。这是一种传染性的冷漠。我们的祖先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后代；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弟子。

历次政治运动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政治运动多了，就一点点地冲淡了我们的热情，磨光了我们的棱角，浇灭了我们的火焰。旧时北京的纨绔子弟喜欢养蝈蝈、冬天养在特别的葫芦里。这种葫芦小时就装在专门雕刻的模子里，模子刻成什么样子葫芦就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在模子里生长的蝈蝈葫芦；可怜他们根本就没有棱角，也就谈不到磨不磨了。

我想起鲁迅的话：“救救孩子！……”

六

上面讲过，领导上肯定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鼓励我继续提意见，提得愈多，愈尖锐愈好。于是在以后的整风座谈会上我继续给党提意见，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的问题。我想到就说，并没有书面记录。感谢作记录的女同志和后来批判我的人，他们把我在一周左右的发言加以记录整理，以供批判之用，这对我回忆自己40年前说的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不被划成右派，是记不了这样清楚的。总起说来，我在整风期间鸣放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中国应该给人以更大的说话的自由，应该有更多的民主。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为主张节育而获罪是不应该的。中国解放前有4.5亿人，解放八年增加到现在的6.5亿，照这样下去不得了。马寅初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应该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

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乱押人、打人、捕人的现象不少,这是侵犯公民权。

第三,解放后许多文化科技机构的领导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会打游击战的指挥员不一定能领导一个科研机构。建议这些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由外行变为内行。实在不称职的予以撤换。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不懂政治。只是对国家很关心,才能讲出这些话。我从小关心国家的安危祸福,这是国家多难的结果。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总是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比愤怒,那时人民是绝不可能向政府提意见的,更不用说是批评。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是因为深信党和政府会采纳这些建议,或至少能够予以考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此而招来大祸,为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把一生三分之一的岁月消耗在劳动农场里。

七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晴天霹雳一样改变了风向。社论说民革成员卢郁文因为说了维护共产党的话,收到一封匿名信,骂他“为虎作伥”,警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人民是饶不过他的。社论说:“这封信的确是对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又说,“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并没有动员报告，6·8社论发表以后，社领导并没有公开表态，于是我和同事们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仍旧沉浸在鸣放的美梦里。大家对6·8社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文章感到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和一个多月以前动员整风时宽容大度的姿态相距甚远。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党不要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这封信由十个人签名，我也在内。四十年后回忆这件事，我不禁为我那时的幼稚感到可笑。然而这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幼稚的事，而且幼稚的人不是我一个；其他九个签名者也未必比我懂事。还有组内所有的人，无不热烈支持我们写这封信，应该都有幼稚病。信发出以后当然没有回音，然而我们并没有白白费事。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我参加的这封信被说成是反党的罪行之一，给我的批判者提供了材料。

不久院子里出现了大字报，点了一些人的名，说他们向党进攻。这些人有的我认识，如参编组的陈，我读过他的小字报，觉得他写得很好。如果我的消息灵通一些，我应该知道这首批大字报都是党支部写的。然而消息不灵通的还大有人在，就在大字报贴出以后，整风座谈会还继续进行了几天，然后才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这时我竟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批判陈，我说他的小字报写得很好，这是个直言的同志，不应当受到伤害。可见我幼稚到了怎样可笑的地步。

八

到1957年6月中旬，鸣放完全停止，整风运动改为反右派斗争。报纸上再也不刊载鸣放言论，而代之以连篇累牍的反击右派的文章。新华社大院里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完全相同。鸣放座谈会不开了，换成了反击右派的座谈会。批判会的规模依右派分子罪

行的程度而异：一般罪行的右派在全体干部会上批判，特别严重的则在礼堂开全社大会批判。批判的对象提前一两天得到通知，与此同时组织指定几名党团员准备发言。被批判的错误言论事先从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摘出整理，发给批判者。非党群众也一律参加批判会。

整风时，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提的意见愈尖锐愈好”，因此，这时要在记录里找出应该批判的东西并不困难。记录员记的都是对党的批评，所以很容易找到“反党言论”。例如参编组的陈写了小字报，主张扩大新闻自由；批判时就说他要求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又如全社大会批判的邹，过去是一家大报的负责人，他说肃反运动使一部分人得以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批判者说他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陈和邹的出身历史都有问题：陈是台湾某政要的外甥，而邹过去为天主教的报纸服务；这些都注定他们的言论要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然而言论也是重要的。我在自己受批判以前参加过不少次批判右派的会，从那些批判发言里可以看出，提意见绝不能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异议；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是要倒霉的。然而事情有时并不完全这样：我提的几条意见没有一条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扪心自问，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始终没有存过半点怀疑，更谈不上反对。然而批判我的人竟然从我的发言里分析出企图推翻共产党而代之以美帝和蒋介石的专政，这就使我不解了。还是郭沫若高明，他说：“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我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整，不论说什么都是有罪的。郭老的说法至少适用于我。

反右派的批判会从1957年6月开到11月。前面说过，我是11月才被“揪”出来的，那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是因为指标不够被补上的名额；批判我的时候已经是过新年以后了。总之我参加的批判会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大会开始先由被批判

的右派分子读他的检查,然后由批判者发言,也可以说是读批判稿。稿子当然写得理直气壮,而朗读的调子也无不义愤填膺。被批判者站在讲台的一边,垂着头面向观众。他的自我批评照例是不行的,因为发言者都是无限忠于党,他们痛恨向党进攻的人,尤其不能容忍对党不老实,而右派分子自我批评照例是绝对不会老实的。

我坐在听众席,觉得这一套程序对我熟悉得很,因为它是七年前我在革大受批评的程序的重复,我在目睹那一套在我面前重现,不过我现时在观众席,还不是被批判者。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即有些批判者尽管感情充沛,批判有力却免不了自己也接着变成右派。右派分子是不断被“揪”出来的,隔几天揪一批,每批数名,谁也不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历史复杂或鸣放时发言比较尖锐的人,这时对右派的批判往往特别起劲,他们抱着万一之想,希望借此得以对党表表忠心,避开厄运。可惜的是,这些人大多或早或迟也变成了右派。结果是刚刚起劲地维护了党和社会主义以后不过几天,自己也垂着头站到旁边去了。同样可惜的是,在这些倒霉的战士被批判以后,过不了太久,那些批判者也有的站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去。

就这样,我坐在礼堂的一角,名义是参加了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实际上心不在焉,对于那些义愤的发言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从来不要求发言,因为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罪恶言论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批判的东西。我不愿说违心之言,也不想扮演那种过了几天就变换位置的喜剧的角色。

我知道自己是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的。果然,1957年11月,党支部找我谈了话。

“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有百分之五。”这是毛主席为反右派斗争制定的指导原则。可以理解,这不过是个大略的估计,不是必须确切达到的数字。况且由于对已有的好人和坏人并无精确的统

计,所以百分之五这个比率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 亿人的百分之五是 3250 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这超出了开始的估计。薄一波 1993 年发表回忆录说,1957 年 6 月 29 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 4000 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 55 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 1957 年 11 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 60 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乃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实话说,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我批

判自己,再不发言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

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

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

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十

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的辩论会。”“刘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

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

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

接着有人问:“刘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刘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蝮蝎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

会继续开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一个人说,刘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1949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法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刘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言指出:“刘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

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一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刘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地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

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它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

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楣不可了。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转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20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它各部

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

“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

“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我认为共产党很好。”

“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

“我没有向党进攻。我只是帮助党整风。”

“你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

“你欺骗！？”

“我说的是实话。”

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

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不要吸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持者停顿了一下说。

我把香烟和打火机装好，离开会场走出办公楼，找到我的自行

车,飞快地奔回家,把批判者们抛在后面。会上连干部带群众有60人左右。

我知道这可闯了大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受这样的侮辱!

次日上午我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去开一个小会。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姓周的英、法文翻译,他是党员。他们没有重复前一天的那一套。只有周一个人说话,其它人都沉默。周让我坐下。

“我们今天不准备批判你,”周板着面孔说,“因为已经证明批判没有用。这是最后一次开你的会。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你说的话对你自己的前途非常重要。”

我看出,这是因为昨天的斗争会没有开成,他们现在要我最后表态,以便决定怎样处分我。周问我:

“昨天开会以后,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有没有改变?”

“没有,”我回答。

“考虑后再回答。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周说。

“谢谢,”我说,“我不必再考虑。”

“现在我们出去,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我们过三分钟回来。”周说完就带人走了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我独自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屋子里静得很,我的手表的滴嗒声都听得到。整整三分钟以后他们回来了。周叫记录员准备好,然后向我说:“你说吧!”

“我保留我的意见。请组织考验我。”我慢慢地说,这时记录员写下我说的话。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唯恐漏掉一个字。我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好吧!我们走!”周对大家说,于是都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跟着走开,心里很明白:我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十一

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必须受孤立：如果没有事，谁都不和右派分子说话，交谈也要板着面孔。有时几个人正在谈笑，走进一个右派分子时谈笑立刻停止。“人民的敌人”不能娱乐，所以礼堂放电影右派分子是被拒之门外的。办公室里的内部传达不许右派分子听；每当组长传达时我和邻桌的杜就得离开，在走廊呆十几分钟然后回去。然而人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官方要求的那样绝对一致。批判会上有的人的发言听得出极为勉强，更有人始终一言不发。我们组内的文和高两个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和我讲话，但我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后来得知，文因为批判右派无力受留团察看的处分，而高因“文革”中不肯贴大字报下放到新疆。后来他自己努力工作，任新疆大学外语系主任。

恶运笼罩着我们全家。两位哥哥的遭遇和我相同。大哥乃隆是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因整风中批评领导不懂业务被划为右派。二哥乃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福利科长，因批评党的政策而获罪成右派。他说：“党在有些问题上搞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弟兄三人几乎同时受到同样的迫害，只是我的两位哥哥的态度不像我那样暴烈。每天晚上弟兄们从单位回家以后各自讲讲当天的痛苦的经历，真好像世界到了末日。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太严重了。那年父亲67岁，患严重冠心病，靠经常服药才能维持。八年前他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二哥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安享退休的清福。八年来他目睹国家形势很好，证实了二哥的描述，心里很高兴。我们三弟兄的事对父亲真是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

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我看着父亲为我们急成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不久以后，在1957年12月下旬，父亲因心脏病猝死，医生事后诊断为心脏栓塞。

父亲去世，三弟兄一败涂地，全家从此失去了欢乐。弟兄们只能尽力安慰母亲，但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十二

这时正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新华社的职工轮流去参加义务劳动。1958年1月，春节临近时，通知我随队到十三陵去劳动。这个队由新华社各部门的人组成，有右派在内。但因是打破部门界限重新编组的，同组的人都是新朋友没有孤立右派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出发前由党委的一位干部给全队讲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右派分子，现在在等待处理。这次劳动是一次考验的机会。大家好好干，干得好可以从轻处理。”

这时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右派处理的规定，是在我受到批判以后正式颁布的。处分共分六类，最严重的是第一类，以下递减：

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第二类：监督劳动；

第三类：留用查看；

第四类：撤职；

第五类：降职减薪；

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

处理办法颁布以后，我使用以衡量自己，看我适合哪一类。结果看不出得到从轻处理的可能。党委的临行讲话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在昌平县城附近的工

地住半个月，每个人都带着铺盖和换洗衣服。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出发，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那天风和日丽，太阳照得暖洋洋的，乘车到郊外透透风，出出这些天的闷气，觉得很痛快。

忽然，靠对面车帮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笑得非常友好，这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笑容了。他看起来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告诉我他姓张，是参编组的。我听到他的东北口音才想起，他就是开我的批判会时说我不是真地想为国效力的那个人。“现在我也变成了右派，咱们是一样的人了，”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组，过去不认识，批判会时见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见面，所以他认识我。他说的不多，但态度很诚恳，友好之间带着惭愧和歉疚。其实我并不恨他，我知道我们素无芥蒂，他批判我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而已。受批判以前，我在不少场合见到过类似的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对那受他们责骂和侮辱的人究竟有多少由衷的仇恨，以及这样的表演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张的身份变了，他不必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就可以推诚相见了。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张一起劳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会干农活，比我强得多，在劳动上经常帮助我。

我们住在昌平县城外的民房里，离工地 10 里路，每天步行往返。水库工地是一片人的海洋，我从未见过这么的多人在一起。大家干着同样的一种活：向坡上运土运石，目的是筑起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我们干活处就是将来的人工湖的湖底。由于经济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程大部分依靠人力。手推车和肩挑的土篮是主要工具。人们情绪高涨，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我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这时我干得特别起劲。我推的车比别人装得多，来往飞跑，把别人抛在后面。回到住处洗脚时，发现手脚都打了泡，夜间感到腰酸背痛。但我照旧拼命劳动，毫不松劲。我经常脱掉上衣，赤膊在工地往来奔跑，引起人们的诧

异和赞许。我并不是想要通过干活换得什么好处，可怕的前途也并没有叫我紧张起来，实际上我已经把党委那位干部的话忘记了。我只是觉得很久以来闷得要死，今天走出了牢笼透一口气。我被无情的偏见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几个月——不，几年了，今天在这广袤的大自然舒展了四肢，释放了压得几乎要爆炸的能量。这里工作简单，人也简单。我要运土，力气用到了，土就变换了地方。土懂得我想干什么，我的年轻的肌肉出了力就得到了回应，诚实的劳动在这里换到的是诚实的报答，而不是欺骗和侮辱。这里的世界至少不是颠倒的。

半月以后我回到家。我晒得黧黑，饭量大得惊人，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满不在乎。母亲说我变了，和劳动之前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觉得变了。时间到了，该变了，不管怎么变，变了痛快。

十三

1958年的春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晦暗的春天。

我在单位继续被“孤立”，后来我看出，这种古怪的关系对“孤立”我的人们也是一种负担。一次我在甬道里迎面遇到两位女同事，她们向我笑着要打招呼，但忽然记起我是右派，赶紧收起笑容快步走掉。我的处境实在古怪极了。在这里我禁不住对这种古怪处境的创造者无限钦佩，钦佩他的才智，竟然想出如此奇特的办法来折磨他的同类。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局面尽快结束。如果灾难必须到来就叫它来吧，死亡的威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天上午，两个月以前告诉我“形势对我非常有利”的那个姓魏的到办公室找我。他带我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叫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对面。他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他告诉我：我在十三陵水库干得很好，为此党委考虑从轻处分我。我刚刚有点激动，桌上的

电话铃响起,魏立刻拿起耳机。

“是的,他在这里。好。”魏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党委在等你谈话,你要受表扬了。我们去吧。”于是他带我离开翻译部向干部处大楼走去,他说党委的领导在那里等我。我边走边想,我在工地的表现可能是好的,但那个打到空房间的电话值得注意:好像有人在追踪我,恐怕等待我的不是表扬。

到了干部处大楼,他把我带到二楼,指着一扇关着的门叫我进去,他自己走开了。我敲了敲那个门。

“进来!”里面的人吼道。我推门进去,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里面。一个穿便装,是新华社保卫处的干部,一个穿警察制服。

“姓名?”那警察问。我说了姓名。

“你站好!”他吼道,“你因为右派罪行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接着他递给我一张中文打印的文件叫我读。那是由新华社付社长邓签发的决定,内容是我是旧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的儿子,本人解放前做美国记者,“曾做情报工作”,“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党整风时期恶毒地向党进攻,并且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我读过之后把文件还给他,他说:“你保留着,那是给你的一份。”接着问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沉默不语。于是他说:“走吧。”这时我的后面有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几时进来的。他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进甬道尽头的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约20多人排队面壁坐在长凳上,都低垂着头,有几个女的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铺在桌子上,抓起我的左手,把五个手指都在油墨上蘸一下,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指纹按在文件上。接着抓起我的右手照样按了一遍,使用我的手指就像用手戳一样。我偷眼看那个文件,是以我名义写出打印的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我的指印都按在我的名字下面。按完手印,那警察指着桌子角上一块脏布对我说:“擦

搽手!”我照办了。但那块布已经被我前面 20 多个“自愿申请者”用得乌黑,搽过和不搽差不多。

我是来得最迟的几个人之一。在我以后又有两三个人履行了同样的法定手续,之后,我们 20 多人就全部由警察押出干部大楼,上了等在门口的大轿车。每个人必须坐下,不允许站立。车窗一律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保证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前后车门都由一名武装警察守卫。车子开动以后,车上静得像送丧,但比送丧还要压抑百倍。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表明路程不远。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门口,院墙很高,装着电网。我们下车后被带进院子一角的一座四层楼房里,进去以后,后面的铁门立刻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先被押进靠门的一间房,押送的警察命令每人交出腰带和随身携带的钢笔、小刀、别针等锋利物品。看来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其实我们并没有企图自杀,起码我是没有的,这种保安措施并无必要;然而我们却因此必须提着裤子走进牢房。

这里是半步桥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我从中年开始到老年结束的漫长的旅程的第一站。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并且我们是被别人用可怕的方式押来的。假如当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可怕的前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提前使用了进楼时被迫交出的东西。

那天是 1958 年 3 月 8 日,我 33 岁。

戴 煌

我听话成了“右派”

这说来似很荒唐、矛盾、不合逻辑，但却是历史的真实。

1956年3月的一天，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照本宣读朱总司令刚刚从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准听，不准记，也不准泄露给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会议秘书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就怕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每个人内心的狂澜。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如此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纠正？由此我想到了我们自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结果很不妙！我觉得我们对毛主席的颂扬也太过：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既能事无巨细地通晓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不仅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两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思想作风、生活道德等方面，也都堪称世人楷模。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和人民的大救星，是积人类全部智慧的最最伟大的天才。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与教导，我以为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太过的做法及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

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1956年6月,带着这样的思虑,我与同是军事记者的李耐因同志,奉命去协助上海分社搞好对苏联舰队访华的报道。在舰队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的客厅中,我们注意到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然而这是不能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同志接触,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与中国同志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些问题。因此从始到终,我们都严守了这条纪律。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在上海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前,华东局和上海市的一些首长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这会儿,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专门采访的记者们,其他人等是一律不准入内的。可是对于这样一群人,不但不予以查问,反而被恭恭敬敬地引护到9楼之上宽大楼顶平台,一览无余地欣赏欢腾壮丽的夜景。

苏联舰队去后,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盛大宴会,赴宴的都是咱中国人。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这“最后的晚餐”,但据说举行这次盛宴,是接待经费还有富余,就用来犒劳接待苏联舰队中都十分辛苦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有花完,不必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此外,我还看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特权腐败苗头。

7月下旬,我从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北故土——阜宁县沟墩镇。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

牌军 74 师，苏北敌后部队也纷纷出击，目标之一就是沟墩镇。当盘踞在这里的蒋军被歼灭后，我匆匆来到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万幸，全家老少惊而无损，见了我都泪水涟涟。从那之后的大部岁月，我都在国内外战地采访，没有再进过家门。

1957 年的这次回家，我满以为经过七八年的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已经大变样了，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国民党军队残留下来的破碉堡和零乱的铁丝网，仍然散布于桥头河边；镇内外许多乡亲的日子也过得很苦很苦。如果说：“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为什么我们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怎么亮？

深入了解，原来是当地的不少干部只热衷于捞钱捞物，吃喝玩乐，欺压群众，私设公堂；不服气的党、团员和老百姓再怎么上访上告，“上面”的人似乎都无动于衷，使得个别乡亲失望至极，只得饮恨自戕而亡。

当年 10 月，发生了“波匈事件”。为了吸取教训，我决心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把自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种种思虑和在上海、苏北等地的所见所闻，向党的最高领导层和盘尽托。

这时我已在外交学院专攻英文，学习很紧张，只能利用周末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空闲，背着当时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悄然而写，直到 1957 年 4 月，还没有写完。后来听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似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一目了然，并决定通过整风予以认真克服。于是我觉得没有再把这封长信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热切期望完全寄托于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在全国大鸣大放时，虽有许多人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没有明确宣布

党内同志如何参加鸣放时,自己应该谨言慎行。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了赫赫声威的“反右斗争”。那些在我们党的鼓励欢迎下各抒己见的人物,几乎一一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又是“为什么?”

正当自己大惑难解而更加翼翼小心的时候,北京所有高等院校党支委以上的同志,都奉命在同一天上午去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报告。由于本人也是一名支部书记,也去听了这个报告。

在广安门内白纸坊印钞厂的大礼堂讲台上,彭真音宏气足地说,这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模样,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彭真接着打着有力的手势,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那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脖子上拉屎撒尿,害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就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是需要大家帮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完善的。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

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那年头,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一位,所以有些同志在背后里都习惯地称他为“彭老八”。对于他这等热诚坦率、语重心长的讲话,谁还能不信以为真地心头热乎乎?一切茫然疑虑都立刻烟消云散。

当晚,在外交学院的一间屋子里,许多中央部门派来学习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召开了联席继续鸣放座谈会。我第一个带头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虑一吐为快。其主要观点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最最令人担心的隐患,莫过于“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控制与消除,而听任其发展蔓延,必将导致国蔽民塞,全国各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真话,对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举国上下都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等等。

不日,新华社也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开了个继续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我认为,我这都是遵照党的指示说话的,即便态度率直了些,语气重了些,也都是为党好,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彭老八”代表党中央当面作了保证的。

隔了几天才知道“彭老八”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与“保证”,不过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大阳谋”的一个招儿罢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温习外文的那个大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只不过贴了些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谈用词欠当的小字报,内部文件照看,大家照旧称我为“同志”。

可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断然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以昭心迹。没料到这又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反右”好汉们如获至宝地称做“万言书”，让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进行总攻击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播发了一条长达三千来字的新闻。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几乎悉数刊用。《人民日报》把标题改为《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上海《文汇报》的标题是：《戴煌想干什么？》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大报在其头版头条，用了火柴盒般的9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播发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右派”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写的是丁玲和“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虽然当时他才27岁，我还比他大两岁。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也摘发了新华社的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

紧接着，《解放军报》发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说这个“集团”以我与李耐因为首，成员还有韩庆祥与路云。随之，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揭发的家乡一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另外，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其中被称做“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有另一位军事记者李犁和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准备派驻国外的姚昌淦同志。

这样，我就成了新华社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内“右派”，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工资一抹到底，妻子离婚，一个孩子送人，去北大荒流放了近三载之后，又在监狱和劳改队里磨受了十四年……

“反右斗争”40年过去了。从那之后中国发生的许多导致全党全国几乎濒临崩溃的事，已为全世界所熟知。所幸的是，正如国外有报纸说的，“在毛泽东之后，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者觉醒了”。

的确，许多的中国人是真正觉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党内同志对“神化和特权”现象是早就痛恨和摒弃的了。

刘绍棠

往事不堪回首(节录)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956年3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竟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年“反右”前,小说稿酬每1000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12元,我的小说1000字18元。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4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却收入了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

老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

我虽有2万元存款,但“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到“文革”前已降到年利率3.6%,所以,利息已不能维持生活,年年都要吃一部分本金。本金年年减少,利息也就年年降低。1979年1月24日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银行存款只剩下2300元,坐吃山空已经亮了囤底。

天不灭刘,我活着熬出了头。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

1956年春,我回乡挂职体验生活,当了个乡党委副书记。挂职,也就是客串,人家并不当真,自己也不能以假乱真。官场有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不可随心所欲。所以,除了开会,我每天都溜溜达达,走村串户,整个儿是一个“无任所大使”。

那时,衙门口小,乡里的干部只有书记、副书记兼乡长、乡秘书和乡公安是国家工作人员,副乡长以下的都是农业人口但吃商品粮的社调干部。生、旦、净、丑,一人数任。大家虽有分工,却必须围着中心转。也就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只有我这个“客卿”真正是“不管部部长”。三夏大忙,我却像个二流子,于心不忍,脸上发烧,便主动要求抓供销社的筹建。

我一不要人权,二不要财权。理事会和监事会没有我的名字,主任、副主任、会计、营业员……我没有安插一个私人。那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被没收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的旧宅院里。乡党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想趁建立供销社之机,向上伸手,要一笔建房费。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中央派下的人”,又列席县委会,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尊

重,他口头上没有跟我唱反调,但是心里结下了仇。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他无中生有给我抹了不少黑,扣不少屎盆子。

我走遍全乡几十个村庄,劝说农民掏钱入股。我不会骑自行车,雇了一辆二等车(自行车带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我对农民讲,掏钱在供销社入上一股(一股一块钱),便成为供销社的东家,平时买东西享受优惠,年终还可以分红。我当时虽然只有20岁,却是这一方乡土的“知名人士”。农民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入股而以东家自居。有个10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块多钱,想买几尺花布,做一件小褂,跟我在路上相遇,听了我的劝说,竟然也把买花布的钱交给了供销社。这个女孩,就是我在后文中要提到的秀子。

供销社正式挂牌成立。主任、副主任、会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挤出的一间老房旧屋里办公。长工棚成为门市部,磨棚和碾棚充当仓库。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秀子从几里外前来给爹打二两酒,我亲自为她服务,二两酒足有半斤,还笑着对她说:“东家常来照顾。”

40年过去,供销社又归去来兮,正在恢复原状。只是我已老、弱、病、残,不能再为供销社奔走鼓呼。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

1958年3月,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

5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20年？5年的4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

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最后他声严厉色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时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春天,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有如无酒不成席,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谲,不能含糊。”耀邦同志站起身,板起面孔,“我把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屈原《离骚》。”

“会讲吗?”

我没有吭声。

“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快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我点了点头。

他送我到小客室门口,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20年后,耀邦同志主管全党全国的平反工作,我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叫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我提起20年前的往事:他跟我话别时最后那句预言。耀邦同志仰脸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

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深埋在我心底的隐痛

我仍然怀念 1957 年因遭厄运而被我“活埋”的《金色的运河》。

《金色的运河》长达 50 万字，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为主旋律，是一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但是，由于我 1955 年 10 月到 12 月曾担任团中央湖南工作组组长，搞过两个乡的合作化，又从 1956 年 4 月起回家乡担任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反面情况了解颇多；因而这部长篇小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题之外，也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有所描写和否定。这就显得比当时的同类小说大胆和贴近生活。

当时，我正鼓吹小说的主要功能是美育，又声称要使自己的小说更乡土化；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风土人情描写很多，地方特色比较鲜明。

我写《金色的运河》时，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已经到来。

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写。对于农业合作化如何评估？40 多年的经验教训，引起我们种种反思，但是还难下结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那么，邓子恢的“小脚女人”速度慢不慢呢？农业合作化有没有必要？搞一搞好还是不搞好？今后又当如何？对于我这个亲历其事的过来人，不能不想通了就盲目创作。由此可见，文学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

在我的“一口气写 12 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中，也不打算再写农业合作化。

1955 年冬季，我率领工作组进驻湖南丘陵地带的的一个村庄。夜晚在礼堂里召开群众大会，农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而来，黑夜

中像几条蜿蜒起伏的长龙。我给他们讲话(由一个懂普通话的当地干部翻译),向他们描绘前途美景如画,很快就过上人间天堂的生活。但是,3年后的1958年,彭德怀到这个地区视察,看到的却是一片破败景象,愤而为民鼓与呼。难道3年前的我是以谎言欺骗这里的农民吗?我在离开北京之前,首长给我们的训示,也是这么说和这么讲的,难道他是在欺骗我之后又指使我去欺骗农民吗?当然不是。我和派遣我的首长,都曾坚信我们的许诺必能实现。回忆这段历史,我仍然激动得心跳,又伤心得想哭。我要写,就得写出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和纠葛。

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的乡和大社,领导班子恶人当道。在1960年为平民愤而开展的“反共产风”运动中,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管制3年,乡长判处8年徒刑,副乡长判处15年徒刑,信贷社主任判处12年徒刑,大社主任被开除出党。我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一年多,耳闻目睹他们的种种劣迹,多次向上反映。我的小说《田野落霞》中写了这些人中的一个。那时我和他们曾进行过一点点斗争,失败的是我。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恶人,遭到了应得的报应,然而我已戴上右字号铁帽子……

剪不断,理还乱,是隐痛。

扣在我头上的三个屎盆子

1979年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彻底改正1957年把我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逐条批驳和否定强加在我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我至今对这个改正结论非常满意,称赞这个结论写得像悼词一样好。

但是,有三个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错划结论中并无记载,改正结论也就无法予以澄清。然而,这三个屎盆子的臭气流传甚广,对我的伤害极大,不消除影响我很窝心。

一个屎盆子是“为3万元而奋斗”，一个屎盆子是“带着馒头下乡”，一个屎盆子是“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

“为3万元而奋斗”的揭发人是从维熙。我听到的原话并非如此。这是为了把我搞臭，记者受命歪曲的。从维熙写有《走向混沌》一文，据实更正，我就不再赘述。

“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当时，我在京东的家乡挂职，这位老友在京西的山村体验生活。我俩返城休假，在我家小酌，谈起农村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却浮夸丰产，实行高征购，农民口粮不足。这些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那本《毛选》五卷中，有更详尽的记载，不是我和那位老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家乡挂职的职位，算是乡和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乡和大社机关吃饭，有酒有肉，不缺香油白面。然而，看到乡亲们吃不饱，尤其看到本族同宗的老人、小孩饥肠辘辘，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每次回城，都买15斤左右馒头，装在一个大人造革手提包里，拎回来分给大家打一打牙祭。如果是为了自己食用，完全没有必要付这个辛苦。因为我享有乡和大社领导干部的特权，吃喝不比城里差。

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从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谁想，竟然引起茅盾先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展开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做了一次长篇批判发言。书面和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着馒头下乡”，而且把带馒头的方式从拎提包改为挎篮子。如此艺术加工，颇有乡土风味。

1957年我的年资和级别，不能坐小车，那时的小车也比现在少得多。我往返城乡，要换乘几次市内公共汽车和郊区长途汽车。馒头装在篮子里，而且挎在胳膊上，多次换车岂不要被挤得七零八落？我当时就想，以茅盾先生阅历见识之深广，生活经验之丰富，怎么能说出和写出如此违背生活常识的话语呢？

茅盾先生逝世,一些人耽心我不忘旧恶,可能拒不参加向茅盾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多少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量事。这两个活动我都参加了,对这位文坛老人尽到了晚辈后学的敬礼。

回忆“每月只交一毛钱党费”的冤案,我更痛心。

揭发此事的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她是一位老革命,我出生那年她就入了党。我们亲如姐弟,两人无话不谈。我划右后,她也被内定为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恶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千方百计加罪于我,开脱自己。

50年代,按照缴纳党费的规定,中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五分钱,大学生中的党员每月交一毛钱。我在中学时期入党,后来又上大学,交过五分也交过一毛。由于50年代稿费高,我已经是个“万元户”所以我每月又交一部分稿费,到1957年累计已达两三千元。这位老大姐故意只说一面,掩盖另一面。各路报告急需此等“臭闻”,便一不跟本人核对,二不向组织部门查证,纷纷捅了出来。姚文元著文惊呼:“令人不寒而栗。”

这三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并不想逆来顺受,几次进行解释,说明真相,都被斥为“纠缠小事,趁机反扑”。于是,这些污蔑以讹传讹,更被坐实。

那位老革命大姐,最后还是被划了右,4年后身患癌症惨死。1987年,“反右”斗争30年,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记述我对她的感谢和哀思。这也是她身后唯一的一篇悼念文章,不少熟人读后感动得落泪。

呵!往事不堪回首。

抚今追昔,不堪回首往事话当年。

从维熙

蒲柳雨凄凄

——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

从风华少年到落难才子

绍棠已经离开他固守的文坛一周年了。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而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笔去写祭悼他的文字。当时,向我约稿的报纸很多,但我都婉拒了。所以如此,我觉得我的感情还需要沉淀。试想,两个已然结识了几十年并共同经历了历史上风风雨雨、晚年又产生了对生活不同认知的友人,该有多少令人沉醉、令人心酸、令人心悸的往事,它们一起涌入心扉,我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冲击波的。

1997年3月12日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妻子突然摇醒了我——她正要去上班,神色有些恍惚,像有什么心事欲言又止。经我追问,她才告诉我,刚才早上7点30分,作协陈建功打来电话:绍棠于午夜去世了。她安慰了我几句,便上班去了。我立刻披衣坐起,继而穿衣下地,抓起电话想向绍棠家里询问一些情况。但我很快又放下了电话,此时此刻,他家中一定乱成一团,都奔往宣武医院去了。

绍棠是由糖尿病而脑血栓,又由脑血栓而并发了肝脏病而离去的;而医治这些病症,宣武医院并非是最合适的选择——因而我

推断又是出于绍棠的个性固执所致。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于他的早熟;从我结识绍棠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他的自信,是与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同步增长。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文学少年时的他,像一颗灿烂的星,升起在文苑星空,在一代文学新人中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我最早看见他的文章,是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小说《九月里,高粱红》(这并非他的处女作),之后,我陆续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小说《红花》、《青枝绿叶》,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人民文学》上读到他的《摆渡口》、《大青骡子》……他将运河的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撒进当时还比较单一的文学园地——我结识绍棠,可以说不是从他笔下的人物,而是从他字里行间的水草的芳香中,走进他的艺术境界的。少年时,我在通县上过学,曾像一个赤子,在那些芦苇和蒲柳环绕的河边嬉戏而乐不思归;因而可以这么说,绍棠的作品,是唤醒我文学梦幻的第二个人(第一颗启明星是孙犁)。

在记忆中,我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见到绍棠的,我当时十九岁,而他当年只有十六岁。十六岁的他,坐在会议桌的前排,白净的脸上过早地戴上一副土黄色的眼镜,侃侃而谈地说了很多有关报纸副刊的特色问题。我腼腆地坐在后排座位上,静听着他的宏论,心里对他升起崇敬之余,深感自己的无知。能不能这么说,绍棠是一个早熟的少年才子,上帝赐与他的先天文学秉赋,使他在年少时就已然超凡,以五十年代初期而言,把“鹤立鸡群”的文学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无任何过分之处。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作者不少,都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都被时间淘汰),而绍棠则给了我天之骄子的形象——这种深刻并使我为之动情的认知,成了我和他之间友谊的基石。

绍棠非常善饮,记得头一次与他在东单拐角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不少的白酒。酒后复童真,他纵论文苑形势,对当时文学领域里的公式化、概念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绍棠认为中

国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中,只有孙犁与赵树理,各树一帜,各自成家;但是从文学感情张力而言,赵树理是无法与孙犁相提并论的。绍棠在那个年代,比我的思路宽阔多了,我当时只知道以笔为犁拼命地耕耘,没有他想得那么多。尽管我也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但他有自己的读者群体,记得我叔叔(四十年代的一位先锋派诗人),就非常偏爱赵树理的“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绍棠的少年自负。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验证了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一个有见有识的作家,而非人云亦云的文人。如果把他的这些行为,解释成他的“不知天高地厚”(反右时对他批判的常用词汇),他也是有这种资本的,他在初中时写下的《青枝绿叶》,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而他当时正在潞河读高中,语文教师不得不请他亲自讲解这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还有谁能有此殊荣?

我一直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绍棠,是新中国文苑孕生的一个不凡奇迹。他性格外向,外向到无遮拦的程度;他读的杂书极多,谈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他的记忆力更使人惊愕,现实到解放大军中的将帅们的出身历史,远古到二十四史中的人物轶事。他都能从远逝的时间经纬中召之即来。为此,我每每与他对坐闲谈,常有聆听教益之感。如果我非要从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一点他的不足,也许就是他的才赋使他有一点“非我者谁”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他有意显露,而完全出自于他的天赋本能。

始自1956年之后,有见地、有锋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涌现,结束了绍棠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枝独秀于同时代作家群的局面,可以说那是一个群雄并起、文苑百花初绽各自风姿的开端。但是绍棠的思维是敏锐的,绍棠在这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后来成为他右派罪证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几点浅见》(此文为绍棠执笔,征求我的同意后,发表时也署上了我的名字)和《暮春夜灯下随笔》。他在《浅见》一文中,态度十分明确地赞美了王蒙的小说,他认为党的机构内部,确实有了霉斑,王蒙以其怨而不怒的笔锋,准确地捕捉到

了生活的底蕴。

那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大鸣大放时期，我们的心情正处在十分舒畅的时候。《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女士，向我俩约鸣放文章。绍棠写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我写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他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该刊第五期。其实我们并没有事先相约，但是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反右派的号角就在中国大地吹响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推理，他和我是密谋于密室的。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这么白纸黑字见诸于报刊的——两个右派一唱一和，意在使资产阶级文艺在中国全面复辟。

“台风”过后天各一方

我和绍棠划右之后，他到家乡运河滩上放牛，我辗转于各个劳改驿站，从事烧砖、挖煤、种田、园艺等劳动。虽然时代的手把我们分开了，但我与绍棠在别离期间，从未中断过各种联系。因为他的家住独门独院，我家居于大杂院内，他来看我不太方便，而我回京时去看他倒是可以避人耳目。

1969年，我去了山西，往返北京的次数少了，我和绍棠开始以通信沟通彼此的问候。我怕他为此受过，让他在信上不要写名字和住址，并不要保留我的信件，绍棠生性坦荡，每次来信都是厚厚的几张纸，信皮上仍然写着他的家庭地址，只是信尾没有绍棠二字，当然，一切的话，都是正面的叙说，只有我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觅到一些他要表达的心绪。我在山西9年，每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劳改队，与家信同时发出的一定是写给绍棠的信。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火车的开车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与爱人曾彩美一同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

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得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学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1976年，山西文学界的段杏绵大姐以及胡正、李国涛等同志，把我从劳改队中要了出来；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文联主席郑怀礼，出于爱才之心，把我安置在地区文联工作。绍棠来信为我高兴，他在信中说：维熙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底层生活，文学成果将会回报你承受的苦难。你要做好文学井喷前的准备，我坚信这一天对你会提前到来。

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的第二期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烟云，但在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已走到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1957年之后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决别

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1957年被喻为的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投入到这部亮相不久之后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在他的书页中，散满了童真的诗情。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

地可以称之为绍棠全部作品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脂粉气息,只有四溢而出的泥土芳香。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半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了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自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绍棠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很忙,但我深知绍棠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至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履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绍棠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绍棠的一只手,俯在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绍棠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

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去检查病源,我就是握着绍棠的这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的。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

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好在绍棠的病，经过北医的治疗，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

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科学，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

绍棠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车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上一块木牌，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城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来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价值，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曾想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影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追悼会，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最后绝笔

手迹。

1990年，我请辞了一切职务，以静心写作。出于我的认识，我真觉得绍棠的一些表态与少年才子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所悖离。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学？人到了生命之秋，把一些行政官员的名字，写到文章中去，与文学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关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一些昔日的许多友人的窃语，我为此而感到非常难过。

大概是1996年夏天，我偶然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个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消瘦了一圈儿，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里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见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昔日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在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友，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

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糟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我和绍棠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像片交给了我，我同时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

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

**运河不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
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

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

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少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摘自3月12日《天津日报》）

朱 正

丁酉年纪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24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余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

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一点变化了。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三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四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五月一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在全社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座谈，向领导提意见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

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为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就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即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18岁，中学还没有毕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人员、敌

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庆《大公报》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议的头衔;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自己早已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了大约一年。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等。这样一年肃反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现在多

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小异。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数字,拿来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有130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130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81000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约140多万。取整数以140万为分母,错案率是94%强,每一个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这样一个

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能。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点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月8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干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

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月8日，黑板报的大字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努力工作，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飆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月5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

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

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

动,其他四人都是劳动教养。由此也可见唐被列为小集团之首,完全是因为他的民盟盟员身份。

三

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邓钧洪、苏辛涛两位副总编辑,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6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泽东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和秘书长孟××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

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9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69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1—7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232——233页）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原来，官××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派驻报社的代理人

罢了。周×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来。官××的任务就是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的要求。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一方。”

多年之后，邓钧洪在《追忆〈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文中说：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邓钧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也有一点含蓄的反映：

“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

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梦，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57 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 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还听了毛在 2 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 月 19 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

“今年 3 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的柏原，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驹、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

了一批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9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 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 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

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下”。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要挟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里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由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1950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

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然而，朱正却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译，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

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的余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象，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象。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54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8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就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12人被送劳动教养，11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

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54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晚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司务长，李长恭就去敲司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司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12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重判管制3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农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54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了，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

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20年，关了4年多才改为免于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凤翔在1969年判徒刑15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作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柳 萌

那条小胡同

自打记事时起,走过多少胡同,我实在数不清了。这些形状各异的大小胡同,它们的这样那样的名字,以及它们的这样那样的故事和传说,我更是无法讲述出来的。然而有那么一条小胡同,如同罩在我心头的一片轻云,无时无刻不在撩拨我的心绪,我想抹也永远不会抹掉。这条小胡同,叫羊管胡同,就在北京东城。

北京城的胡同多,成百上千,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这众多的胡同里,羊管胡同实在平常。它既不像东厂胡同,曾设有朝廷的情报机关,总使人感到有某种神秘;也不像铁狮子胡同,曾有达官贵人的府第,一听便觉得有某种威严。我甚至于觉得,平常的羊管胡同,几乎没有什么故事。你若打开小幅的北京地图,都很难找到羊管胡同这四个字。羊管胡同就是这般平平常常。

如果非要找出它的不平常,还是有的,那就是有一座寺庙,坐落在这条羊管胡同里。三十多年前我在羊管胡同居住时,这座寺庙的香火很旺,经常可以闻到僧众的诵经声。我同朋友们多次去过那里,后来还结识了一位老僧,这位老僧会讲英语会下象棋,他的名字我现在完全忘记了。这位老僧是半路出家,听说他原本是大学的讲师,平日钻研佛书入了迷,后来便弃教削发来此修行了。当时同我住在一个公寓里的单身汉,有几位是做翻译工作的,有的也是象棋迷,经常去找这位老僧聊天、对垒,渐渐熟了,大家便都知

道了他的身世。这座寺庙里还有位看门的僧人，也同我们很熟，这是位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听说他原来是旧军队里的营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的家。这人很和气，只要我们一去，他便热情接待。我说的这些人和事情，同样平常，没有什么新鲜，但是这些平常的人间关系，却带给了我们不少情趣，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是那么有滋有味儿。

羊管胡同对面是王大人胡同。从胡同名字上猜测，大概这里住过一位王姓的大人物，不然不会有这样的胡同名。当时国家侨委就在王大人胡同里。羊管胡同里有机关公寓，王大人胡同里有大机关，上下班时人来人往，这两条胡同交叉的街口，便很自然形成了摊贩的聚集地。每天早晨天刚刚亮，这里便很热闹了，卖菜汤、杏仁茶的，卖炸糕、油饼的，卖豆腐脑、馄饨的，总有七八种不同的吃食，热气腾腾地摆在那里。我每天吃早点大都在这里。我爱吃馄饨，出来直奔馄饨摊，边吃边观街景，有时一坐二三十分钟。有天早晨我正在吃馄饨，见王大人胡同里停下一辆轿车，随后下来一位中年人，腿脚不很利落地走到馄饨摊前要了一碗馄饨，坐在长板凳上，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起吃。大家明知这是位轿车干部，但是谁也不觉得怎么稀罕，因为北京坐轿车的干部太多了。这位中年人吃完馄饨走后，一起吃馄饨的人说起，我才知道这位就是廖承志。在我的心目中，廖承志是位了不起的革命者，他的传奇故事和多才多艺，早听人说起过，今天居然让我邂逅相遇，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久久地望着他渐渐走远的背影。这天早晨我过得极其愉快。

可是，我要坦诚地说，我对于羊管胡同的缕缕深情，绝不仅是我记忆中的这些平常小事，而是这条胡同里藏匿着我个人的故事和悲欢。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又有几位青年诗人朋友，大家经常一起聊天读读诗，就因为这个，在“反胡风运动”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审查了我一通，并使我失去了到大学读书的机会，事

隔两年,又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在“反右派运动”里被戴上帽子,送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从此我离开羊管胡同,三十几年来,再也未去过这条小胡同。近几年有时从北小街一带走过,真想去管胡同看看,重温年轻时代的梦想和生活,可是刚一抬脚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倒不是怕在思想上重新承受那有过的压抑,这些属于过去了的经历早成了我的生活经验,今天咀嚼起来只会坚定我的意志。比这一切更容易牵动我的心的,是我年轻时的一段感情上的故事,只因为政治的倒霉,这故事才有了悲凉、凄楚的结尾。这故事好像一只死抓不放的手,揪着我滴血的心,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想放声大哭一场才痛快。然而这毕竟是纯属个人的生活隐私,怎么好同别人公开呢?只好永久地深埋在心底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平顺,无论经历是复杂,还是单纯,都会在心灵上有一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领地。我的这块领地是同羊管胡同连在一起的,今天写这篇短文自然便想起了这个不可言传的故事。哦,羊管胡同,你永远是那么平平常常,平常得好像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在我的心目中,羊管胡同,你从来没有平常过,我的许多故事是在你那里发生的。更何况你还知道我青年时代的梦想和悲欢。

雨 天

生离死别,这大概是人间最痛苦的事情了。从时间上看也许是短暂的,在记忆里却会滞留很久。

我在这并不很长的生命历程里,有过无数次的同亲朋好友的告别,虽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惊心动魄,但是总有几次让人牵肠挂

肚。这其中一九五八年春天的那次告别,更是久久地揪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就会气火冲顶,愤怒得不禁咒骂当时的自己,怎么会那样老实、顺从,眼巴巴地看着人间美好情感被残忍地揉搓。

那是早春四月的一天,北京下着濛濛细雨,大街小巷都是湿漉漉的,连人们的心也罩上了水气,以至于张不开飞翔的羽翼。有人说,今年雨水来得早,是老天爷愁事太多,总是在哭。谁知道呢?反正我是无论如何笑不出来的。

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要在早晨启程,这是风天雨天都不会变的。在那个万事都难以预料的年代,唯有这少变的列车时刻,使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安定感。此刻,中央各单位、各部门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门火车站聚拢来,他们要搭车去密山、虎林一带的军垦农场,开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

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不大,可也不停。不知是匆忙中忘记了带雨具,还是沉重的心思无暇顾及,来的人里有不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若是在往常,这帮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很少雨天远行的,有些过于娇嫩的人,即使订购了车票,说不定还要退掉呢,怎么肯轻易受这份罪呢?可是现在,无论是过去的作家、教授、记者、工程师,还是过去的委员、司长、大使、书记,好像都没有了昔日的派头、威风、脾气,如同孙悟空跟随唐僧赴西天一样,不得不乖乖地听从命运的摆布。原因是他们头上都有个“右派分子”的紧箍,动不动就会被人念“老实点”的咒语。就连平日最爱发牢骚讲怪话的人,嘴上都好像贴了封条,不管心中到底是怎样想的,也不得不规规矩矩地哑然处之。这些在一九五七年夏天敢于说真话的人,现在却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留给他们的仅仅是痛苦的回忆,以及对于未来的茫然思考。

我当时是个孑身一人的小光棍,父母也不在北京,自然也就少去许多情感上的牵挂。除了像我这样当时人走家搬的光棍汉无人

送,凡在北京有沾亲带故的人,差不多都有人来送行,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他们互相的称谓看,大都是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等近亲,远一点的也不过叔舅姑娘。至于别的什么人,即使平日里关系果真不错,大概也很少有无顾虑的勇者,再说人家也犯不着,为了给发落的人送行,找顶划不清界线的帽子戴。在政治高于一切的那些年里,运动的风暴不时袭来,人们感情的泉眼干涸了,连言语都不敢交流半句,谁还肯用心同心相撞呢?能保持自己平安度日,少点政治差错,就算是幸运了。何必无事寻事,自讨苦吃。就是在这些送行的亲人之间,谁又能说些什么呢?明明清楚是蒙冤受屈,怎么好鼓励“要好好改造”呢?明明知道此去生死未卜,怎么好安慰“不要挂念”呢?凝滞的眼神,沉默的泪滴,变成了无言的话语,道出这人间复杂的感情。可能是老天爷有眼,看出了人间的不幸,特意洒下这场早来的春雨,替无辜的人们哭个痛快。雨呀,淅淅沥沥的雨,湿润了北京城,湿润了一颗颗善良无告的心。

我认识的一对小夫妻也来了。男的去年才从俄语学院毕业,分配在一个外事机构当翻译,结婚还未来得及去外地度蜜月,就遭遇了这场飞来的横祸。原因是说过“苏联专家有的也无什么本事”的话,被上纲到“破坏中苏友好关系”,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年轻的妻子是位中学教师。她紧紧地握着丈夫的双手,不住地哭泣,用来擦泪的手帕全湿透了,还在不时地擦泪,有时她用劲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紫红的齿痕深印在唇上。从她无限痛苦的神态里可以看出,心中聚集着无数难言的话,却被一道无形的可怕闸门阻挡着。丈夫也不便劝慰妻子,他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只是:“别哭啦”。妻子反而哭得更厉害。两个人的目光,有时交织在一起,都是那样的痴那样呆,倘若不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很难让人猜想他们的表情,更难以理解他们复杂的心境。

站台上响起了一阵铃声,列车就要开动。这时,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手也拉得更紧,哭得也更伤心,只是依然不便开口说话。

走的人边朝车厢走去边在回头观望送行的人,好像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似的,留恋的神情里透着无限的痛苦。送行的人不忍看一眼走的人,却又想再看一眼熟悉的身影,表露出来的矛盾神态显示出一颗正在破碎的心。人说哭是内心痛苦的最好解脱,不能哭岂不是会带来内心更大的痛苦。

列车到底还是开动了。起初只听得机器的轰鸣声,待列车渐渐远去以后,无数颗头颅和挥动的手臂,从车窗里伸出来,隐约传来更响的抽泣声。命运把一批人送到荒凉的原野。命运把一批人留在繁华的都会。无论是走的,抑或是留的,他们都要在痛苦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重逢。这便是这些人当时唯一的美好愿望。

雨,还在下着,淅淅沥沥地下着,下了一天,一年,二十年。当二十年以后天空晴朗时,我回到春光明媚的北京城,心依然是湿漉漉的,这时我不禁苦笑了一阵。二十年前的那场雨呵,该让我说些什么呢?还是不能说,只好缄口沉默。可是我依然在想,想二十年前那个雨天,想雨天中的我。

无言的等待

母亲是个爱唠叨的人,心里不搁事儿。生活里碰到高兴的或烦恼的事情,她都要说出来,很少有话闷在心里不言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在一件事情上不声不响,硬是挺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唠叨,直到这件事情有了结局,干涸的眼泉流出泪水,她内心的忧郁这才算释放出来。对于像她这样爱唠叨的人,能忍耐、克制到这个份儿上,该承受怎样的感情重负啊?其中的痛苦和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等待她被划为“右派”的儿子，从“北大荒”流放地归来，重新回到她因等待而显衰老的身边。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之后的几十年再未回去过。说是生活在大城市，其实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未逛过，终日在家中忙里忙外的操劳，唯一的爱好也是活动，就是找邻里姐妹们聊天儿。弟弟妹妹小时候上学，放学回来见家门上着锁，不必等待，不必打听，到邻里的某一家去，准能找到串门儿的母亲。

这样一位不谙人间大事的家庭妇女，当然更不会懂得什么是政治运动，因此，当我在一九五七年被划“右”以后，家里人谁也没有跟她说，何况连有点文化的我的父亲都不懂，即使跟母亲说了她又能懂什么呢？

但是，母亲对孩子的惦念，无论何时都是真诚的，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我，她总是要问询的。再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又是单身汉一条，每到星期日总要去天津看望双亲。突然有一天中断了对她的看望，那该怎么跟她说清楚呢？还好，那会儿正是干部下放的年月，母亲在街道开居民大会时，听说过这类事情，父亲就跟她说，我下放东北锻炼去了，母亲自然信以为真，不再说什么。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唯独我不在，母亲就会显得魂不守舍，做饭常常忘记放盐或放两次盐，却不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

后来见别的下放干部休假，或者人家可以请假回来，而我，竟然是一走两年不见踪影，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这时才疑惑地偶尔说一两句：“他大哥到底去哪儿啦，怎么还不回来呢？人家下放的也回来过呀？”这时全家人心里都明白，只有母亲一人不清楚，她的大儿子——我是个“右派分子”。在当时一些人的眼里，“右派”无异于中国“最坏”的人，怎么能给坏人自由呢？下放不过是个好听的名词，实际是无情的专政严厉的管制，根本没有一星半点仁慈

可言。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且我不是走一时半会，母亲更不会是一般的惦念，她只是不挂在嘴边罢了。我从“北大荒”回来以后，父亲曾经告诉我，母亲那些年丢三拉四的事情很多，纯粹是因为我的事让她太不放心了。这实在太可怜我的母亲了。在那个黑白颠倒好坏乱分的年代，连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都要遭受如此折磨，被欲加罪过以后的当事人的景况，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这些被当地人戏称“二劳改”的右派，到“北大荒”农场的第二年，正赶上全国人民大挨饿。农场只能给我们每人每天八两带壳的粮食，可是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却未减，不时有些身体不支的人死在荒野里。幸亏当时管制“二劳改”的农场领导还算开明，他们破例地允许我们可以做两件救命的事：一件是可以变卖衣物换食品充饥；一件是可以让家里寄钱或寄食品接济，让这些加罪并未判刑的人得以逃生。

我那时没有带来工资，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更没有可变卖的衣物，只好写信找父母要吃食。有些原先级别比较高的人，或者家庭经济情况好的人，那时都有大包小包从北京寄来，里边大都是奶粉、饼干、腊肠、葡萄糖一类的食品，农场每天都要派出马车运送。我盼望许多天以后，总算接到了家里寄的邮包，打开一看，只有一个筒型双层的搪瓷饭盒，里边装着满满的油沙白面，数量、质量都远远不及别人的，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免埋怨父母不理解我艰难处境。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人口又多，就是这么一点东西，还是从众人牙缝里抠出来的。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家里既无粮又缺钱，母亲边炒着面边流泪，还一个劲儿地念叨，不知我饿成啥样子了哪。这时我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到错怪了母亲，在那种情况下还同别人攀比，实在不该。现在想起来才意

识到,正是这种不值钱而又非轻易寄来的东西,更显出母亲一颗比金子珍贵的心,这远比那些有钱可买可寄的东西情意更浓。

我在“北大荒”过着无望而艰难的生活,母亲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等待着,还经常在睡梦中呼唤着我的名字。有次她睡到半夜忽然惊醒,叫我父亲快去开大门,说是我从东北回来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是她思子之心过于殷切。在过去那样把政治运动当饭吃的年月实在无理可讲。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哪怕是判刑几年十几年也好,总还会有个时间可以指望,而对于当时的“右派”根本没有时间界定,因此,不仅折磨着我们这些“罪人”的身心,而且也让我们的亲人在痛苦的等待中煎熬,这种做法比之蹲大狱更让人难以承受。我简直没有办法猜测和理解,像我母亲这样爱唠叨的人,竟然默默地忍受多年惦念盼望亲子之情,那该是有怎样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精神啊!

从60年代挨饿的日子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那时候家家吃饭都是分份儿,掉一颗米粒饭渣都要捡起来。我家那时人口比较多,弟弟妹妹们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分份儿也得让他们吃饱,母亲自然就不会按份儿吃。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拨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她自己却经常饿得无力地躺在床上。弟弟妹妹也还都懂事,他们总是不肯要母亲给的饭菜,说:“妈,您自己吃吧,您不能饿着。”这时母亲总是说:“这饿啥。你大哥呢?他不定饿成啥样子了呢?”听到这些话,谁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大家知道她在牵挂着我,都希望她说说心里的郁闷,哪怕像对别的事情那样唠唠叨叨,谁也绝对不会感到厌烦。可是她就是怎么也不说,把无尽的思念和深情的惦记,全一股脑儿地积存在她的心中。我的父亲不得不经常写信提醒我,常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免得我母亲总是牵肠挂肚。

这写信的事情,在我父亲看来,似乎并不难。其实他不知道,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强劳动的“右派”劳改农场,我哪里有时

间和精力写信,写的信又怎么能及时寄出。只要有一段时间我的信寄不到,母亲就会像丢了魂似的,常常是坐在那里自己出神。父亲怕母亲想出病来,有时就找出我的旧信,说是我新来的信,瞎编些内容给母亲读,这时她才会放心,总会有几天,高高兴兴地忙着家务。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母亲无言地等待着我。

我们这些“右派”之所以被放到“北大荒”,主要是考虑当时中苏两党两国是亲密无间的兄弟,有些“右派”就是因为对苏联有看法罹祸的,把这些人放在中苏边境自然放心。不曾想后来俩兄弟闹翻了,反目成仇,放心地区成了“反修”前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这批“右派”若是“乱说乱动”会更糟,上级便决定把我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尽管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我们这些“右派”来说,依然是个天大的喜讯,起码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想让思念的母亲有个意外的高兴,两年多来头次发了个电报,告诉家里,不日即可离开“北大荒”去天津。在从农场总场所在地发完电报回来的路上,我还想像着,接到我的电报母亲会怎样高兴,说不定很快会告诉邻里姐妹,更会千方百计给我准备些吃食,总之,她一定会用她全部的慈爱迎接流放归来的儿子。

后来听父亲说才知道,跟我想像的恰好相反,我这一纸突来的电报,差点儿让无备的母亲丧命。

送电报的时间是一天傍晚,父亲还未下班,弟弟们还未放学,只有母亲一人在家。母亲像往常一样,做熟了晚饭,乘等待他们的时候,自己收拾她心爱的小院。这时送电报的摩托车的啾啾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到我家门口熄火停下,送报人连喊几声“一号电报”,门牌一号的我家无人应声。送报人推开大门一看,见我母亲独自一人倚在墙边儿,脸色煞白,动也不动,送报人急忙走过去,一边呼喊“大娘”,一边又推又拉,最后找来一杯冷水喷在脸上,母亲才渐渐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幸亏遇到了这位好心的送报人,倘若

没有他的及时抢救,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岂不是成了受人责骂的千古孽子。

母亲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她一听到送电报的喊声,不知怎么一下子联想到是不是我出事了,不然不会拍电报来,她的两条腿立刻不听使唤了,心里也发慌了,不由自主地倚在了墙边儿。她还说,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我。自个儿老不向好处想,又不便跟谁说,许多话全都闷在心里头了。我的事实在难为我可怜的母亲了,连她的儿子本想给她的意外欢喜,她都没有福气承受,可见我的流放带给了她怎样的痛苦。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以后无论有什么急事,我都不曾给家里拍电报,怕让母亲再担惊受怕,更不想引起她对往日痛苦的回忆。

母亲用她无言的等待,终于盼来了她的儿子;母亲又同样用无言的忍耐,不久又送走了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名义上是摘了“右派”帽子,实际上并未结束劳动改造,很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草原。这样,母亲又等待了许多年,她还是没有任何再唠叨什么,不过她心里是有数的。在经历了那个人妖颠倒的“文革”以后,她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她曾说:“这回我明白了,好人为什么会挨整。”从此她更心安理得地等待儿子归来,只是仍然不多说话……

林 希

“少写”六记(上)

题说·代管记趣·猪场记情·相亲记憾

题 说

清人沈三白，著有《浮生六记》一书，自述一生乐事，其思致之清雅，文笔之隽妙，令人读来爱不释手；今人有扬绛女士者，著有《干校六记》一书，其文笔之清秀，情愫之幽远，更是令人读后三月而不知肉味。不才如老朽，年在花甲，一事无成，又忽发奇想，以笨拙之笔，无华之文字，也想能写出一篇《六记》之类的文章来，也算是东施效颦，遂了我狗尾续貂的心愿。如是，每日苦思冥想，历时三载，勉为其难，最后才写出了这一些破烂章节，说来也真是让人感到自愧弗如了。

其实以吾人之经历，莫说是只写六记，就是写六十记、六百记，那也是完全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只是大凡本人亲历之事，皆在“不要多写”劝告范围之内，故几次也想捉笔，但一想到保持一致，便立即又文思枯竭了。只是近来忽觉老之将至，再不将种种亲历事件一一记下，只怕日后，那就要连一记也记不下来了；鼓足勇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是，就有了《“少写”六记》的这篇无趣文章了。

身为作家，谁也是愿意写提倡多写的好文章的，只是遗憾，不

是老朽不愿意写提倡多写的文章，只是老朽大凡提倡多写的事，都几乎很少有过参加的机会。老朽生于1935年，轮到老朽知事的时候，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年代早已结束了。18岁参加工作，也算是赶上过50年代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但只可惜这时间太短，还没轮到我走进火热的年代，那火热的年代就开始以那比火还热的烈焰烧灸我了；待到火势稍弱之后，我就被送到如今被劝告不要多写的地方去了。如是，我就除了不要多写的地方之外，提倡多写的地方我连见也没有见过，直到1980年平反之后，我才有机会遍访祖国大好河山，也才有机会和工农兵坐在了一条板凳之上，以体会种种光荣享受。

但我终究还知自重，大凡不要多写的地方，我一定不会多写，只写六则，也就是一点芝麻盐儿罢了，再不写就有悖于“不要多写”的劝告了。五则、六则都不写，那不就成了不许去写了吗？而谁人又说过“不许写”的呢？可以查一查么，真是无稽之谈。

如是，我就要开始写我的《“少写”六记》了，当然也是以不伤害他人为要紧，尽管人家当年伤害过咱，那是因为要紧跟么，何况人家至今还表示决不忏悔，老朽就更更要顾全人家的面子了。

代管记趣

说起来那时候人们是傻，只要领导说句话，那就连一声“为什么？”也不问，便老老实实地遵照执行了。1955年把我定为“胡风分子”，根本就沒给我看任何结论文件，作家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在一天晚上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准备准备到下边去吧。”这样，我就知道我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而且对于秘书长所说的那个“下边儿”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于是连夜我就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跟着来人到“下边儿”去了。这若是在现在，或者是换了王朔呀什么的，他一定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位秘书长，“凭什么让我到

‘下边儿’去？”再不行，他把他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说出来给这位秘书长听一听，说不定，这位秘书长也就不那么厉害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问，就这样“低头认罪”了，那时候也不懂上诉呀什么的，也不懂找个地方去讨个说法，就这样傻兮兮地由着人家说什么，咱就认下什么，也就这样由着人家把咱送到什么地方去，咱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先把我送去的地方是一家工厂，接待我的是人事科的一位科长，这位科长倒不太凶，因为那时候他还闹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上边说，有一个人要送到你们这里来，他也就坚决执行了。见到我之后，他就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把我好一番审视，大概是要看一看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放在工厂里可靠不可靠。看了好半天，也许他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譬如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吧，于是就开始和我说话了：“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什么只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应该到另外的地方去呀！”当时我没有去想这另外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直到第二年，1957年，我又被定为是右派分子时，我才知道了我到底应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才合适。

说到1957年的被定为是右派，那也是一种绝对服从上级决定的表现。其实我什么会议也没参加过，更没有向党提过什么意见之类，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和我毫不相干，但到最后，我还是被划到右派里面去了。当工厂的那位人事科长后来找我谈话的时候，他也是对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我也没有问给我定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便也就承认下来了。那时我只是想既然我前面有问题，如今到了最后再说我有问题，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定下来就定下来吧，不全是领导的决定吗？不相信领导，岂不更要错上加错了吗？

这次，我就真到了我应该去的地方了。

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

因为我的问题定案得最早，所以把我送到农场来的时候，农场里还没有像我这样的“学员”。这里，没有进过农场的人就不知道了，农场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政府”，如今听起来好笑，但那时候听着极自然；另一种人就是“学员”，大家以同学相称，绝对不许相互叫同志。学员对“政府”也不许叫同志，也不许叫领导，开会时农场领导讲话时，学员们要说是“政府”讲话，而且对于“政府”的话，那是只能服从，而不许违抗的。

我是在1958年的春天被送到农场来的，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车子停在农场外面，进农场的一段路全是泥泞，只走了几步，两只鞋子就陷在泥里了，要用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不到一里地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钟头，到了看见农场房屋的时候，我早就累得一步也不走动了。

在农场场长的办公室门外，我从鞋底上踩掉了两团儿大泥巴，一下子一双腿轻松下来了，就像是能飞了一样。不懂规矩，我竟然向里面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等了好久，里面没有人应声，我又敲了敲门，好像是里面有人说话，只是没有人答理我，我又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还是没有人应声。

大约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我的全身都已经被雨淋透了，再想问一声，我已经没有勇气了；我想这一定是我没有叫对“芝麻开门”之类的暗语，所以里面的人才不答理我，就这样等着吧，也许迟早里面会出来人的。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了足有50分钟的时间吧，里面终于有人出来了。立即，我忙走上前去，才要向这位出来的人问一句话，不料那人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恶凶凶地对我说道：“喊报告政府。”哦，我明白了，身分变了，我已经是一个面对政府的人了。

果然这句暗语叫开了门，我在门外“报告政府”的喊声才落，里面就有人应声喊了一句：“进来！”于是战战兢兢的我就走进了办公

室，头也不敢抬，只乖乖地等着听发落。

“叫什么名字？”一位矮个子的人向我问着。

我报上去了自己的名字。

“什么问题？”

最初我还以为是问我有什么要求，但立即意识到不会如此轻松，这一定是在问我是因为什么问题才被送到这里来的：马上冷静下来，我站得规范一些，做出一副知罪的神态，向这位“政府”说道：“右派。”

“还有呢？”显然这位“政府”对于我只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向他报到，还大不以为然，好像我还应该再多一点什么才对。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当即就又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胡风分子。”

“这就说全了。”这位“政府”看来对我的情况极是熟悉，直到我把身份说全了，他才和我说话。这时，这位“政府”就向我交代着说道：“今后没有事情不许到这里来，叫你来的时候，先要立在门外报告全自己的身份，然后再说‘报告政府’。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立即答应着说。

听“政府”作过种种的交代之后，我以为报到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于是我就等着分配住处，还等编队编组呀什么的。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这位“政府”突然沉下脸来，他向我看了一眼，然后又咳了一声，似是显示他的威风。待到我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经立在我面前，要向我发训斥了。

“你的问题极端严重，本来应该判刑坐牢，现在政府对你实行宽大，让你到这里来好好改造，从今之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地方，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彻底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听明白了吗？去吧，你的住处是二栋三号，找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班长，他会给你安排地方的。”

就这样，我就算是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了。

关于在农场里的种种遭遇，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作《十劫须臾录》的长文，曾经发表在几家报刊上，时代出版社还把这篇文章收在了一册书名叫作《回首人生》的专集中；胡风先生的女公子晓风编辑出版过一册《我与胡风》的书，在读书界很有一些反响，这本书里就收录了我这篇文章的部分章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从中也许会得到一点什么启示，由此也就不难得出这类事件何以就应该“少写”的原因了。

本来呢，在农场里的日子也就算过得平平静静，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谁也就不再希望出去了，也不盼着会出现什么奇迹。生活的内容只有两条，一是低头认罪，二是脱胎换骨，全都是没头儿的事，天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是认够了罪，天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脱过了胎又换过了骨。当然没有希望的日子也是好过的，就是一个活呗，活着就是一切，其中既包括低头认罪，也包括脱胎换骨，用句当代的词汇说，那就是“全活”。

在农场里过了大约三年的时光吧，眼看着就到了1962年，这一年上边有了什么指示，要农场对收留的人员进行一下清理，清理来清理去，就清理到我的头上了。一天，还是那位身子矮矮的“政府”，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是这次他不那么凶了。他先是冲着我看了看，然后脸上又露出一丝笑容，最后他才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呀，也真是太老实了，人家把你送到这里来，你就来了，好歹你也要问一声凭什么要送我到这个地方来吧？”

一听这话，我猜出事情可能出现变化了，但我没敢细问，深怕有企图翻案之嫌，只是老老实实地坐着，等这位“政府”往下面说。

果然不等我提出问题，这位“政府”就开始对我说明真相了：“你呀，一不是逮捕，二不是劳教。三不是判刑，直到现在，花名册上在你的名字前面也没有红圈儿。明白吗，凡是判了刑的人员，一辈子无论到了哪里，户口册上，还有工作单位的花名册上，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划上一个红圈圈儿。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要管，现

在是说你的问题,你是怎样被送到这里来的呢?我们收下你的时候,说下的条件是‘代管’,明白吗,你本来不应该由专政部门来收管,可是单位把你送来了,我们也不能再把你推出去,于是就把你代管进来了。”

恍然大悟,在农场里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不应该被送到这里来的。说起来这就怪我了,当初人家送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怎么就不问一个“为什么”呢?早知道这是“代管”,我何必一定要让这里代管呢?这里面代管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呀,我干么不找个日子好过一点的地方求人家把我代管起来呢?譬如 SOS 村呀什么的,不是也可以代管一两个人的吗?

只是不幸,我被专政部门代管了整整三年,我的日子不好过,人家还嫌麻烦,你说说这真是何必呢?谢天谢地,三年的时间过去,人家也总算把事情真相告诉我了,倘若人家至今不说,那我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我的代管身分的。好了,知道我是代管就好说了,那以后,我就不那么卖命地干活了,因为既然你对我是代管,那么我对你也是“代干”,全是多此一举的事,大家就马马虎虎地在一起凑合吧。

就是在我一点也不因得知代管真相而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位场长却对我说了起来:“过去的事,也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今天只要我们改过来也就是了。你呢,我们把你送回去,谁把你送来的,我们就把你再给谁送回去。”

一听说农场要把我送回去,当即我就慌了手脚,马上我就对这位场长说道:“你若是认为我在这里的表现不好呢,今后我努力干活就是了,你可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我就在里面呆着吧。”

“怎么你不愿意回去?”这位场长大吃一惊地向我问着,“那些劳改分子们,一个看不严,他们就要逃跑,怎么你居然会不想出去?真是不可思议了。”

“在这儿好,无论是什么代管主管的吧,在这里,大家都一样,

比起来我还比那些劳教分子好些，他们见了“政府”只许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和“政府”说话还能东张西望。可是到了外边，我就是反面教员了，上千人看着我一个，那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呀。”当即我就对这位场长解释着说。

“你还是要相信群众么。”场长拉着长声地对我说着，“送你来的时候，你什么话也不问地就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好表现；可是如今要送你回去，你也要什么话也不问地就老老实实回去，这更是一种好表现。”

“不行，你今天把我送回去了，明天他们还会再把我送回来的。”死皮赖脸地，我就是不肯走，想出了种种理由，我是赖在这里了。

“上面已经下达指示了，从今后，专政部门再也不收代管人员了。”场长极为严肃地对我说着，“今天我们把你送回去，日后如果谁若是还想把你送进来，我们就连他一起留下；反正一个也是代管，两个也是一起代管，多代管几个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呀？”

没有商量，我还是被代管部门送回来了，果然政府说的话管用，从此之后，也没有人再要给我找个代管部门了，这个代管的笑话就算是结束了。

猪场记情

思想改造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灵魂深处建立劳动人民的感情；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犯错误的人来说，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思想感情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于是才在大风大浪之中迷失方向，也才在阶级立场的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

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根本的变化呢？说得空灵一些，是要脱胎换骨，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把屁股坐到工农兵的板凳

上来。可是工农兵的板凳到底到哪儿呢？看不见，摸不着，谁都说自己是工农兵的代表，可是谁又知道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这思想改造才是一个最痛苦的过程，也才是一个最复杂的过程。

不过呢，世间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就一定有人能作出回答。这就和平时所说的那样，有人划道，就一定有人会走，无论你划的是多么弯弯绕的道儿，也一定有人能走得上来，而且还能走出花儿来，这就叫能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们一样，全都想当模范，从冲锋陷阵到扑灭老鼠，举国上下，全都要有个好表现。

到了农场，这些人是要在思想改造上争上游，而且这些争上游的人们还都是改造对象，人人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就拿我说吧，第一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第二我对不起领导的期待和教育，第三呢，我对不起我自己的青春年华，还有第四、第五；反正我对不起大家的地方是太多了，无论我如何改造，那也不是三年两载能够改造好的。但是，正因为我的改造任务比别人重，我才更要比别人多做出一些努力，自暴自弃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死马且当活马治吧，万一能改造好呢？世界上不是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吗？

就这样，我也和大家一起，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开始在思想改造上使牛劲了。

最初，我以为加强思想改造，也就是拚命干活罢了；后来一看，大凡因被政府信任而荣任班长的先进人士，其于干活上倒未必多么出力，有时候还真有些吊儿浪当的呢。可是政府就是认为人家于思想改造上的进步，如我这样傻卖力气的学员，就是不如。

为了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开始用心计了。

本来呢，我们常说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可是世间无论什么事太老实了也不行，满农场的人谁不老实？大家全老实，于是老实就不值钱了。

不过呢,让我太不老实,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大不过也就是耍一点小聪明罢了。于是,从此我就时时观察那些于改造上有进步的人,时时效仿着他们的一行一动,“傻子过年看邻居”,人家做什么咱就跟着做什么的道理,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果然,世间无论什么事都最怕“认真”二字,经过我的一番认真,我还真就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在农场里,劳动组织是按班设置的,每几十个人定为是一个班,领导学员们劳动和学习的人,由政府任命,上上下下一律称这种人为班长。当班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这说明这个人 and 政府靠得近,思想改造有“表现”,很可能有机会得到宽大呀什么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向班长学习,班长做什么,大家就一起跟着做什么,那就有希望进步了。

用心地观察班长的表现,我忽然发现,有许多晚上班长在屋里就是坐不定,也不知是为什么,时不时地,班长就要出去一会儿,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就是立在门外,不多时就进屋来了;再看他的表情,有时高兴,也有时忧心忡忡,还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着急。那么,这位班长到底到门外做什么去了呢?于是在我们班长走到门外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面一起走出来,这时我才发现班长只是把手伸出来,远远地伸一会儿,然后就或是高兴,或是着急地回屋来了。学着他的样子,我也把手伸出去寻找一下感觉;哦,明白了,我们的班长是在观察是不是在下雨。农场么,天时是最重要的事,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我们班长就高兴,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改造上有长进的人们就着急。有道理,这就叫是感情上和工农兵靠到一起了,这就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看的就是你是和什么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有了这样的发现,那咱也就知道该如何办了。于是,一天黄昏收工时,看了看天空,正好天上有一片云彩,回到住处,不对任何人说,只一个人暗自用心;等到天黑之后,还没等班长出去观察,我就

早早地跑到门外伸手去了，伸了一会儿手，没有任何感觉。于是我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然后才心事沉重地走进屋来。我们的班长当然猜出我是为了什么事而犯愁，暗暗地记在心间。过了几天，开会时，班长就表扬了我：“你们看看人家林希，最近就有进步，知道地里旱了，晚上就出来观察气象，而你们这些人呢？就知道睡懒觉。你们这是努力改造自己的表现吗？说得学员们一个个低头无语，说得我却好不得意。

只是，光得到班长的表扬，我还不肯就此罢休，我还想得到政府的表扬；因为，晚上观察气象的事，班长肯定不会向政府报告的，要得到政府的表扬，那就必须做出点出类拔萃的事来。可是什么事才算是出类拔萃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来。当然我也知道，这类事，那是只可即而不可求的。

天公有灵，知我心诚，就在一天的夜里，哗哗地就下起了大雨。人们被大雨声吵醒，一个个全都为旱情的缓解而欢欣鼓舞，果然是全体学员一起关心农业生产的大好局面。再往大炕上一看，我们的班长没在，想一想，这几天正是他的假期，好了，表现的时机来到了。当即，抱起我唯一的一条被子，我就从屋里跑了出来。跑到院里，我想，在这样的大雨之中，什么地方最需要人们的关心？养猪场，猪圈里的小猪娃们现在一定正在冷得发抖呢，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送到猪场里给小猪娃们盖在上面，明天一定要受到政府的表扬。好了，就是这个主意，抱着被子我就往猪场里跑，也是雨下得太大，我连头也抬不起来，又担心小猪娃们因为没有得到我的爱护而正在挨冻，我也就跑得更加快了。谁料，正在我向猪场跑去的时候，猛然间，就觉得背后有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我：“什么人？”一声大声的喝斥，我只能停住脚步，老老实实地站在了雨中。

“下这么大的雨，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呆着，你跑出来想做什么呀？”一听这严厉的声音，我就知道坏事了，算我倒霉，被查夜的警士们碰上了。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大风夜，有人到饭堂去偷

窝头，被查夜的捉住，一口咬定说是下工时发现饭堂的窗子坏了，夜里睡不着觉，才跑来修理。“不可能，来修理窗子，为什么口袋里揣着窝头？”一句话戳穿了阴谋，再从口袋里掏出窝头来，铁证如山，就乖乖地跟着警士们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你想想，农场里还会有好地方吗？

赶紧说明原由，万一被对方先说出我是出来搞破坏，那就有口难辩了：“我是给猪场送被子的。”立即，我忙着向对方解释。

“谁让你来了？”人家的警惕性当然很高，不会轻易相信我一个人的话，把一只手电正正地照着我的脸，极其严厉地向我问着。

“是我自己自愿来的，我怕小猪娃们挨冻？……”我还想往下说，但是对方一挥手，打断了我的话：

“赶紧回去，不知道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吗？下雨天，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才是好表现，谁让你出来乱跑的？若不是看你留着分头，我一定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的。”这里面诸位看官就不明白了，在这个农场里，劳教的，要剃光头，内部处理的，才有资格留分头呢。

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有惹出大祸，乖乖地抱着我的湿被子，老老实实地，我只有往回走了。

唉，我只是想着这样小猪娃们呀，得不到我的温暖，它们该是多可怜呀！

相亲记憾

生为男子，于得意之时，被人选为婿君，实在是一件极开心的事；倘选婿的一方再有点来头，譬如什么书香门第，或者是什么权贵者辈，那就更令人为之自豪了。

而我的被人赶来相女婿，则实在是一桩大笑话，至今想起来，还每每要自己暗笑，说来还真有点黑色幽默。

那一年,我正是21岁,被送进农场已经是第三年了,忽然说是有了一个文件,说是诸如我们这一类人,可以离开农场,但是不许回城,只要有一个公社肯收留你,农场就给你办手续;从此,你就算是那个公社的人了,虽说还不能算是社员,但却可以以一个农业劳动力的身份参加劳动,并且享受和社员同等的待遇。你说,这对于诸如我这类的人说来,岂不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了吗?

然而,人家公社为什么要收留你呢?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而且又是在城市郊区,无论哪个公社也是不肯收留人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娶进门来的媳妇和迎进村来的倒插门女婿。

而农场也早就对这些人感到头痛了,当初送进来的时候,说好是三年,谁料矛盾激化,城市再也不让这些人的回去了;总在农场里放着,人家农场也照顾不过来。倒不是在生活中谁有什么要求,是人家农场没有人看着这么多的“分子”,还要组织学习,连农场的人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又让他如何给你脱胎换骨?快找个地方把这些人弄走吧,人家乐不得图个安静。

也不知是怎么一个途径,这消息就传到了附近的村子里,就说是有一批文化人,都是好年岁,还干过几年庄稼活,男的可以选来做女婿,女的可以迎进门来做媳妇,而且无论是男是女,一律不要彩礼;唉呀,就等于是白捡了一个便宜人儿呀!

于是,没多长时间,就只见许多陌生人跑到农场来了。头一个被相的是一个40来岁的“分子”,来人是一对老夫妻,当然是两位老贫下;进得门来就和我们这位老“分子”拉嗑。哪里人士?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离婚的妻子还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是一切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最后才向我们这位“分子”问道:“女方带一个孩子,你同意不?”当即,我们这位“分子”就糊涂了,幸好我们这类人的智商都还不低,不假思索,我们这位“分子”就对这二位老贫下说道:“我是老病号,肺都快烂没了。”这一下还真管用,二话没说,那两位老贫下就走了。这可能是他们知道肺病是一种传染病,

那是绝不能往家里招的。

而到了有人来相我的时候，那可就出了笑话了。我倒是没注意老贫下们是什么时候暗中就先相下了我，有关的情况，据说他们全都掌握到手了，我是单身一人，母亲早逝，父亲另娶，没有任何家庭牵连，真是再好不过的条件了；而且据他们估计，只要是他们愿意，我是一定求之不得的，离开农场了么，自由了，这些人不是信不自由勿宁死的吗？世上还有比自由更可贵的东西吗？没问题，这就看咱们姑娘愿意不愿意了。

很可能，人家姑娘也同意了，我也不知道那位可爱的姑娘姓什名谁，更无缘一瞻芳容，反正人家是先没有意见了。至于我这边呢？那就只差说一声，事情就算办成了。

大概也是村里的姑娘们过于高兴了，有一天晚上，正好是我们下工之后，我们几个小青年，一起到农场后面的小河旁边，蹲在河边上洗身子；洗着洗着就觉着有点不对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在岸边上围过来了一群姑娘，一面看着我们洗身子，一面还指指点点。后来我想，这大概是他们互相在猜哪个是自己选下的人儿？当时，我们是蒙在鼓里的，只以为是碰巧河边上来了几个姑娘，看我们洗身子怪好玩，自然就谁也不在意。

谁料，那几个姑娘也是过于自信了，她们居然向我们凑了过来，一定要把我们看个仔细。这一下我们有点警觉了，倒不是我们要来个什么男女不亲，只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怕再给自己惹事了：下工之后和村里的姑娘在一条河里洗身子，扣你个居心不良，跳到黄河里也是洗不清的。

情况不好，赶紧逃跑。我们几个小“分子”们当即就匆匆站起身来，想往农场跑，只是为时太晚，我们已经被这十几位姑娘包围了。这十几位姑娘倒也胆大，她们中间的一位冲着我就问：“你是姓林的那个吧？”

我当然不会回答，因为已经有了那位老“分子”的事端在先。

我知道这是被人家相上了，不能激怒好心人的感情，还是自己早早跑开的好。

谁料，就在我要跑开的时候，又有一位更小的女孩向我靠了过来，冷不防，这个小女孩子就在我身上掐了一下：“哟！真白！”她还喊了一声，随后，她们就一起大声地笑了。

……

后来呢？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说是又下来了一个文件，说绝不能把这些人放到农村去做农民，要把他们永远留在农场里；这些人是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放到农村里，真到了闹的时候，你就抓不到他了。于是，从此之后，相亲的人，一律不让进农场了，我呢，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做倒插门女婿的机遇。直到今天，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还为之扼腕，真是太可惜了呀！

嗟夫！

(选自《散文与人》第六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钟惦棐

电影的锣鼓

前几个月,当音乐方面正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戏剧方面正在讨论《琵琶记》和《如兄如弟》的时候,有人便发问:为什么电影这样沉寂?难道电影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 11 月间,电影的锣鼓就响了。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使他们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 9%,《上地》是 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 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 1953 年到今年 6 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 70% 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 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

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 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

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暧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化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

这种只要现在不要过去的作法，无异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演员孙景璐喊出：“最重要的是关心人！”上官云珠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厂里有些演员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认为有些来自旧社会的演员，今天还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舒适说：“1955年未拍《南岛风云》之前，上官也是被积压的一员，在偶然的机会上主演了《南岛风云》。片成后她扮演护士符若华很成功。于是上官开始忙起来了。……像上官这样有能力的演员，过去独当一面的演员，大大小小的有才能的演员，我们剧团里多的是，潜力非常雄厚，不过是没有被发掘罢了。”而导演孙瑜，则提出了“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而所谓“传统”问题，在这里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对“电影圈”内如此，对“电影圈”外也如此，老舍的《救救电影》，便说明了这些年来关起门来搞电影的方

法是行不通的。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个,工农,15个,以及如此等等。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

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电影事业管理局,顾名思义,是代理国家管理全国电影事业的行政机构。但这些年来,这里除了讨论剧本等等之外,一个剧本该发多少稿费,一个电影导演在拍完影片之后该给多少酬金,纸带录音机可否改做磁性录音机,也通通要呈请批准。但往往又是影片要开拍了,剧本没有批准,影片都拍完上映过了,酬金发不下来,纸带录音机只需稍加改动,便可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为了要等待电影局统一全国的技术规格,这样的改变便成为不可能。

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会有关于“狗”,关于“黑框眼镜”,关于“敲门”和关于“道谢”的干涉?为什么会有“人物统一规格”?为什么“审稿制度繁复”? (以上均见《文汇报》的讨论)这在于我们有

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的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这并不是说列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也不是说不需要关心、不能有任何干涉。而是说，电影既是最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违背了这种规律，即不尊重列宁在另一地方所说的：“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

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

关于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甚至有人表示怀疑，有人则十分肯定。此二者，我们以为是值得继续讨论的。但退一步说，中国电影便是没有传统，那么，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从“明星”到“联华”，到“电通”，到“昆仑”、“长城”，是否也还有些比较好的经验呢？在制片，在组织创作，在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是否也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有某些具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才是急于要把这些一脚踢开！而且希望踢得愈远愈好，不然就似乎要妨碍什么！

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但它首先要妨碍的，岂不正是这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法么？孙景璐在上海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还演过《日出》里

的翠喜和尔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导演中心”自然还有组织影片创作,团结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工作并逐渐形成创作核心形成流派的意义。但它绝不是说,电影文学的基础对导演不具有约束的意义。影片的风格就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由电影文学剧本所提供,而由导演所完成的。

目前,我国电影生产体制正在进行改组工作,其方向,就是为了使得它更加适合于电影制作的规律。但其中,电影演员的培养和使用,是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它牵涉到,电影制片厂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演员?如果应该有,对他们怎样使用和培养?如果不应该有,对他们怎样安排?

在当前的锣鼓声中,以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锣鼓为最响。这是因为他们在电影艺术干部中人数最多,问题积累的也多。但目前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电影制片厂是否应有上百的职业电影演员?没有,制片厂将会感到成天向文化部打报告之苦,向剧院借演员之苦;而能否借到,尚是问题。但为了省掉这些麻烦,便使人数众多的电影演员们终年甚至数年“失业”,终年甚至数年过着惶惶不安的生活。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学习,白白地浪费掉自己的青春!即便是说,演员们终年都在摄制组,演技是否就能够有效的提

高,这也还是个问题。很早便有人说过:电影绝不培养演员。因为演员在镜头前面的活动时间总是很短的。能够真正培养演员、锻炼演员的场合还是在舞台上。

我们不以为问题的结论便是如此,但这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提请文化主管部门来认真考虑的。

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文化主管部门亦准备对此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组织措施不能同时解决许多创作理论上的问题,也不能够说当制片生产体制一经改革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电影文化水平便能够立刻大大提高。因之我们很希望这讨论还能继续深入下去,真正为我国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姚芳藻

“电影锣鼓”大风波

1956年《文汇报》复刊之后，报社编委会就给北京办事处来了一封信，说是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活跃空气，决定发起一场讨论。但讨论什么呢？集思广益，要求“北办”记者多多征求各界意见，给予大力支持。接信后，我便认认真真地在我采访的文艺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美术、音乐、电影界的朋友们，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听了都极为兴奋，希望我们报纸能够讨论他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们也被“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了，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听着，觉得问题确实不少，但是我感到有的还不适宜公开，有的读者不一定有兴趣。后来，我又跑到中宣部文艺处去找钟惦棐，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钟惦棐。

红墙里的影评家

中宣部设在沙滩红墙里面，这里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早已破旧斑驳。我想，过去这可能是小太监的居处。钟惦棐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已经颇负盛名了，我很欣

赏他的文章,觉得它没有八股味道。本来在我的想象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实际上,他却显得那样矮小,穿着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深度的镜片后面,一双小小的眼睛射出深邃的光芒。

当我和他谈到,我们报纸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开展问题讨论时,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他很兴奋的把电影工作中的问题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他说:“现在许多人把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机械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而且写工农兵不能写缺点,不然就是污蔑工农兵。同时,对解放前拍的一些好的影片,又一概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电影……结果弄得影片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所以票房价值极差,常常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钟惦棐对电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侃侃而谈,一口气就讲了近两个钟头,讲得有条有理,问题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钦佩。他是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对电影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已决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话非常吸引我,使我对电影问题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把这些推到版面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回到家里,我兴致勃勃地把当天的收获告诉梅朵,决定积极建议报社讨论电影问题,不料他却意外地表示反对。原来他担心,因他当时还在电影局工作,而且还处在靠边的地位,深恐电影局会认为这场讨论是他鼓动我这么做的。

“这是我搞的,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梅朵实在多虑,我可不相信堂堂电影局的领导会把妻子的账,算在与此毫不相干的丈夫头上。如果真的这样,不是太荒唐了吗!更主要的是,我认为电影讨论不是坏事,听听群众意见,对改进工作只有好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吗?我根本不理睬梅朵的

顾虑,立即给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惦棐的意见以及我的看法,建议发起电影问题讨论。

果然,报社采纳了我的意见,仔细研究了钟惦棐的观点,决定发起电影问题讨论。编委会来信中表扬了我的建议,但又说:“讨论只限于上海进行,由副总编辑唐海负责。“北办”没有任务。我本来以为在这次电影讨论中自己可以大显一番身手,现在一下子觉得无事可干了。可是旋即一想,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是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荟萃之处,很多导演、演员都为群众所熟知。讨论先从上海开展起来,这也有道理。

出乎意料的收获

虽说“没有任务”,但有些事情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电影问题讨论一个月后,意见都提得差不多了,编辑部准备鸣金收兵。这时唐海来电话要我火速去采访文化部电影局领导,请他们谈谈对电影讨论的意见,并听听他们准备怎样改进工作。我奉命办事,先兴冲冲地跑到捨饭寺去找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但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于是我只好直接打电话给电影局局长王兰西,碰碰运气了。我原以为王是行政领导,也许更不愿同我谈,我得有个思想准备,想不到他却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并对我说:“电影讨论我每篇都看,确实谈出不少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准备改进工作,办法也研究过了,明天局里开大会,我就要向大家宣布,你来参加我们的会吧!”

更出乎意料的是,电影问题讨论才一个月,电影局连改进措施都已经研究过了。那些措施听来也真新鲜,例如,改变影片的审查制度。自明年1月1日起,电影事业管理局一概不再审查影片;每个摄制组都以导演为中心,影片一律由导演负责;制片方式方面,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的违背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制度。王局长

在大会上宣布说：“在上海一个大厂可以分成几个小厂，厂名嘛，就叫它昆仑也未始不可。下面可以组织许多创作集团，发挥各自的特长和艺术风格，展开竞赛……”哇！这些改革措施，步子之大，真正出人意外。

王局长对我友好极了，他一面作报告，一面却不断的与我点头示意，甚至微笑对话，弄得许多人都回过头来看我，叫我好窘。会后，王兰西专门接见了，他满面笑容地感谢文汇报推进了他们的工作。分别的时候，他一再关照：“以后多多联系，多多联系。”我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怪我们事先没有同他通气，叫他好被动。我暗忖：这怪不了我呀，电影讨论由上海负责，“北办”没有任务嘛！

我把王兰西的报告写成了一条消息，快快送他审定，而他却已到上海去了。于是我给报社寄去，并提醒编辑部，稿件务必让王兰西亲自审定。事后，唐海在电话里却告诉我说：“王兰西对你很有意见。”我听了，百思不得其解：我同他只有这一次来访的关系，而我坚持新闻要让他本人审改，做得够道地的了，怎么还对我有意见呢？后来消息上了头版头条，处理很突出，题目叫做《改进电影事业的重大措施》，第二天又发了一篇社论《电影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显然，消息与社论的刊出，应该说是表示电影问题讨论到此将告一段落。这里附带说明的是，消息我是完全按照王兰西的大会报告的原话写的，而发表时，已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说实在的，我对电影问题讨论并没有做多少事，除了提出建议和发一则消息以外，再就是唐海到北京来时，曾陪同他一起去看望过钟惦棐。那次梅朵也去的，梅朵已离开电影局《大众电影》，调来文汇报，也没什么顾虑了。唐海向钟惦棐谈了电影讨论的种种情况。我们曾希望他为电影讨论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而他一再推辞，后来他却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电影的锣鼓》的评论文章，准备交给文艺报发表。梅朵觉得这样不妥，与钟惦棐协商，最后让文汇报与文艺报同时发表。

毛主席出面讲话了

电影问题讨论历时近五个月，一波三折，反对者可真不少。最初，讨论挂的牌子是：《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这个题目据说是编委会再三斟酌才决定的。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那意思就是，好的国产片是有的，只是少而已。对这个题目，编委会很自鸣得意，我也十分欣赏。可是没过多久，这块牌子不翼而飞，代替的题目是《电影问题讨论》，平庸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打听之下，才知道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对这场讨论很有意见，他说：“你们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作为讨论题目，就是不要人家谈电影的成就，只能谈缺点。”并命令“牌子一定要换”。报社无奈，只得更换牌子，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四平八稳。一时沸沸扬扬的对电影讨论横加指责，我耳边刮到这些消息，好不泄气。

正在灰溜溜的时候，突然听到毛主席肯定电影讨论的声音，这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使《文汇报》的每一个同志都精神焕发起来。

毛主席对电影讨论的肯定千真万确，这是我们的总编辑徐铸成亲耳听他说的，在场的还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舒新城等，都是新闻出版界著名的人士。那是1957年3月份的事，当时徐铸成等被邀请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新闻出版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毛主席表扬《文汇报》的那些话，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讲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谈的主要是“双百”方针的宣传问题。徐铸成的位置被排在主席的旁边，中间仅仅隔一个金仲华。毛主席的讲话他听得很清楚。后来，徐铸成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对着笔记本详详细细地向我们传达，生怕漏掉一个字。

毛主席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

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都有益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毛主席的讲话,整整传达了一个上午,我奉命记录,下午就马不停蹄地加以整理,我记得又快又好,简直一字不漏,记了足足九千字。晚上就通过航空专递送到上海。编辑部第二天就进行传达,第三天、第四天,许多单位领导人闻讯,都借去作了传达。主席风趣的语言、透辟的思想,鼓舞了整个上海文教界。

接着,我就“双百”方针问题访问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特别请他谈谈对本报电影问题讨论的意见。周扬回答我说:“我认为《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讲座是有益处的,电影工作有缺点错误是客观事实,并不是《文汇报》讨论了才有的,这个讨论对改进电影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报上所发表的电影工作者的意见,大部分都是好的,他们反映了电影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并且提出了积极改进的意见。至于说讨论中有不正确的论点,既然是讨论,那就会有不同的论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有,这是不足为奇的。即使在同一个人的意见中也可能同时包含着正确的和错误的部分。不能要求报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的意见都正确。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往往只有在经过不同意见的充分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达到。”周扬的意见当然是与毛主席的意见一致的,把周扬肯定的话公诸报端,也等于给电影讨论下了结论。于是那些对电影问题讨论耿耿于怀的衮衮诸公,只好缄口不言了。

风云突变 厄运临头

可是,没有过几个月,风云突变。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电影问题讨论被说成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放的第一炮,参加这场讨论,提过意见的,不少人遭了殃。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钟惦棐。电影界召开批斗右派分子钟惦棐的大会,连开一个月。我和梅朵奉命参加。我很想溜之大吉,但不行呀,说是参加,实际上是陪斗。我如半途而退,岂非罪上加罪!我预计到自己会在大会上亮相的。果然,电影局一位负责人在会上发言时说:“《文汇报》电影问题讨论是姚芳藻主谋发起的”,而我完全估计不到的是,他紧接着就说:“姚芳藻背后是谁?就是梅朵,这不是很清楚嘛!”接着,他对梅朵大加鞭鞑!

天哪,果然把我的账算的梅朵的头上!梅朵的预计是对的。

梅朵就坐在我的身边。他被震动了。我伸过手去,紧紧的捏着他的手,表示我的歉意。

大会的最后几天,我和梅朵都遭到批斗,对梅朵的火力比对我要猛得多,有人甚至这样指控他:“你借电影讨论想把电影局负责人打下去,自己来做电影局长。”何其荒唐乃尔!

就这样,我们都成了这场电影讨论的“罪魁祸首”,我想申辩,但这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选自《文汇报回忆录·在曲折中行进》,文汇出版社)

钱辛波

交心成“右派”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随着运动的发展，报纸上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完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康生接着讲话。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天,继续“反右”。

在3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

小字报或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读者并不爱看。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回想 1956 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采烈，感到党组织在关怀和培养我，1958 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后 20 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是 55 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

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敌人的行列？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

回顾五〇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连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 20 年，国家民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了。

唐 瑜

反右记

“左”网恢恢

反右派那时候,我是一个老“左”。

那年6月1日,我在成都,到一间小学校参加庆祝儿童节,顺便在邮局买了一份《人民日报》。这一天有一篇罗隆基写的短文,歌颂百家争鸣,说领袖是大乐队的指挥,他是队里的洋琴鬼。

时日不长,只一两个月,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上班时,就听说有人大嚷大叫,扬言这回要好好摸一摸打伞老和尚的头了。

真真岂有此理!他把我们伟大领袖比喻为“无法(发)无天”,但即使是老和尚,也岂能随便让你来摸。

我顺手拿过办公室内早已备好的大字报纸、笔,写了大字报。第二天,我又写了一张回击人事部门的大字报。那年代,人事部门几乎是清一色极“左”阵营,偏偏我们这个部门出了叛逆。

以后我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一时“左名”大振。人民大学一个叫林什么的姑娘又到我们的下属单位点火,我也想攻之,孟超说是再等一等。

运动迅猛发展,热火朝天,各单位纷纷报捷,不仅已完成了百分比的数目,有的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可是我却看到形势古怪,“左”热渐渐冷下来了。

各部门每天都有一个反右碰头会，交换情况，汇报请示。

党委徐书记每天亲临参加，闭目聆听。

李书记汇报：本单位座谈“反右”战果，某人始终不发一言。

“划！”徐书记轻声说了一个字。

“可是，他并没有右派言行。”

“划！”这一次声音最少提高了三倍。

马书记汇报本单位反右办公室一个积极分子的思想，说他感谢党的挽救，否则这一次非跌入右派泥坑不可，因为他开始时颇为那些右派言论所迷惑。马书记认为这次反右非常及时，它一定挽救了大批像积极分子这样的人。

“划！”这次徐书记声音温和多了。

“徐书记，这样会使党失去威信的。”

“划，错了，我负责。”

全国形势大好，各个单位和部里的右派，都挖出来了，到处都在举行超额胜利完成任务的祝捷座谈会。

但是，右派的细菌据说仍在各个角落里腐蚀我们的党。有一些头面人物还未完全解决。譬如某部的头头的反党材料收集得还不够全面，仍在向未被划的人征集亲自听到的，转听来的，觉得可疑的。对已被划了的，要他们立功赎罪揭发检举。

部长太太和我是同事，我们每天中午都在东四一家小馆子吃饭，我叫她告诉部长要小心为好。她说：“根据经验，这已成定局，现在只是手续问题，他已经作了准备，但孩子的问题比较麻烦。”我说：“如有麻烦，可先安顿在我处。”果然，不到一个星期，报上就公开了。

各路右派大军早已纷纷流放到北大荒、甘、宁，有的甚至西出阳关。部长太太带着孩子随夫出发，我抱两岁的小女儿去送车，却被她带到哈尔滨去了。

次日中午，我又在东四碰到聂绀弩，他说：“你请我喝二两，给

我钱行,我也要到大荒,在这里,什么也别扭,不如去那边,大家还有共同语言。”但这不羁的诗人,把香烟屁股一丢呼呼大睡。不烧死已是大幸。“这是敌人的破坏,是阶级斗争。”当然就锒铛入狱。

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心中。怎么那样静悄悄,连马路上也有异样。

是无公可办?做不做工作,似乎无所谓?你要做么,人呢,能工作的人呢?运动过去了,难道可以不抓工作?看到右派像垃圾一样,我要几个垃圾,总容易些吧。我打个报告给党组齐燕铭、钱俊瑞,请拨给几个右派。两三天后,有人偷偷告诉我:“你和马等一批人,十天内将下放遵化,安家落户。”马是党支部书记,曾与徐书记争辩,又曾说过地球如果失去地心吸力,海水倒光了,房子、人颠倒了,怎办。蛊惑人心!其他一些人,也是平时很不听话,总之,这一批人,应该算是漏网右派。

“左”网恢恢,宽大而不漏!

我到医药商店买一些药品,遇到我的部下,一位19岁的姑娘。她正在买一包数量不少的避孕套。她平时是很大胆的,此刻却有点尴尬,笑笑说:“13岁参加革命,今年19岁,却成了反革命。我和丈夫都是少年反革命,如果生下一个小反革命,我们将是不可宽恕的罪人。”

对这双小才子、才女,我能说些什么呢?

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农村似乎是“欢迎”我们的,因为再过几天,翻天覆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大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剃刀边缘

有一种称呼,也很奇怪。

西藏军区文化部长带我去看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叫他“03号”。出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说是为了保密，我说这样称呼不就告诉人家他的职务吗。他说，这是战争年代定下的规矩。

为了这第几号，有人曾对夏衍虎视眈眈。

解放后，许多老革命不知天高地厚，开口闭口怎样怎样，话说多了，文章写多了，就不免有差误。夏衍在《人民日报》写二三百字的小方块，有一篇谈到号码，说每个人都给一个号码。写信时只写：第1号省、2号市、3号区、4号街、5号门、6号楼、7号办公室、8号同志，或者×号大学，××号工厂等等（大意如此），有时也口头作谈笑资料，听者哈哈大笑，完了。到了反右运动，人们的记忆力特别强，特别敏感，这不讽刺党吗，这不是恶毒攻击党吗？那时，有人首先想保护自己，摆脱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危险；有人想立功，看别人倒下去，自己飞起来。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

但这次运动看来主要是清除党外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对党内高级人士较松（陈沂的被划右派是××为消除长期以来不听话的分子）。那些有多年的政治经验的大人物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纷纷马失前蹄，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选自《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

黎 白

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开始在全国掀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毫无例外地在军队系统展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是首当其冲,展开最早的一个军内单位。从1957年初鸣放开始,接着展开反右派斗争,进而开展整风第四阶段至最后的组织处理,全部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直至决定创作室撤销。我当时是创作室的创作员,经历了全过程。这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训的、沉痛的历史。我想,将它写出,也是有益的。

昙花一现的总政创作室

总政创作室建立于1956年,它是以文化部原有的临时创作组人员、从各大军区调来部分文学、美术方面的创作人员及部分参加莲花池“肃反”后留下来的少数创作人员组成的。有文学、美术创作人员及两位秘书。创作室主任是虞棘(兼电影处长,创作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魏巍、文学创作员蔺柳杞、丁毅、胡可、杜烽、徐光耀、西虹、周洁夫、史超、寒风、郭光、韩希梁、张桂、沈默君、黄宗江、陆柱国、白桦、公刘、黎白,秘书柳琪祥、夏信荣,美术创作员艾炎(组长)、关夫生、高虹、彭彬、刘×、何孔德、黄胄、张祖武。其中,胡

可是党支部宣传委员、黎白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创作室组成后,由于创作需要,由创作室借调代管的各军区创作人员有徐孔、林子、樊斌、郭良信、孙景瑞。

在鸣放、反右时期,创作员郭光因病未能参加运动。丁毅调总政文工团,西虹调《解放军报》,实际上都没有在创作室参加反右运动。张桂是反右初期从解放军文艺社调来后参加运动的。所以,创作室在编人员只有27人参加了运动,非在编人员6人中有5人参加运动。实际参加创作室反右的总计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8人,受中右、党内处分或遣回单位继续批判的计有7人。也就是说,受处分的人数为15人,占整个创作室人员的近一半。

可以说,创作室从1956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主要是经历了一场反右派运动,是绝无美妙可言的昙花一现。

“四人文章”和“灯下漫笔”

1956年文艺界受中央“八大”精神的鼓舞,及在这之前的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会上,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讲话所鼓舞,或者更早一些的1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许多重要精神,很自然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

特别是党外的著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许多报刊上相当大量地出现了一批“百家争鸣”的言论和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也就引起了一部分主管文艺的及相关的人士看不下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灯下漫笔》,总政文化部四个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后来通称的“四人文章”。应当说,这两篇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文章也是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但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因为多少年来,人们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一些人被整怕了,产生这些疑虑和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任何人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在这前后,中央批评了《人民日报》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在毛泽东参加的颐年堂会议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挨了批评,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4月10日,挨了中央严厉批评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写着:“党内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又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并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又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它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也使陈沂和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这几位部队文化文艺工作领导人震惊得无所适从。陈沂是直接受到毛泽东批评为阻碍鸣放的、当时党内军内的高级领导人，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紧跟中央的步伐，亲自到军内几座院校鼓励鸣放。他在发言中曾说：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的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陈沂讲话的大意）。更没想到的是陈沂这个讲话中的“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十六个字，成为他不久被划为右派的“猖狂向党进攻”的主要罪状。其他四位处长在鸣放及反右中也大都是一付等待挨批的模样，有的人也确实在挨批。

这是鸣放前及后来反右中，总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化单位形成混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恰当地说，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很难讲是由总政文化部领导的。

没有形成热潮的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评了“四人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文艺院校领导、知名人士的座谈会，鸣放掀起了高潮。

总政创作室也召开了为数不多的鸣放座谈会。据我亲身经历，创作室单独召开的座谈会并不多，我在鸣放初期到烟台去创作未曾奉调返京参加；还有一些创作员或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也未奉命返京参加鸣放。我是5月份返京后参加了一次创作室部分人员的座谈会及一次由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组织召开的，有部分创作室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有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也

有过不同看法的发言,但并没有形成激烈的争论,都是比较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我记得在座谈会上,公刘提出“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了,伤害了感情。他的发言也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我却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公刘的意见。公刘没有反驳我,与会的其他同志也没有反驳公刘和我。会后,我受到了支部书记虞棘的批评,说我身为支部组织委员却阻碍鸣放。他讲了陈沂及“四人文章”受批评的情况,而我在这之前不在北京,是不清楚的。但,我对这个批评也不很心服,我向虞棘说:我发言是讲明当时肃反的事实并没有错呀。虞棘只说:“鸣放嘛,让人家讲就是了。陈部长是受了毛主席的当面批评呢。凡是对鸣放不利的话都不该说。”我当时有些糊里糊涂,我认为虞棘似乎也并不很清楚。

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大多与社会上的鸣放联起来了。徐光耀刚从他的生活基地回京,他发言是肯定双百方针的,形容为“海阔凭鱼跃。”我发言中也提到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说:我认为费孝通同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虽然我们部队并不如此复杂……会上,杜烽等同志还提到了全国戏剧家协会的鸣放和美术家协会的鸣放。后来,大部分发言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有的发言也就成为以后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罪状。回顾我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所有发言,我认为即使在当时也是以拥护整风、帮助整风为目的的。尽管报刊上已发表有激烈的言论,这两个座谈会上发言却是“低调”的。

与此同时,创作室部分同志介入了文艺界鸣放热潮之中。美术组艾炎等同志参加了美协的鸣放;杜烽力求联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同志一起到剧协参加鸣放。白桦单独去云南到昆明军区文艺单位和省文联支持并鼓励鸣放。创作室的作家、画家中的少数同志投入了鸣放热潮之中。鸣放的核心内容仍是在贯彻双百方针,力图纠正或改变一些单位确实存在的带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及力求改变某些过左的粗暴领导作风。应

该说,所有动机都是拥护中共中央决议的,即使发言内容和态度也并不是过激的。而创作室的相当多的创作员,基本上没有投入鸣放中间去,有的忙于创作,有的也许出于谨慎。个别创作人员甚至是完全没有参加鸣放座谈,更没有参加社会上的鸣放活动。与当时鸣放高潮的许多单位相比,创作室的鸣放实际上是相当冷清的。这是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了右派分子进攻,并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时,反右派的运动已经决定下来了。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下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就突然而迅速、猛烈地展开了。所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是鸣放开始的话,到毛泽东提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有17天的鸣放时间,到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即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右派运动为止,鸣放的时间也只有40天。总政创作室实际上算不了全力投入鸣放,也是不足为奇的。

“战果”可观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来势汹涌的巨浪冲激得总政文化部及创作室一片混乱,形成了失足失措的局面。文化部长陈沂已是作为重点在总政范围内接受批判的主要人物,陈其通担任总政文工团团团长,忐忑不安地领导着文工团的反右运动。陈亚丁一度主持创作室的反右运动,每次开会,他作为主持人总是先表示自己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别人时也很少作为领导人发言,更

很少参加创作室支部会议对运动开展的研究。鲁勤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创作室主任虞棘则被一些人认为是陈沂的山东帮重要谋士,尽管虞棘是创作室反右的主要主持人,看来也只是依当时的气候,查阅鸣放发言,尽可能打出个右派分子来。所以,创作室开始反右时,是乱了阵角的领导人在进行领导,支部也很少有对室内人员排队研究或事先预定打出多少右派分子。我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类似以上内容的支委会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几乎形成了谁有鸣放言论,甚至没有鸣放言论也要相互揭发的局面。最早“揪出来”的樊斌、吴占一等并不是创作室的编制内的成员。樊斌是昆明军区的成员,他从小在部队担任卫生员,他的新作《雪山英雄》在当时有很好的反应,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我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他的。以后留在创作室代管进行创作,我曾兼过创作室秘书,又是党支部组织委员,才与他有一些往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我记得樊斌参加过不多的几次会,其中也包括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会议。他在创作室被打成右派,我没有参加过揭发和批判,但我知道只是由于他在鸣放会上讲过几句激烈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颇为简单地就划为右派。吴占一被划为右派更加简单,他原是总政文化部的秘书,曾随总政副主任甘泗淇去参加苏联归还旅顺港的活动。听到过甘副主任讲了几句对驻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不满的话,回到北京向几个同志顺便讲过。就以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他们两人定为右派,依我的记忆,创作室支部大会和支委会都没有研究确定上报或正式表决过。如何就被划为右派的,我至今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也很快就离开创作室。

创作室反右时期进行揭发批判是分两个组进行的。文学组是在虞棘、魏巍主持下进行,而美术组是在另处进行的。

文学组的反右运动,我是全过程都参加了。

在揭发和批判徐光耀和我的同时,公刘被批判了几次,定他为

右派的“罪状”并不复杂，一是他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他确在鸣放会上发言对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提出过批评。这个会我参加了，但绝对不是攻击全国的“肃反”运动。二是他发表过的几首古体诗，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祖国。这是无法理喻的。三是对他过去历史的某些已经作过组织结论的问题旧事重提，很简单地定为右派。再一位是沈默君，对他的揭发批判会议开了三四次。沈默君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找不到他有什么攻击言论。依他平时的作风及品质，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他应划为右派分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识趣地在会上发言表示这是反右派运动，他没有右派言论就不应该划为右派。依其作风划为坏分子也不能划为右派。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另一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白桦。他是被召回京在创作室参加反右的。他正在积极揭发批判别人，昆明军区党委来电给总政治部揭发他在昆明军区的“罪行”，并要求划他为右派，经过总政批准了。所以，白桦划定为右派并不是创作室揭发出来的。

反右派运动初期，作协党组从6月6日陆续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至8月6日结束。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与作协党组扩大会同时，被认为与丁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在被揭发和批判。在创作室的创作员中，徐光耀和我都是原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学员，陈企霞是系主任。徐光耀在建国后又曾在丁玲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所以，我们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内的骨干”而被揭发和批判。徐光耀的“罪状”主要是替丁玲翻案，经济上支持陈企霞。这个罪名是毫无道理的。关于替丁玲翻案，是指1956年作协党组曾写过一封公函，要求总政创作室党组织让徐光耀写一份丁玲在主持文学研究所时期被揭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和证明。我当时是组织委员，即将作协党组的信面交徐光耀，请他写一份材料。他当时表示没有必要写。我

认为是作协党组的要求,又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来函,还是写的为宜。他查阅了他的日记后,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材料。这怎么能认为是徐光耀恶毒攻击作协党组,蓄意为丁玲“翻案”呢?而在经济上支援陈企霞,也和右派罪行丝毫不沾边。陈企霞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很久,1956年后或1957年初被解除隔离后,有同学来找到陈企霞,说陈企霞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这种帮助还不能被陈企霞知道,否则,陈不会接受。徐光耀相信了这位同学的话,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他又刚刚有些稿费,就支援给陈企霞几百元。这两条罪状就将徐光耀划为右派分子了。徐光耀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工作,为人朴实,自律很严,鸣放时,他正在农村深入生活,被调回京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以他的为人,品德和言行,划为右派,即使是创作室的几个少数处于整人位置的人也感到意外。

我与徐光耀属于“同案犯”。唯有一件事似应讲一下,即会上对我曾经“系统地恶毒攻击赫鲁晓夫”这一罪状,在被批判时,给我内心的震动超过了这个“罪状”的本身。创作室反右运动中后期,某作家批判我时说: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也有意见,但是我们拥护苏联共产党,拥护赫鲁晓夫同志,你根本不同,你对苏共,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们党都有刻骨仇恨,你反党思想深入骨髓……尽管我和这位作家在调到创作室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发表的一些作品,对他也有敬意。而他这个批判却使我按捺不住,当场和他抗争起来。以前,他对我毫无了解,依当时对干部的要求条件而论,我不是剥削家庭出身,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在部队一贯立功受奖,没有受过处分……说我对党刻骨仇恨、深入骨髓的根据何在?为什么在如此严酷的运动中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若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在鸣放中并没有反党言论,若是由于个人恩怨,我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他。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对赫鲁晓夫有意见是对苏共的拥护,我对赫鲁晓夫有意见就

变成对苏共对党有刻骨仇恨？这种“理直气壮”的诡辩无非是他居于批判别人的位置，被批判的人只能低头认罪吧？当时我实在无法忍下去，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至今以为写出这个细节并非插曲，并非个人恩怨。它反映出一些人在大风浪中的政治品德，骨梗在喉，不能不讲。

对我的定性有过反复。最初，创作室主持运动的几位同志并未都要把我划为右派，而是定为中右分子，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但原总政文化部某副部长此前不久调到作协担任书记，他向总政治部谭政主任提出：黎白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重要骨干分子，必须划为右派分子。而担任总政纪委书记的联络部长张桢祥同志坚持不改变原来决定的处分，所以，我仍按原处分处理，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老实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凡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如果还能幸存下来，也是经历了20年的非人生活啊！我几经反复，最后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至今我极为感谢我并不认识的张桢祥同志。

到了1958年初，创作室反右运动告一段落时，在创作室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徐光耀、艾炎、公刘、何孔德、沈默君、白桦、樊斌、吴占一等八名。徐孔被调回原单位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中右分子及受到处分的或处理的有寒风、黎白、林子、韩希梁、刘×、张祖武等六人。两类相加共19人，是创作室人员及代管人员的一半。另外19人中，丁毅、西虹、郭光或调出或因病未参加创作室的反右运动。胡可、蔺柳杞、史超等又受到反右不力的批评，虞棘属于被批判的对象，柳琪辉、夏信荣是秘书，只参加运动或是记录。郭良信、孙景瑞返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的成员中，在反右派运动里没有挨整的就不多了。

反右派后期“整 风第四阶段”的风波

1957年底，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初步告一段落，展开“整风”，要求每人写50张小字报，内容不限。有的同志“久经考验”，只写了一些“请不要在厕所乱扔手纸”，“请不要随地吐痰”之类的小字报。有的同志“不知深浅”，还是写了一些有关对领导同志的意见等内容。寒风等二同志在他们写的50张小字报中有一篇“打油诗”，其中有“老××没主见，跟着××屁股后头转”的词句。寒风尽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不够积极受过批评，却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右派罪行的言论，这首打油诗却使他在劫难逃，终于被以算老账的方法，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于1958年下放到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创作室主任虞棘早已未经改选就被剥夺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在整风中成为被连续揭发批判的重点。后因突然病变住进了医院，对他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到了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及受了各种处分的创作员已先后离开了创作室，右派分子被正式开除军籍、党籍，分别送往劳改地点及管教单位，其他受不同处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农场或遣回原单位。几位主持运动的及没有受到处分的同志有的返回原单位，有的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个别人分配到军分区。至此，创作室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不久，创作室被总政撤销。

反右后所想到的

反右派运动毫无疑问地是一场“左”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他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

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就完全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

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又是如何估计、判断并作出结论的呢?他在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编入毛选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文中写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

这个结论是讲在1957年,也就是说建国后的第八年。毛泽东所指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依附于那五张皮上,几乎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爱国爱党之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通通否定了。所以,毛泽东所讲的通过鸣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就不难理解了。很多人积极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满腔赤诚地投入鸣放,转眼之间成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有的人和风细雨,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话,有的人甚至一句话没说,也被划成右派,就是不足为怪了。即使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也统统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彻底改变立场。基于如此对中国的知

识分子的判断,即使没有反右派运动,他们在国家中的位置也是明明白白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位置被排列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比历代封建王朝时代认为的“下九流”还要低下,也就“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这种“左”的错误,对国家的文化事业,对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经过几十年,大家都有了切身的感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和“左”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得到改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清除它的影响,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饮 可

散文三篇

早 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

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袁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 源 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

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
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

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眼，
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
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未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瞿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

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圞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

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啊!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

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

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来竟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

和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的，而我和赖汉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托桃源县委处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

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

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划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

1958年秋，我从长春被押解回桃源，关在桃源师范学校的一间空房子里。这房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言行澄清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只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

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命根的独生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就是不孝吧。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德，部队又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不许。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

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她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多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

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划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事情。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例如：

**越是没有信息，
便越是爱得深沉。
你从前写的些平常的信，
如今字字都成了珍品！**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如：

**纯静了的悲痛没有泪，我想。
我不知自己是麻木还是健忘。
再见时我怕只会对你傻笑，
我得道了，再也不会悲伤。**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

真不该认识你，

不该走上女生部的楼梯，
不该题辞，不该通信，
不该做你的嫁衣，
不该走那条山林的路回家，赤着双脚，
不该有这些爱情的痕迹，
成天折磨我和你！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

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

蜜月中我俩嬉笑不休，说些傻话，
说什么爱情是小偷，
偷去了路，偷去了家，
现在真的没有路也没有家了，

只是孩子又在学话……

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呢？

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即他们是把她往革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软弱

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讲，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诉我，她的座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点，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会到这个地点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

“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

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初恋，从没吻过女孩

子，竟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

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

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今年 12 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渐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

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写的挽诗，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

六月吹南风，
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
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

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
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
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
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一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澧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

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西装革履洋派头，失足悬崖万事休。
何幸夜来雷阵雨，好随巨浪入清流！**

第二首诗写的是杨立中，桃源人。这人小时候与文思是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在改进机械厂也算个书法家，他和文思感情很深。这年十月初五，他知道是文思的生日，只因都在狱中，没有办法祝贺，便拿出半盒卷烟相送，作为寿礼，那时候半盒卷烟也是很珍贵的。所以文思也深为感动。第二年杨立中得了肺病，咳血不止，死在德山狱中。死后也没有亲人来收遗骨，便由几个犯人抬出去，葬在乱葬岗上了。文思作诗曰：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
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三首诗是写给一个叫胡天健的桃源人的。这个人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来岁，高高瘦瘦，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且喜音乐，二胡拉得很好。常听他独自演奏《梅花三弄》、《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等名曲，听说他还只结婚半年，就被送到德山来劳动教养。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把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和幸福也毁了。到德山只一年，就因劳累过度，日渐消瘦，终于骨瘦如柴，病死狱中。原先细皮白肉，很英俊的。死后却形容枯槁，真的只剩几根骨头了。他新婚的妻子看到，该如何悲痛啊！文思的挽诗曰：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
潦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四首诗写给一个叫郭述豫的人。这人如何死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桃源人。他死之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来德山，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似比别人幸运些。因为在那个年代，惧于政治压力，一般家属是不敢去收尸的。还听人说，这个女人并非他的原配妻子，而是续娶的二房或竟是小老婆。文思称之为“如夫人”。“如夫人”古时通常是指妾的。总之，这个女人竟来收尸，是很感人的，文思为作诗曰：

**深闺春暖任婆婆，偏趁浊流奈若何，
难得多情后死者，招魂泪洒德山阿！**

可见，不论什么年代，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不能接受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觉得对于党中央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至诚拥护的，怎么会反对呢？记得当时有一个桃源来的右派，名字叫黄德祚。他就对此一直愤愤不已，不肯从罪。后来派他去理公港运石灰，他在路上猝然得病，不能行动了。当时运石灰都是用的一种独轮手推车，乡民呼为鸡公车。同行的犯人就用车把他送回工棚，他在车上已经昏迷了，略一清醒时还喃喃地说：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

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中了。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阿 Q，文思的挽诗说：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

“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 Q!

还有一个在德山死去的人，是我的同乡，叫杨承宪，常德县人。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应是真心保家卫国的战友。我很奇怪，这样的人也反党吗？怎么也弄到这里改造来了？他到改进机械厂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在开始基建平整地基时，他挑土推车都很卖力，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好久他就累倒，病得一塌糊涂。却还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时才如何如何艰苦，真是至死不悔，十分叫人悲痛，后来文思有诗记其事云：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
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这该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了，不知为何竟也入了右派之列？不说后来为我们落实政策时承认都是错划。就在当时，像杨承宪这样的右派，我们也认为他是属于错划的。我们错划受了二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平反改正。他没有受这么长的磨难，却不明不白死去了，改正也没有用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尽然，我虽是知识分子，却与资产阶级沾不上边。还有的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我们就戏称他们是‘混进右派队伍里来的’。例如有一个姓龚的桃源人，傻乎乎的，连买卖两个字也分辨不清，说的话也愚蠢可笑。有一次闲谈，他就胡说“我看苏联是个男的”。大家都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天天听到讲什么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

众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憨厚平庸的人往往有福气，不料他后来竟也死在德山

去理公港运石灰的途中，在一个工棚里无声地辞世了。文思为他写诗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
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还有一个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和人一谈话就痛哭流涕，说自己罪恶深重，当积极改造，后来在狱中死了，恰好临终摘帽通知书也来了，来了也没有用了。文思写诗云：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
果然急泪能滴恶，恰好属纆获赦书。**

这是历史的误会。自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这些人却又后悔不已，认为根本不该读书，不该成为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冠误我”，还不如春种秋收，务农为生的好。我在德山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么想这么说的。这人名叫李诚斋，长沙人，也是桃源划的右派。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一谈就知道他读了不少的书，知识渊博。后来他被派去澧县运石灰，体力不支，死于张公渡口，临终反复拜托同行的“同犯”，如果谁将来能够出狱，一定要转告他的妻子，儿子都要在家种田，不要让他们上学读书了。同伴都为之心酸落泪。文思后来为他写挽诗曰：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
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我在德山的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饥鸿遍野。德山改进机械厂就有一百多人患水肿病，饿死累死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听说，能到德山改造的，可以算是万福，别的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有一批去钱粮湖开垦的人，不少死于血吸虫病和水肿病，说是瘟疫，自然也可以说是瘟疫了。还有一个叫刘宽的右派，没有到德山来，留在桃源改造，死于狱中，尸首抛在郊外二里岗上，竟被野狗拖去。他曾是文思的学生，改造时还称文思为老师。文思听到死讯很伤感，为他的惨死也写了一道挽诗：

**白眼睥睨究可惜，却云傲骨有师承。
哀哉狗腹作棺板，世上竟无瘞旅人。**

这诗开头两句大约说刘宽生性傲慢，讲究骨气，是文思影响所致吧！可惜的是人死了，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竟葬身于狗腹了。

自然也有多情的，有个叫万松筠的右派，常德县人，是个历史教员。1960年死在德山，埋在厂外的乱葬岗上。过了三天，他的夫人才得到消息，一身白布孝服奔来，哭倒墓侧。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么深情的妻子，为他戴孝，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为此也写了这样一首诗：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修谈纸上兵，
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潸潸。**

最可恶的是犯人打犯人，有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觉悟高，往往充当打手。管教干部不好动手的，他们就自告奋勇，动手打人。记得还在桃源时，有个叫赵大漠的人，因为饥饿难挨，就到食堂偷吃了一钵稀饭，当即被查

出，把他拉到暂作监狱的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竟被一伙犯人一顿棍棒打死。犯人打犯人，打死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文思作诗纪其事曰：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
争料新朝存杖典：大雄殿上肉横飞。**

还有一个叫邓华国的犯人，就为了一枝钢笔丢了一条命。他是洗衣组的，在为犯人们洗衣时发现别人衣袋里有一枝钢笔，他便见财起意，据为己有了。后来又害怕，偷偷把钢笔丢入池塘。终于被组里的犯人揭发，便开会斗争他，要他交出钢笔。他交不出，说丢进池塘里了，便又令他下水到池塘里去捞，这时已是秋凉时节，下水捞钢笔冻得要死，钢笔仍没有捞到，决定第二天继续批斗，他知道这一关难过，便在晚上用一根棕绳吊死在床头上。这是国庆之次日，只差几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这事文思没有写诗，我的日记中却记下了。还加了个左右都能用的题目：《死有轻于鸿毛》。

那几年死去的人，能记下姓名和文思写过诗的还很多，不知名姓的就更多，不一一写出了。就这里记下的人和事，如果细写，可以写出一部血泪斑斑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来！

(选自《饮可诗文选》，海南文艺出版社)

牧 惠

“漏网”

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我是广东省委讲师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没有任何头衔的负责人。

为了在干部中开展对马列主义课程的学习，需要为地方培养一批教员。1955年初，我被粤西区党委宣传部送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完毕后，省里把我们这批人一个不剩地截留下来，组成了省委讲师团。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妥当。首先，大家都是由各区党委、地委宣传部推荐来而且说好好学习结束后仍回本单位的，把人都留在省委，显然不讲信用。也许有的单位早就料到这一招，故意派一些其实根本不适合搞理论工作的人来应付应付。这一来，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工作就很不好做。我的职责之一是排课，按理应当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差不多数量的讲课。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各讲区开始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取消那些不受欢迎的讲师的课，硬拉别的人来讲课。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长卓炯（就是那位后来同孙冶方一样被批个没完没了的经济学家卓炯）负责安排市属各区、校的课程，总是设法把我安排的时间表弄得面目全非。那结果，是几位受到冷落，而我的课程则排得很满。这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愉快。加上那时还讲究“物质鼓励”，规定“超额有奖”，我月底大都能拿到十来块钱的津贴，更成了矛盾的焦点。出版社让我们

给初级组的学员编课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有的人自己都没有读懂政治经济学，文字表达能力又差，编辑很不客气地退了回来。有的我自己义务重写，搞不完，只好让别的人另写。于是稿费也就畸轻畸重。大鸣大放一来，这些意见一哄而上，连管资料室的、搞行政事务的都向我进攻，认为我所得的报酬应当有他们一份。省委宣传部和讲师团的领导私下给我打招呼说，所提的这些意见不对，要我不必介意，他们将在适当的机会把问题讲清楚；卓炯一次见到我也说了一些同情我的话。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很窝囊。那时我已经重新开始写文章，心想，不去讲那么多课，不当这个鸟负责人代你们重写那些稿子，我可以做学问、多写几篇文章，如今反而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这天，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在家里读书。林鹏登门来了。

林鹏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从中学分手后，我考入中山大学读中文系，他却入了广西大学医学院。七搞八搞，我们又在讲师团会师。林鹏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时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但是，独立见解同孤立又往往是一回事。加上他比我更不善于处事，在省委党校呆不住，被调到我们这里来了。由于有一段旧关系，他又没有什么不平衡感，我们的感情不错。他劝我别被那些闲言碎语干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转入正题说：“我要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

要是我知道他这一生得为这张大字报付出劳改 20 多年的沉重代价，当然会劝阻他。可是，我哪能未卜先知呢？

“什么问题的大字报？”

“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

接着，他把在西江（如今属肇庆市）地区土改时地方干部如何被“砍瓜切菜”（林鹏习惯用语）地弄得七零八落，有哪些冤假错案等等，给我讲了个大概。“这样的干部路线对头吗？”

对他的话，我马上产生了共鸣，不知天高地厚地连连点头称

是。

用检讨时的话来说，“这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的”。说来话长，简单交代一下。

在游击队里，我仍然同学校的李绍中等好友保持通讯联系。1948年秋天，绍中兄几次来信说，我原先那位女朋友从汕头来了，三番五次地打听我的下落，焦急得很，似乎非有个交代不可，要我赶紧想个办法。这位女朋友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柳，在汕头一家私立大学读新闻系。原先我们曾在信里约定暑假在广州碰头。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逃到香港。离开香港进游击区时，我曾经将情况告诉我尊敬的同学吴大姐，征求她的意见。吴大姐问了我对方的政治情况，我担心这位阔小姐（从穷光蛋如我的眼中看，其实也未必很阔）不大可能敢去打游击。她赠我一句略有改动的鲁迅《伤逝》中的话：如果不能携手同行，就只好奋身孤往。于是，我没有给她写信就“奋身孤往”了。暑假开始，柳回到广州，发现我意外地失踪。大约与“钓不到的鱼最大条”的心态有关吧，她不回汕头读书，死缠活缠地要绍中兄告诉她，我是不是给关进班房或是跑到什么地方了。绍中兄怕她闹得学校的人知道了，因此十分为难。我向领导汇报后，肥佬关说，你可以写一封信给她，如果她不怕吃苦，欢迎她来。于是柳果然来了。脱掉碍眼的时装（她居然带了一皮箱旗袍来），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于是爱得要死要活，难舍难分。虽然不在同一个地区，仍不时地找机会三个人（加上胡九仔）离开群体聚一聚，成了战友们非常羡慕的一对。

解放了。我们一个被分在新会，一个在鹤山。支前清匪，工作忙得见面反而比以前少，更谈不到考虑结婚。就在这时，从我这里分到鹤山县的战友老吴特地跑来告诉我，柳在那边宣布同我“掙煲”即分手，另有所恋了。我不信，抽时间去了一趟沙坪。在那里当县委书记的肥佬关很抱歉地证实了老吴没瞎说，还说：

“早知这样，真应该把你和她分在一处。”失恋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我还是挺过来了。最后见她一次时，她已调到报社当记者，她那众位男朋友也陆续“吹”了。她送我上长途汽车，答应我痴情的要求：“重新考虑一下你的选择。”

谁知这却是我们一别几十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得知，她以“特嫌”的身份被拘留了；同时，我也被列入了冠以“清理中内层”的名目、以地方干部（被称为旧基层）为对象的类似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这件事如今看起来很滑稽：柳之所以“特嫌”，在于她用情不专，因此可能是“美人计”；而我呢？竟把一位“特嫌”带进革命队伍，当然也形迹可疑。但是，在那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包括我们的司令吴有恒等，则被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而我呢，却麻木到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审查对象。为此，县委组织部长把我痛斥了一通，说我装蒜，这才把我喝醒。不久，我被从县里调到地委，说是工作需要。其时我倒是明白，这只是为了更便于审查——用一句俏皮话来说，是离公安处看守所更近了。也就是因此，说不上是不是因祸得福，我被从土改前线抽回来，给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做些打杂的事。三年之后，我被通知到组织部去看审查结论。从中得知，柳的“特嫌”查无实据，遣送回家；而我介绍这样的人到游击队则是一个“错误”云云。

祸不单行。当我因柳的“特嫌”而被审查的同时，还有一件更让我后怕的事件在发生着。解放前夕，我同李德华分别率领两个武工队向江门挺进；于是，解放后，我和李德华就在靠近江门的棠下三区一起工作。当年李德华分管的那半个区有个楼山乡，乡长是因为参加过菲律宾共产党抗日游击队而被驱逐出境的前武工队员楼山人李波。土改时，楼山是区党委领导人蹲的点，负责在那里做具体工作的廖原竟挖出了一伙“反共救国军”，李波被查明是其中的为首分子并“自杀”而死于狱中，同时还枪毙了三

个楼山人（其中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战友）。这样一来，李德华当然也是问题人物，被送到丹灶的党校去“学习”，其实是变相软禁。廖原到处做典型报告，由一个土改队员很快就升为县委常委。楼山工作完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打游击时活动最多的桐井乡。照此办理，那里肯定又会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来。我既然已经是“特嫌”的男朋友，只要我再同“反共救国军”沾上点边，那就不是去丹灶“学习”而是到公安处同柳“会师”了。天可怜见！据说是老司令（当时是区党委秘书长）吴有恒发现其中有诈，冒着“逆龙鳞”的危险，向那位蹲点的区党委书记指出廖原搞了鬼，造了冤案。经过调查，证明真正的特务是廖原而不是李波他们！这就是震惊全省、远播全国的“楼山事件”。你看，我不是“险过老张剃头”吗？

林鹏的诉说引起我对这两件有切身感受的冤案的记忆。此外，有名的松仔岭事件我也知道得比较多。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补充了这些材料。我说，不管有什么毛病，柳总还是革命队伍里的思想意识问题，怎能把人关了3年，然后把她遣散回家，让人背一辈子包袱呢？既然柳不是特务，让她参加游击队又是肥佬关批准的，又何来错误？而李波的死，更是使我伤感不已！多么好的一位老（他比我们大十几岁，儿子都参军了，在当时看来，当然属“老”字辈）同志啊！

林鹏的大字报一贴，反右派开始，马上招来重炮猛轰。整个省委大楼一楼的大厅都贴满了反击林鹏的大字报，《南方日报》以大字标题揭露“极右分子林鹏”的种种“罪行”。这一下我懵了。一边参加对“极右分子”林鹏的“辩论”（其实是批斗）会，一边觉得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那时的《参考消息》是内部发行而且限于一定级别的，比现在编得精采多了。平时，我总是几乎一字不漏地把它看完。这时候我发现，面对着《参考消息》，我已经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不知所云，

更休想去啃那些马列经典著作。以前我的睡眠非常好，想睡就睡，醒后龙精虎猛，如今很难入睡，而且常做恶梦，开始靠安眠药过日子了。我只好一个人躲在房里用扑克牌“算命”。其实，哪里还用得着算什么命，同情而且支持极右分子，给他提供炮弹，扣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还不是“十六两翘翘”的吗？

林鹏是很够朋友的。他把大字报的罪过全部承担下来了。说全是他的认识，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却不敢不认罪、深挖自己对土改整队、对反地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考虑到我这个人平时口无遮拦再加上当这个鸟负责人引起的“民愤”，我添油加醋地往自己头上浇粪水！度日如年地心里打鼓，为那位还在娘肚子里的孩子痛惜他（结果是她）生不逢时，天真地希望能发配到原先打游击的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便得到老乡亲的某些照顾。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原先有说有笑的领导板着面孔找我谈话，通知我，“明天开你的辩论会”。该来的终于来了。我甚至想：早来比晚来好，我的神经已经紧绷得就要断弦了。

意想不到的，从省委宣传部派来讲师团主持辩论会的领导，给我未来的孩子带来一包他家孩子用剩的尿片，而且在开场白宣布：林某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于是，我漏网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老领导王匡救我一命。“这个人有点才华，既然已经够额，就不打他算了。”10年后，王匡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祭旗”的第一名“大右派”。罪状之一，就是“包庇右派”，当然包括包庇在下。这是批斗我（这时已是“三反分子”）时，一位女将调查回来后宣布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清楚地记得反“右派”结束后王匡笑着对我谈他在延安整风时如何挨整得呜呼哀哉，给我加油鼓劲。又过了10年之后，我被发配回广

州，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王匡，感谢他救命之恩。他笑了笑说，其实也不完全由他说了算。然后同我交流木匠活的工艺，很得意地告诉我，他比我的水平高，已经可以做桶。

王匡讲的是实在话。当年省委宣传部一位很起作用的科长王干，前天还为王匡写批判“右派分子”的稿子，后来就被揪出来成了“右派分子”——王匡保他；但上头不同意。

由此看来，命运这玩意儿还是有的？！

(选自《漏网》，河南人民出版社)

刘发清

作 贼 记

1958年秋，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几经波折。1959年春才到L县报到。L县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之一。县城东西长、南北狭，极像一只大火柴盒，面积不过0.5平方公里。四面灰色土垒城墙雉堞全部坍塌，已失去当年巍峨风采。城内居民约四千。有一条十字街。街道两旁房辅古老而低矮，唯一高层建筑乃是新盖的桦木棚板的两层县府大楼。

当时全国“大跃进”已开始退潮，但在偏僻的L县依然热气腾腾。城内中心鼓楼附近的白色墙壁上，顶头横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字标语。左下方画了一朵雨伞般大的棉花（L县不产棉花）、几枝颗粒如桔子般的麦穗和一头比大公牛还壮的肥猪。右下方公布本县各地大放“卫星”光荣榜：

××公社×大队小麦亩产8100斤

××公社×大队玉米亩产12600斤

××公社×大队洋芋亩产100000斤

据说最后一条新闻上了省报，不知怎的传到外国，使一些洋专家大吃一惊，自愧弗如。因为据他们计算，十万斤马铃薯的体积堆在一亩地里，即如铺“席梦思”一样，密密层层，足足可铺一尺多厚，创造了了不起的高产奇迹，应当编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手册。因此他们写信到我国有关部门，要求来L县实地参观学

习哩！

我最后被分到 L 县中学。校领导最先分配我下乡找铁矿，后来在校办砖瓦厂学做砖瓦。1960 年初春，派我看守校办农场。还特地在路边临时给我盖了一间四堵土墙的低矮小屋。面积不到 3 平方米，用两根木椽和柳枝搭架，用烂泥巴和着剁成一寸多长的麦秸糊屋顶。没有盖瓦。屋内“盘”了一个小土炕。朝南开了一个没有窗棂的小窗户。房门朝西，面对农场。地里已点了甜菜籽、萝卜籽，但没有发芽。农场一片荒芜。

这年春天阴冷而漫长。时而寒风呼啸，唱着一支凄厉的歌；时而雨雪霏霏，流着冰冷的泪。我的心好像弥漫天空的云雾阴郁而沉重。根据规定，我的口粮由每月 27 斤减到 20 斤。一天两顿。每顿我领到手巴掌大的一块玉米面“花糕”，或一只小瓷碗般的“黄团长”——黄玉米面做的馍馍；另加一碗被叫作“玻璃汤”的玉米面汤。没有油，没有菜。县城内外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路上行人稀少。我有意减少各种活动，尽量避免能量消耗，大部分时间躺在土炕上，不读书、不看报，眼巴巴地盼望开饭时间到来。睡觉也做吃馍馍的美梦，醒来时还咽着口水。学生们同样挨饿。一位语文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一个高中生极其认真地写道：我的最大志愿就是当一名炊事员，因为可以吃饱……我的脚和小腿还是慢慢肿起来了。此时，即发生了一件使我极为痛苦和不安的事：

一个暮霭苍茫的黄昏，我怅惘地站在房门口。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纺织娘在草丛中令人心寒地开始悲鸣。突然，路边一个幽灵似的影子向我悄然飘来。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农民，穿着破绽百出的老羊皮统子，拄着一根木棍，满脸污垢，颧骨高耸，左眼闭着，右眼微睁，混浊的眼珠凝视着我，张着嘴，却没声音，抖抖索索地向我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老乡，”我的嗓音变了样，“我确实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

请你原谅。”

他木然立着，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我却着急了：“快走吧！天快黑了，不然你就摸不着啦！”

过了一会，他喉咙里响起一种奇怪的响声，头微微摇了一下，举起木棍，步履蹒跚地挣扎着往前走，慢慢消失在正在浓重起来的夜色中。我以为，他一定可以走到那不远的村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农民就倒毙在离我住的小屋不到二百米的路上，口中塞了一把生草，手中捏着一把生草……

当时当地农村死了不少人。幸亏政府解散了公共食堂，从外地调来了豆渣、番薯干，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我也由于一个永不能忘记的上海同学及时寄来了她节约下来的几十斤粮票，才渡过了难关——水肿病好了。但仍饥肠辘辘，日子难熬，口腹之欲令人难以忍受。我每日都到新绿的田野里寻找苜蓿、苦菜、红背儿等野菜。然而吃了这些野菜，肚里仿佛被猫爪抓着似的难受。一天，晴空如洗，我走到一大片碧绿的玉米地，蓦地发现密匝匝的玉米苗已经高过了我的头，修长的叶子在灿烂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抹了一层绿油。不少株植顶端散开了淡紫的雄花，土黄色花粉撒落在周围叶片上。有的株植叶隙中间，结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玉米棒子。棒子尖上抽出一绺紫红色雌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芳香，突然间，像被一股不可拒的魔力所驱使，我不能自禁地走到它们跟前，伸手摸在玉米棒子绿色柔软苞皮上，可以感触到一颗颗玉米籽粒，我环顾四周，阒无一人，便一头钻入玉米丛中。我被包裹在绿色世界里，视线被密密麻麻的“青纱帐”完全挡住。我的心仿佛快要蹦了出来。但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所有玉米地都是有人看守的。我敛息凝神谛听：周围悄无声息，只有阵阵微风吹过时，叶片轻轻摇拂的沙沙声。就在这一刹那，我伸手抓住一个玉米棒子。但这个玉米虽然很嫩，却长得

既韧又牢。我使了很大劲，也不能把它摘下来。于是我发狠往下一掰，“咔嚓”一声，玉米滚落地上，而响声却把自己吓了一跳。“笨蛋！”我暗暗咒骂自己。我不敢拾玉米，急忙转身四面瞭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四周寂静如常，听不到任何可疑声音。于是，我放心解开中山服棉上衣，拾起玉米别在腰间皮带上。接着，我掰了第二个。我打算再摘一个就回去。正当我的右手抓住另一个玉米棒尖时，忽然响起霹雳一声：

“站住！偷玉米的站住！”

这突如其来的吆喝声，仿佛使我遭到致命一击，顿时脑袋嗡地一震，眼前乌黑，几乎晕倒下去。两个神出鬼没般看守玉米的人已威风凛凛站在我面前：一个是四十多岁的胖子，高个儿，大光头，手中提了一根棍棒；另一个矮黑瘦子，三十多岁，手提着红缨枪。

“你是谁？”胖子举起棍棒厉声喝问。

“我……”我胸口像塞满棉花。

“你……是不是学校看农场的老师？”瘦子声音又尖又细。

“……是，”我喉咙哽咽着。

“你即是老师，就不应该……”胖子放下棍子。

“是，是，我知错，我认错……”我惊魂甫定，嗫嚅着说。

瘦子把红缨枪插在地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斜着眼睛问：“听说你是北京派来的大学生，是吗？”

“是的，是的，我是去年分到L中学的。但我是……右派。”我觉得问题严重，无可回避。

“哈哈，”胖子忽然爆发了笑声，接着表情严肃地说，“咱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咱只管看守玉米。你……以后可不要再偷了！”

“是！是！我是第一次……我保证以后不……”我真诚地忏悔说，从棉衣下掏出两个玉米棒子交还他们。

瘦子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态度温和起来：“看你模样，听你说话口音，你是南方人吧？”

“是，我老家在广东。”

“哎呀呀！”胖子大嗓门说，“听说广东是个好地方。几千里路远呐！你无亲无故，咋来咱们这穷山沟里活受罪！”

“不，不……我要好好改造，”我低下头喃喃说。

“你在那边守菜园，咱们在这边看玉米。相隔不远，咱们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哟！”瘦子对胖子使了一个眼色，“摘几个玉米送给老师吧？老师吃不饱，生活很困难哩。”

胖子两只大手一拍：“摘去！摘去！”

瘦子动手摘玉米。

“谢谢你们，谢谢……”我眼泪双流，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但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好意。

当晚，吹灭了小煤油灯后，我钻进冰冷的被窝里，心里两个声音在争吵：一个怒声斥骂自己堕落，怨恨自己缺乏自制能力，嘲笑从前伪君子式的自命“清高”……另一个却用“三天饿成一个贼娃子”的当地俗语和“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为自己辩解……继而，又回想起令自己最伤心的1957年：假如没有那场运动，假如我不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假如我不上大学或不在那所著名大学上学，假如……也许自己就不会啜饮人生的苦酒。

突然，我又想到：倘若守玉米的人说了出去，可能给我再戴上一顶“坏分子”帽子，加上“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我的脑袋膨胀起来，心里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我无限伤心、悔恨，痛苦地往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正当我胡思乱想、辗转难熬的时刻，突然，黑夜深处隐隐约约传来脚步声，并且似乎向我小屋方向走来。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有人走到我土屋跟前了。忽

然，“扑通！扑通”几响，不知什么东西掉进屋里。俄顷，脚步声重新响起，离开土屋，由近而远，不久就消失在神秘的夜里，一切又归于寂静。

我松了一口气，从枕头边摸到火柴，点燃了小煤油灯，顺着微弱的灯光，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发现炕脚下横竖相错地躺着六个烤过的玉米棒子！我惊喜交集，拾起还有点温热的玉米，剥开烧焦的苞皮，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有尝过此食物的人，也许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用柴火直接烤熟的新鲜玉米，何等香气诱人、松软爽口，真是鲜、嫩、香、甜、滑俱全。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饱、最美的一顿晚餐。

三十年一晃而逝。不知胖子和瘦子今天是否还健在？倘使他们还活着，我这半生漂泊、命运坎坷现已回到家乡的远方人，衷心遥祝他们健康长寿，生活愉快。他们善良的形象，令我永远难忘，他们那颗淳朴、宽容、厚道、富有同情之心，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田。

1990年2月于广州

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

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

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

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天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决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铤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

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

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800斤、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27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

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蒙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情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响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

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舅和母亲的影响，17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青，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澜，作

家、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 80 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淌颦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 35 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 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城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

“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